文化百科丛书

皇宫祈福

毛宪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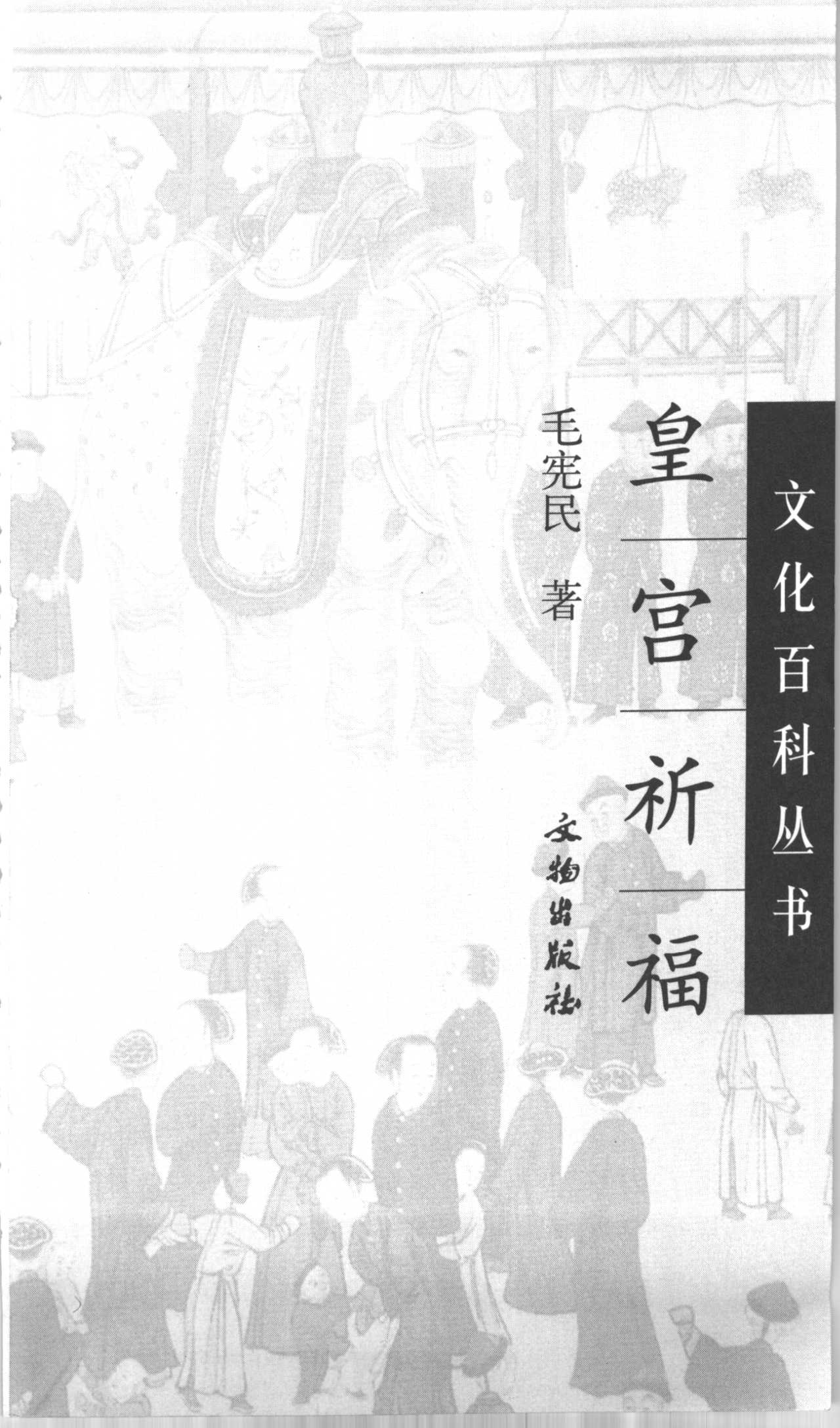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京韵杂述
女子游艺
故宫片羽
古城追忆
皇城春秋
踏歌寻典
街巷雅趣
老饕说吃
养生养气
旧都百行
武当一绝
六朋画事
皇宫祈福
书林片叶
点睛成龙
书人书札
戏楼戏馆
琴韵流水
书家语丝





皇宫祈福

文化百科丛书

毛宪民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蔡　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宫祈福　／毛宪民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496－5

Ⅰ．皇…　Ⅱ．毛…　Ⅲ．宫廷-生活-中国-清代　Ⅳ．K249.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058927号

皇　宫　祈　福

毛宪民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6　印张：8.75
2003年11月第一版　200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96－5/K·735　定价：15元



乾清宫内悬挂的“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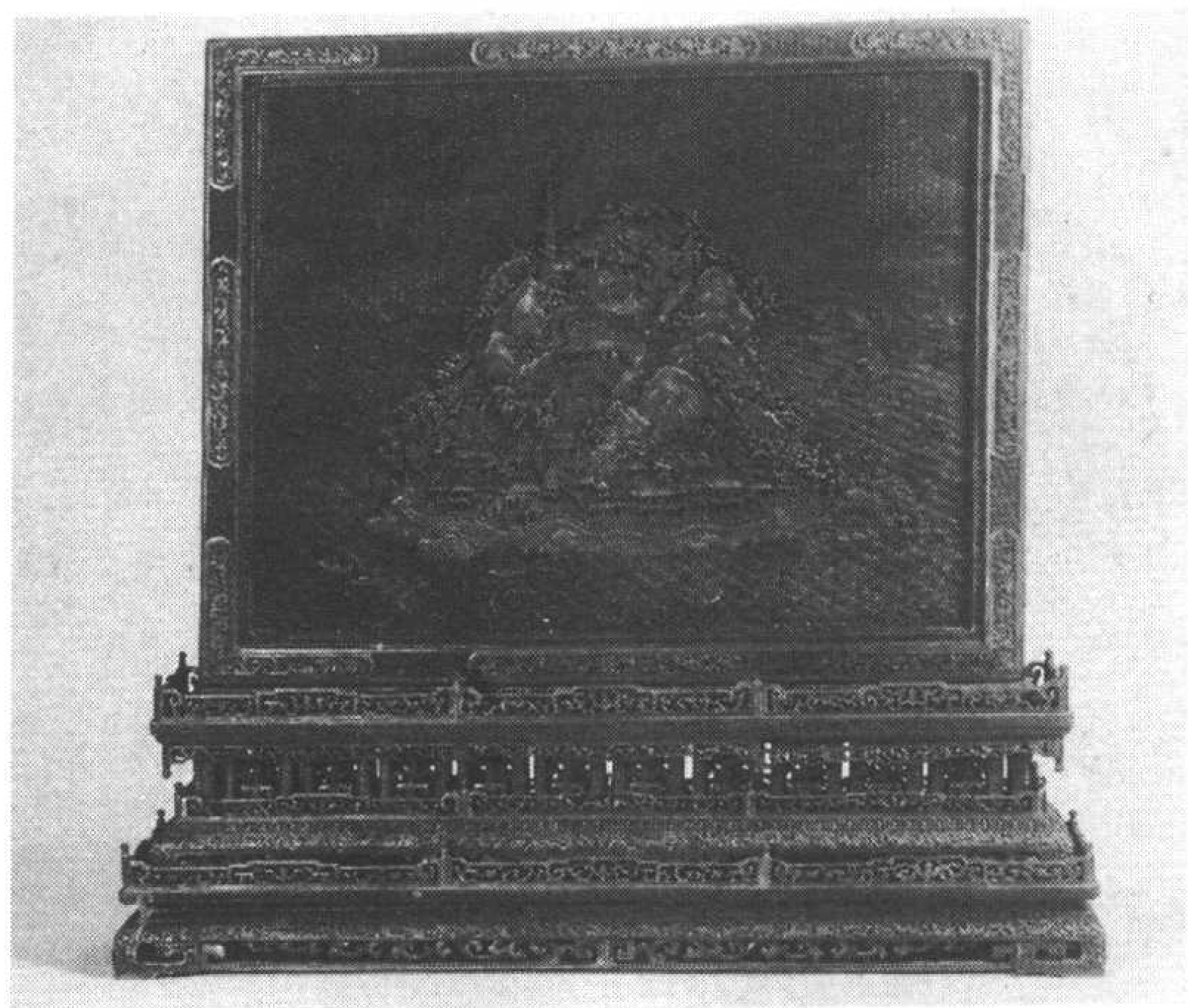
清康熙青花万『寿』字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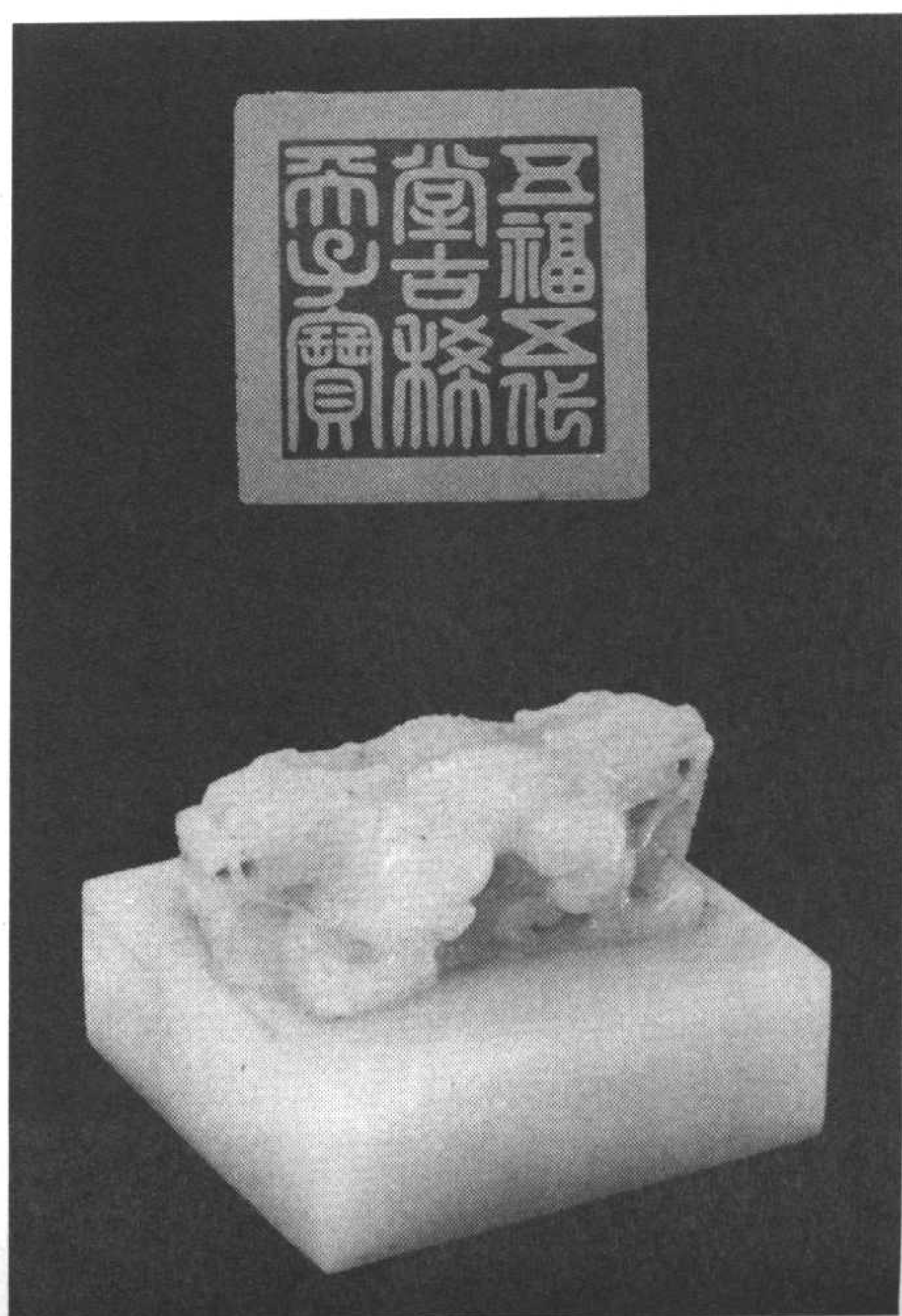
清乾隆画珐琅花卉开光「福」字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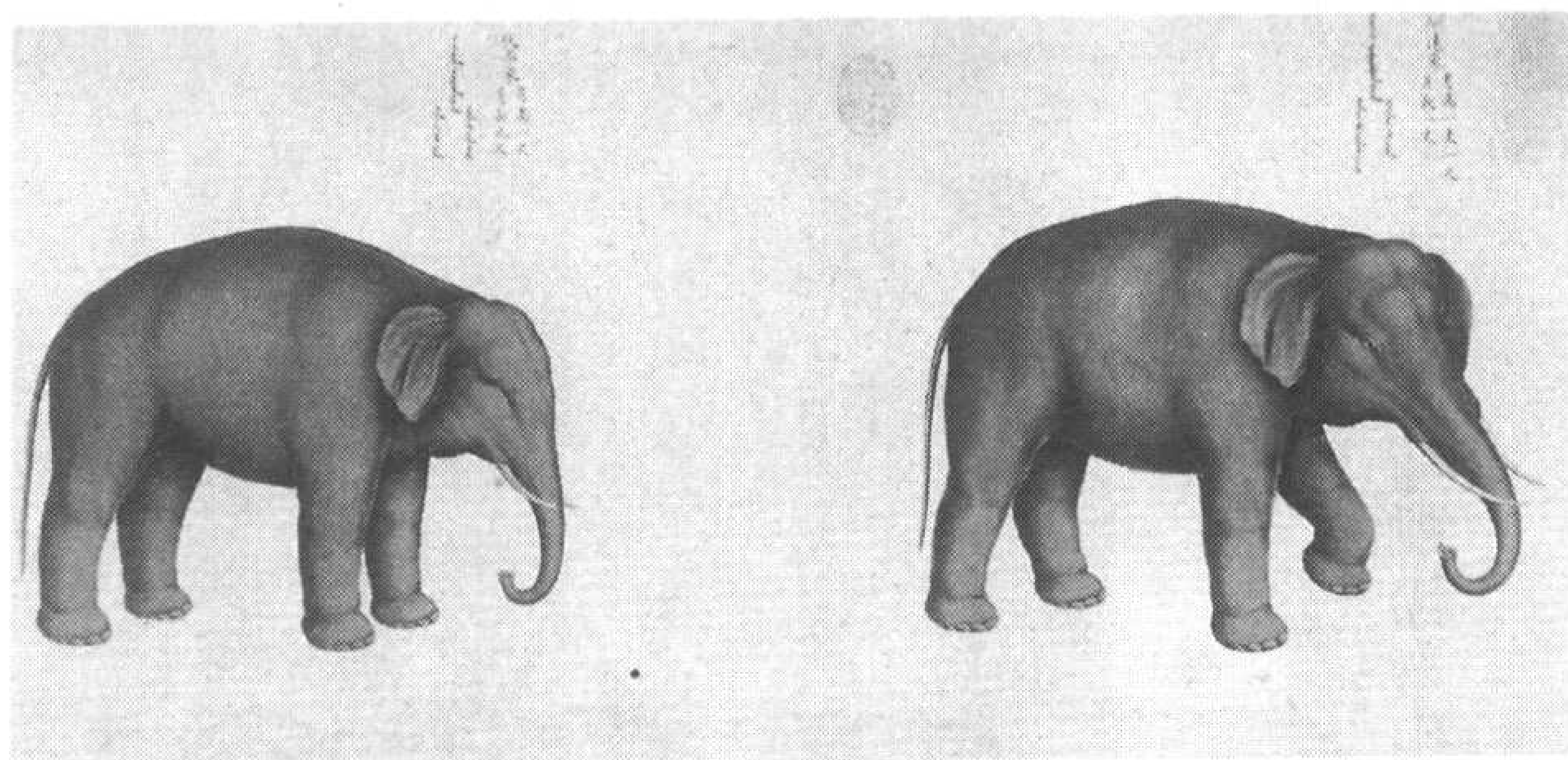
光绪帝御笔「寿」字



清乾隆红雕漆寿山福海插屏



白玉交龙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清贺清泰、潘廷章《喀尔喀贡马象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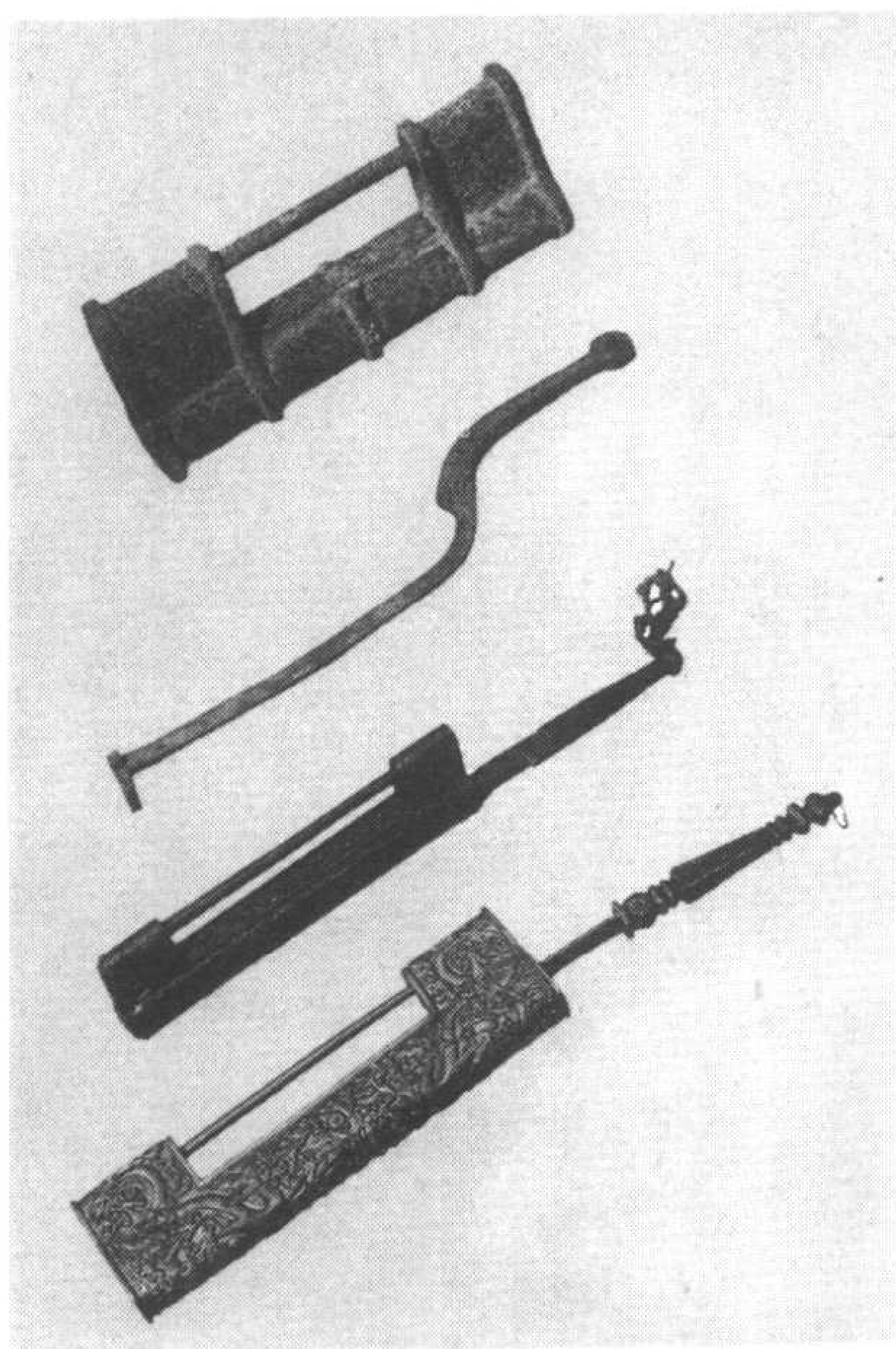
清丁观鹏《弘历洗象图》（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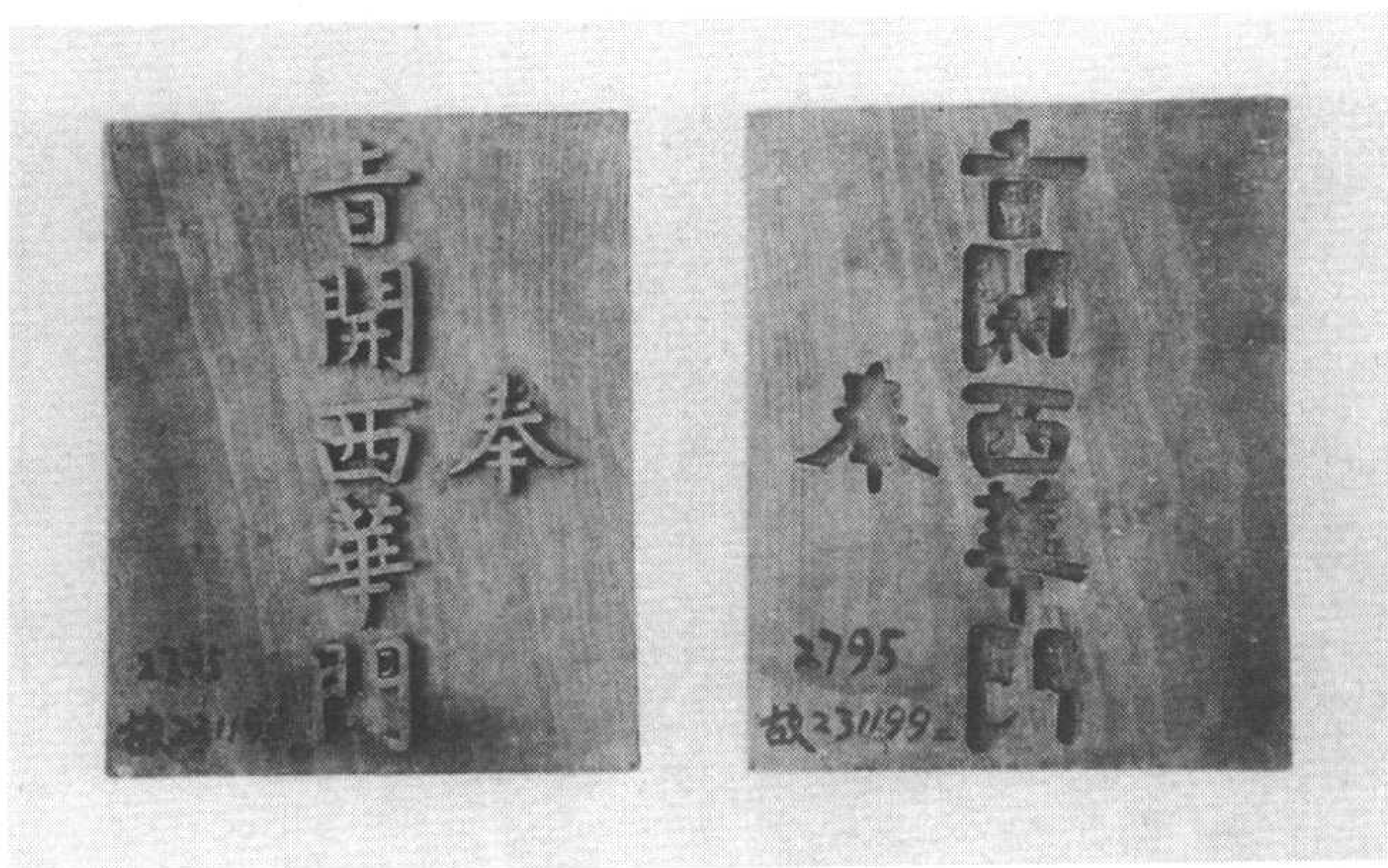
清乾隆掐丝珐琅太平有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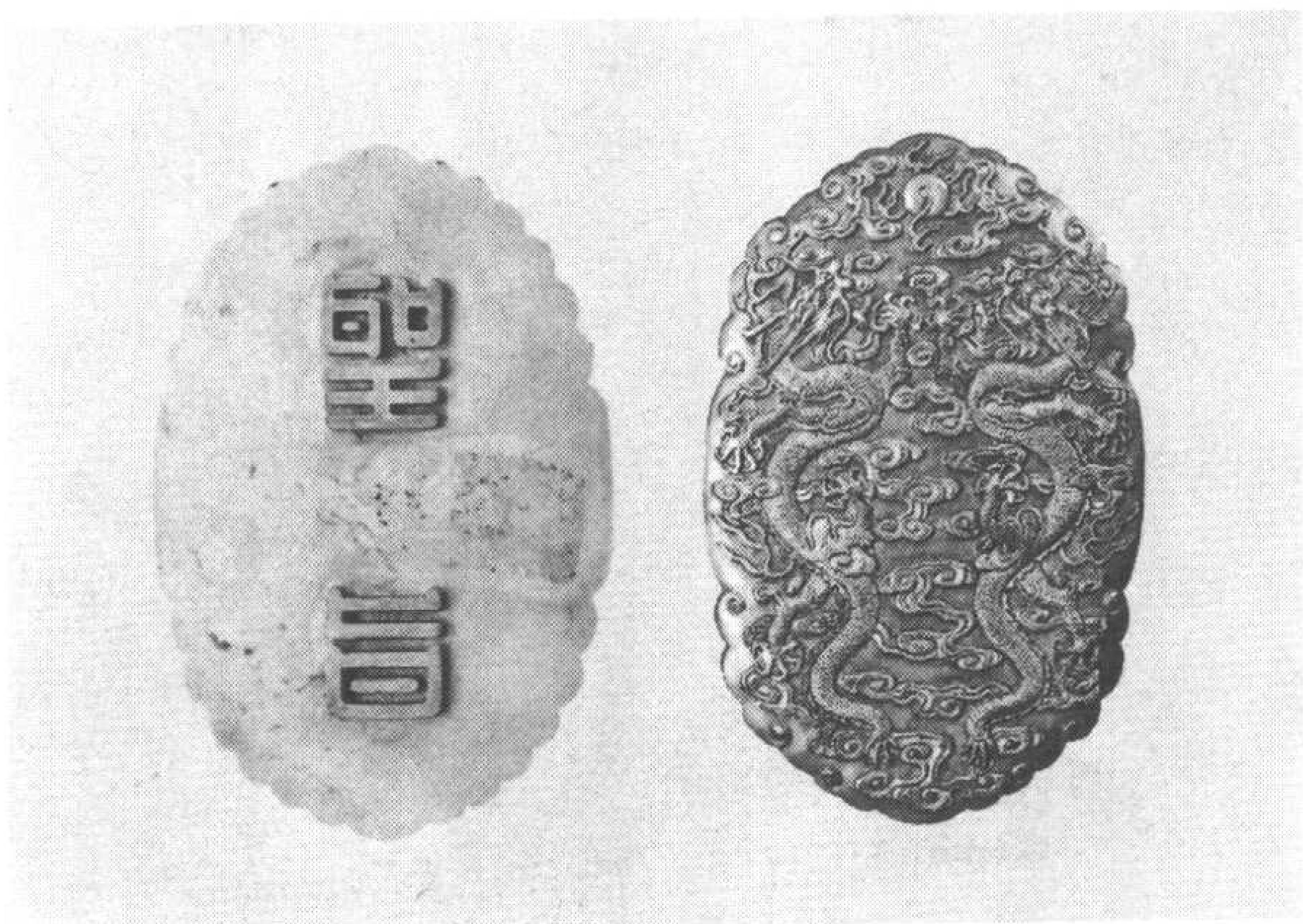
紫禁城内西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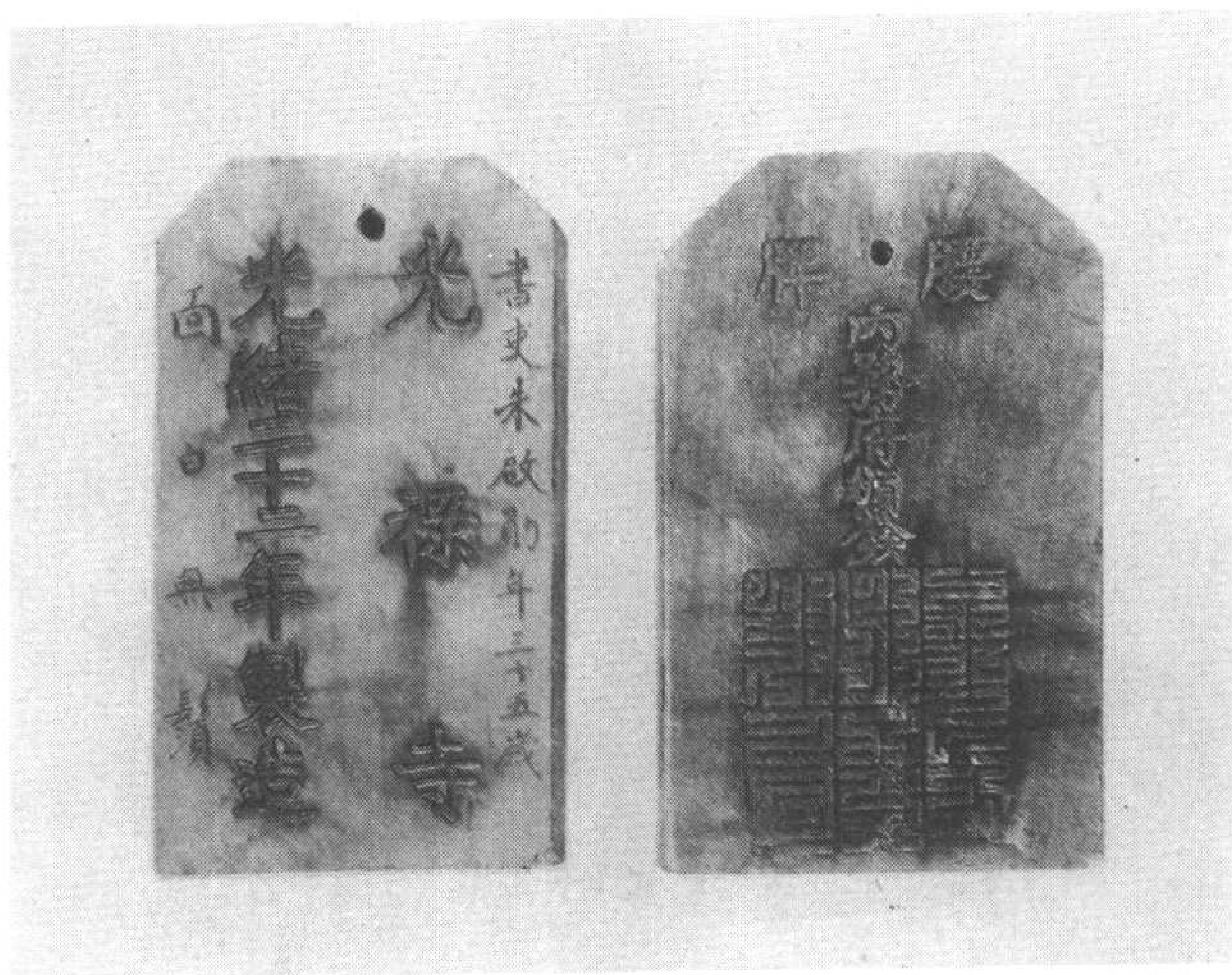
清宫中的门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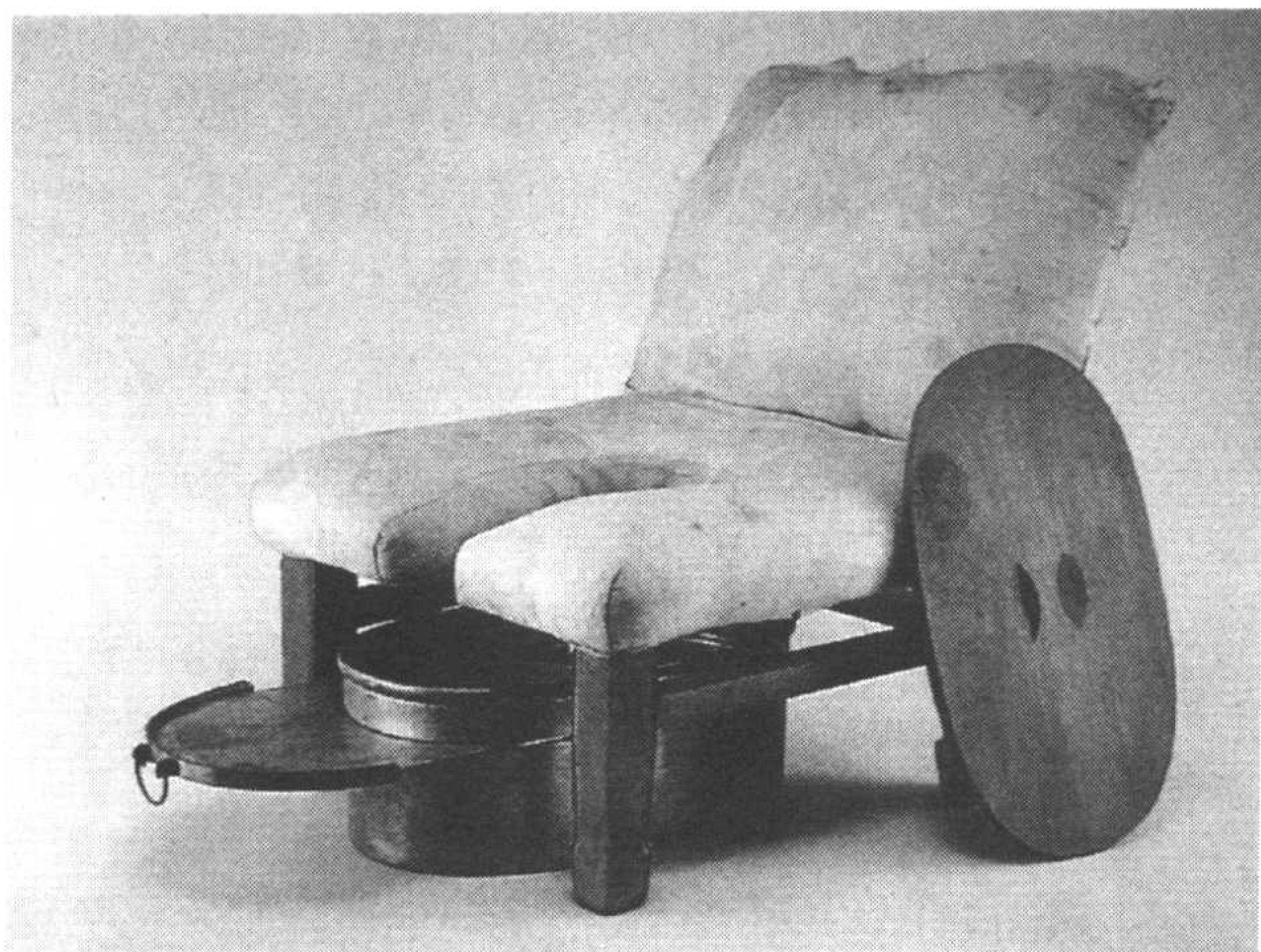
清 木合符



清 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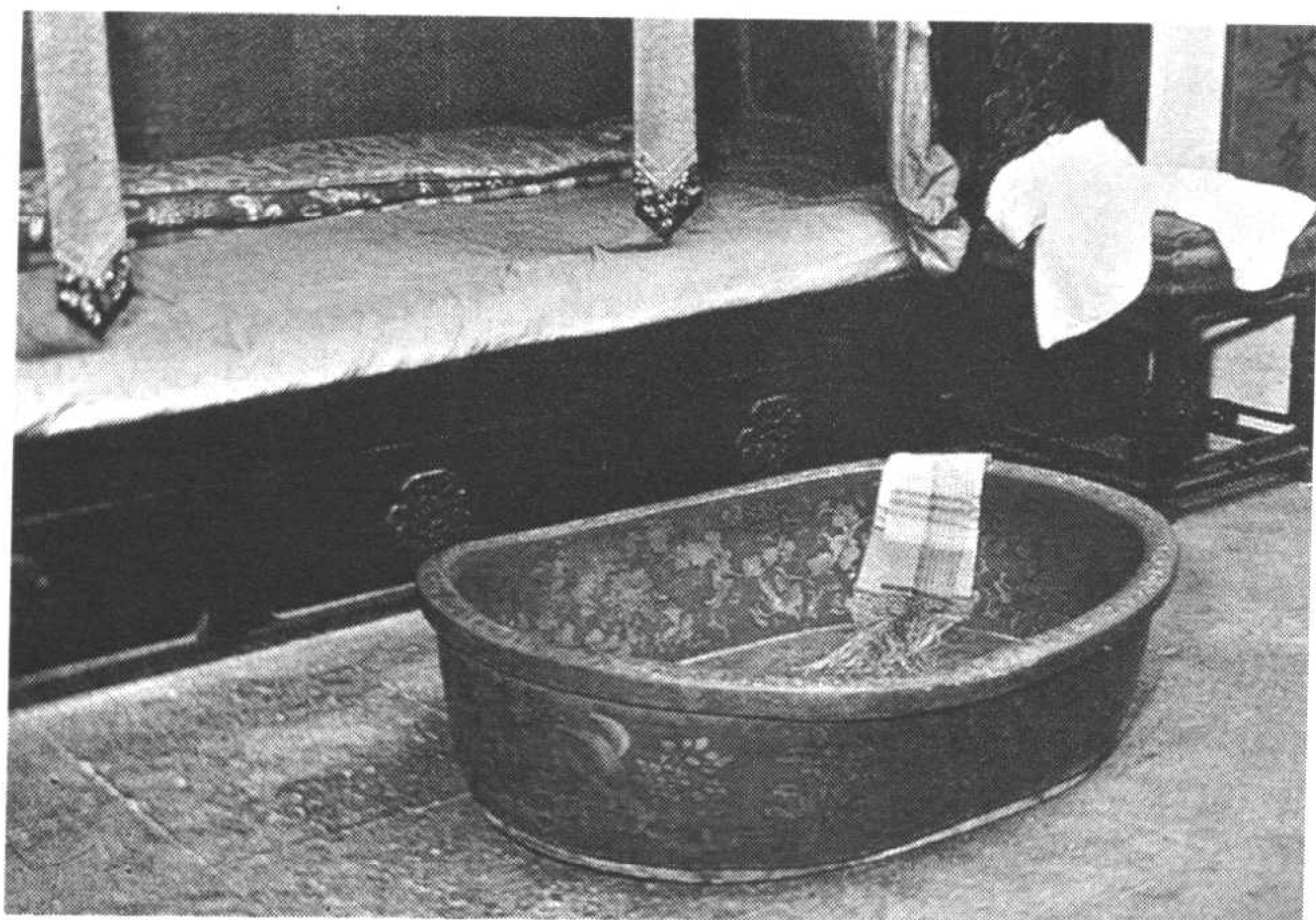
清 腰牌



清宫便凳与锡便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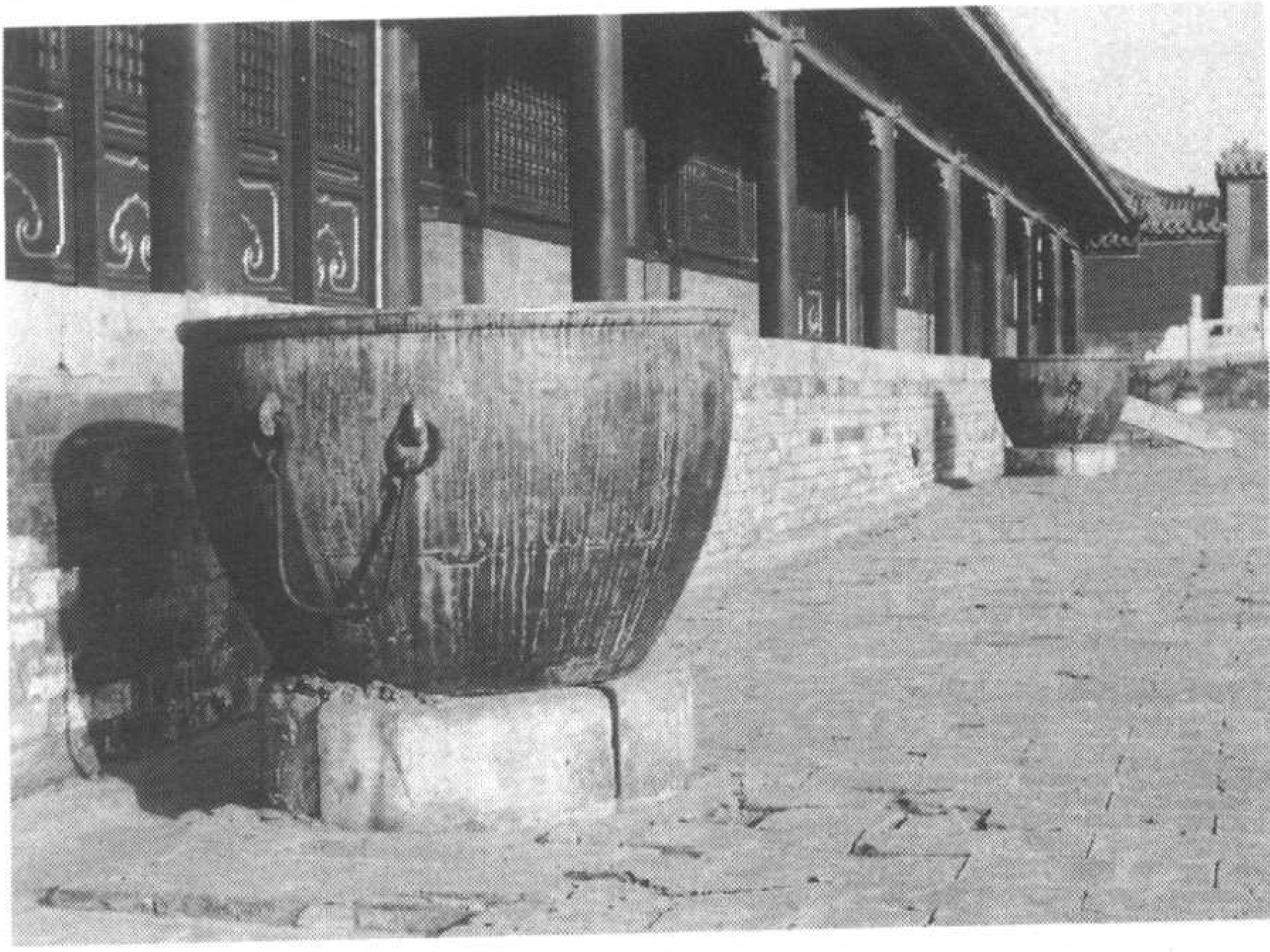
清宫锡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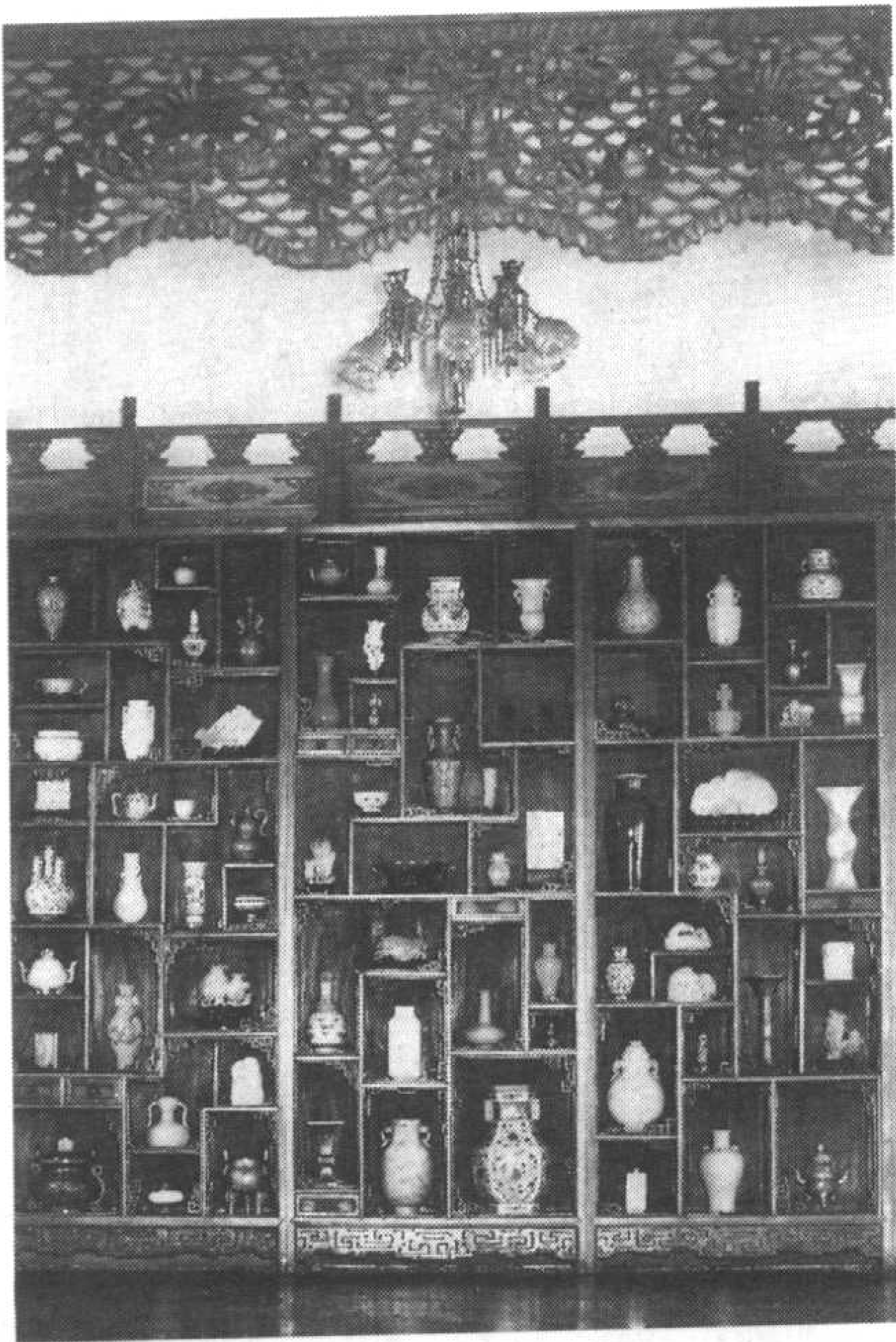
清宫朱漆描金花澡盆



清后妃使用的按摩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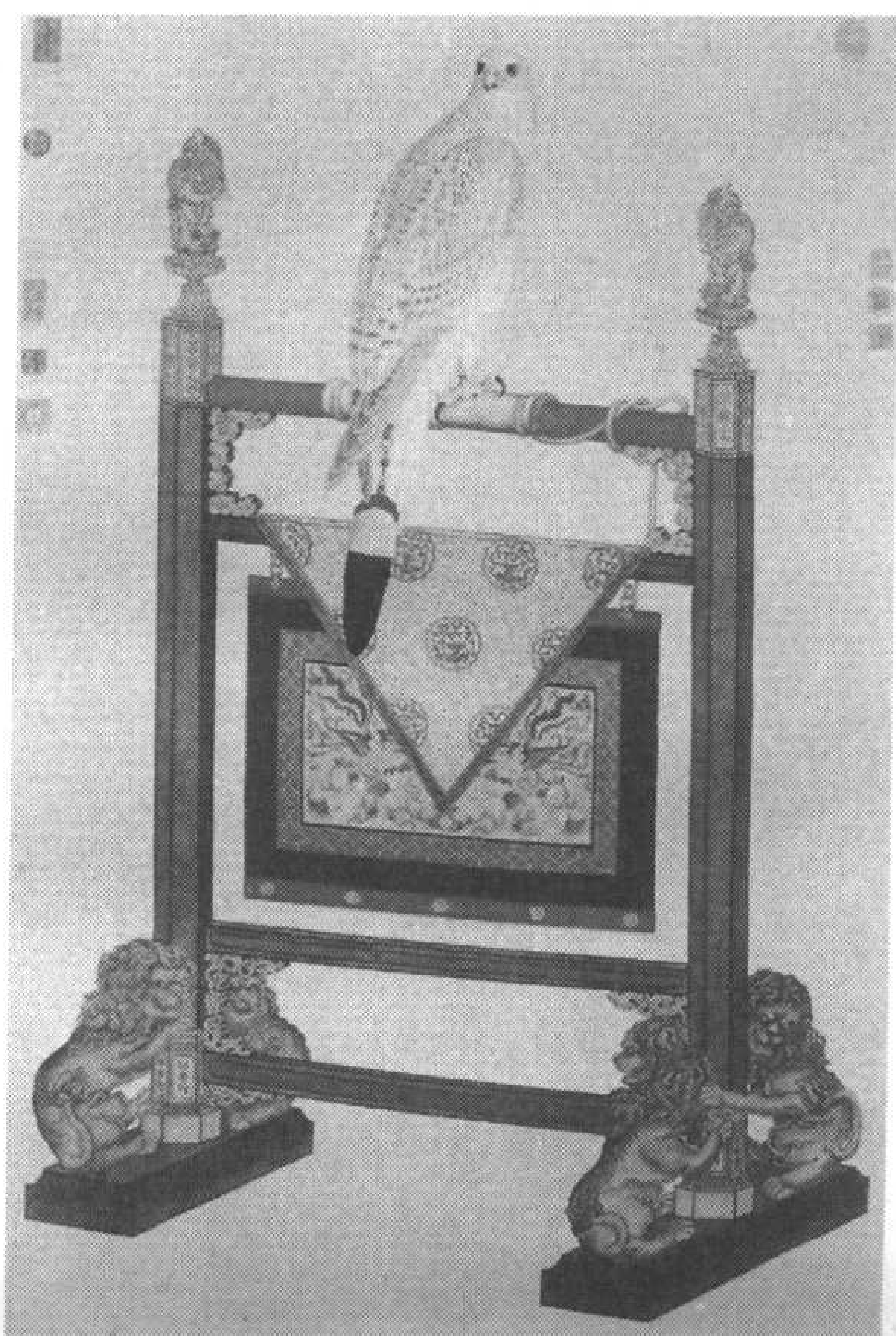
明代铜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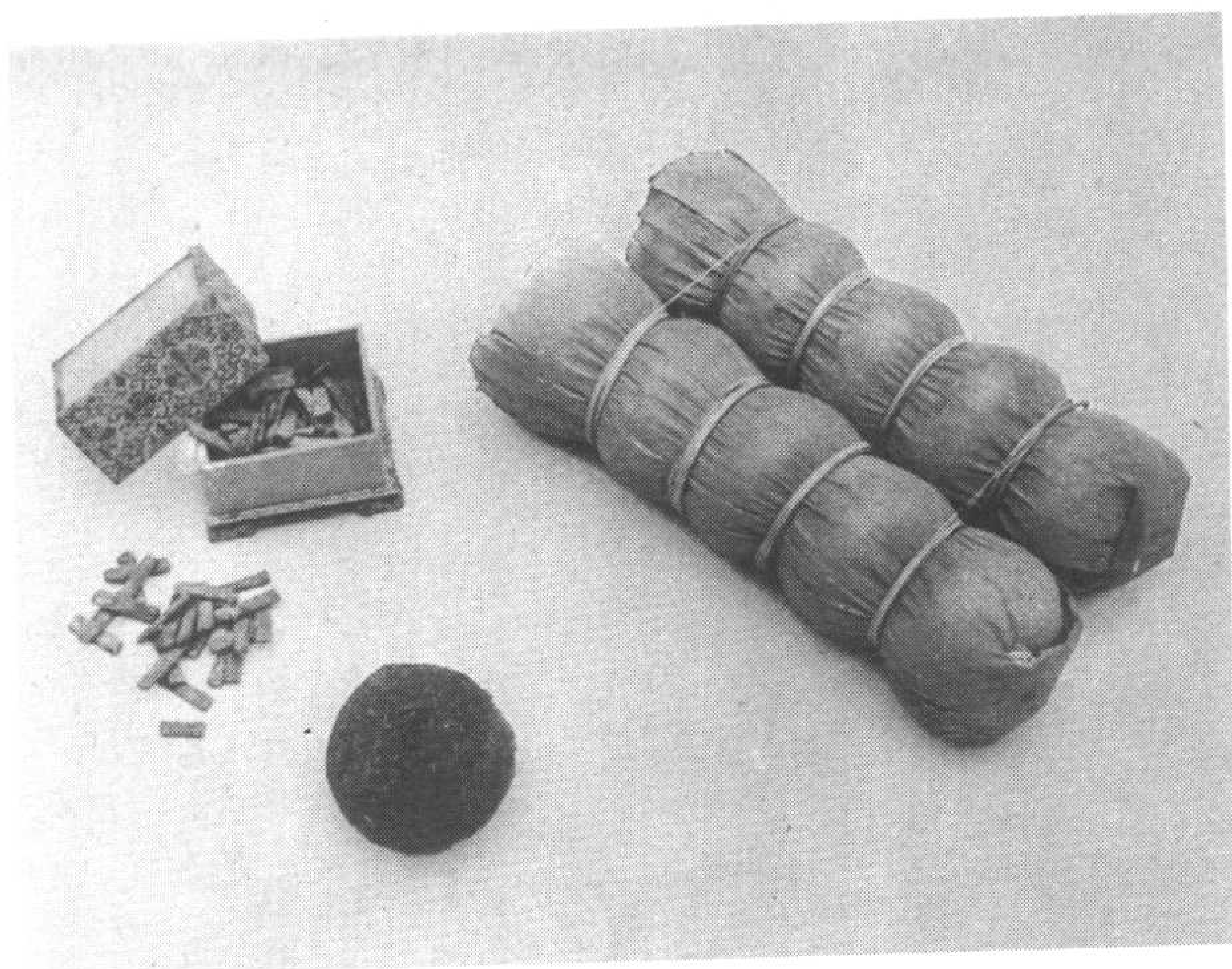
故宫漱芳斋内的多宝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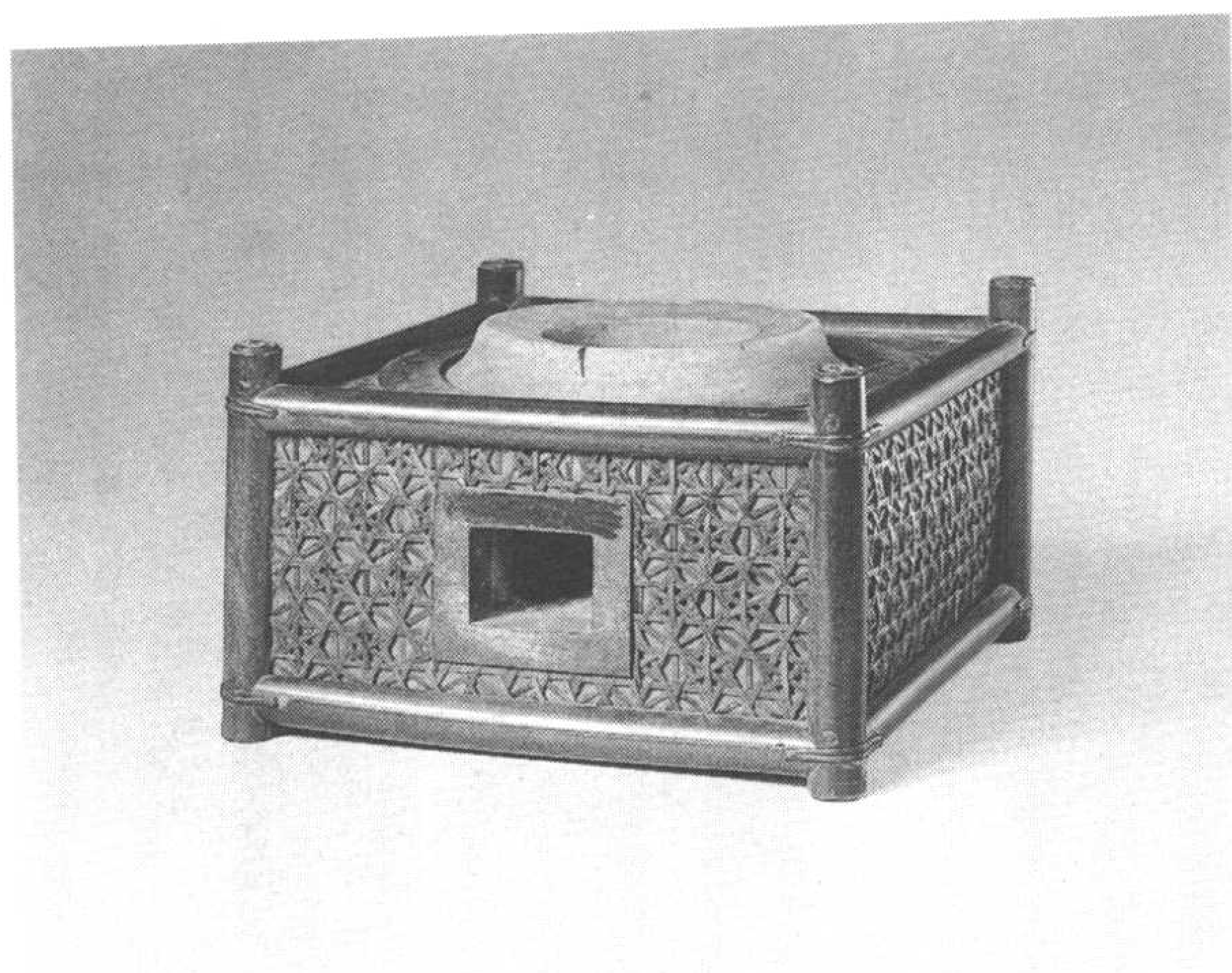
清郎世宁《嵩献英芝图》（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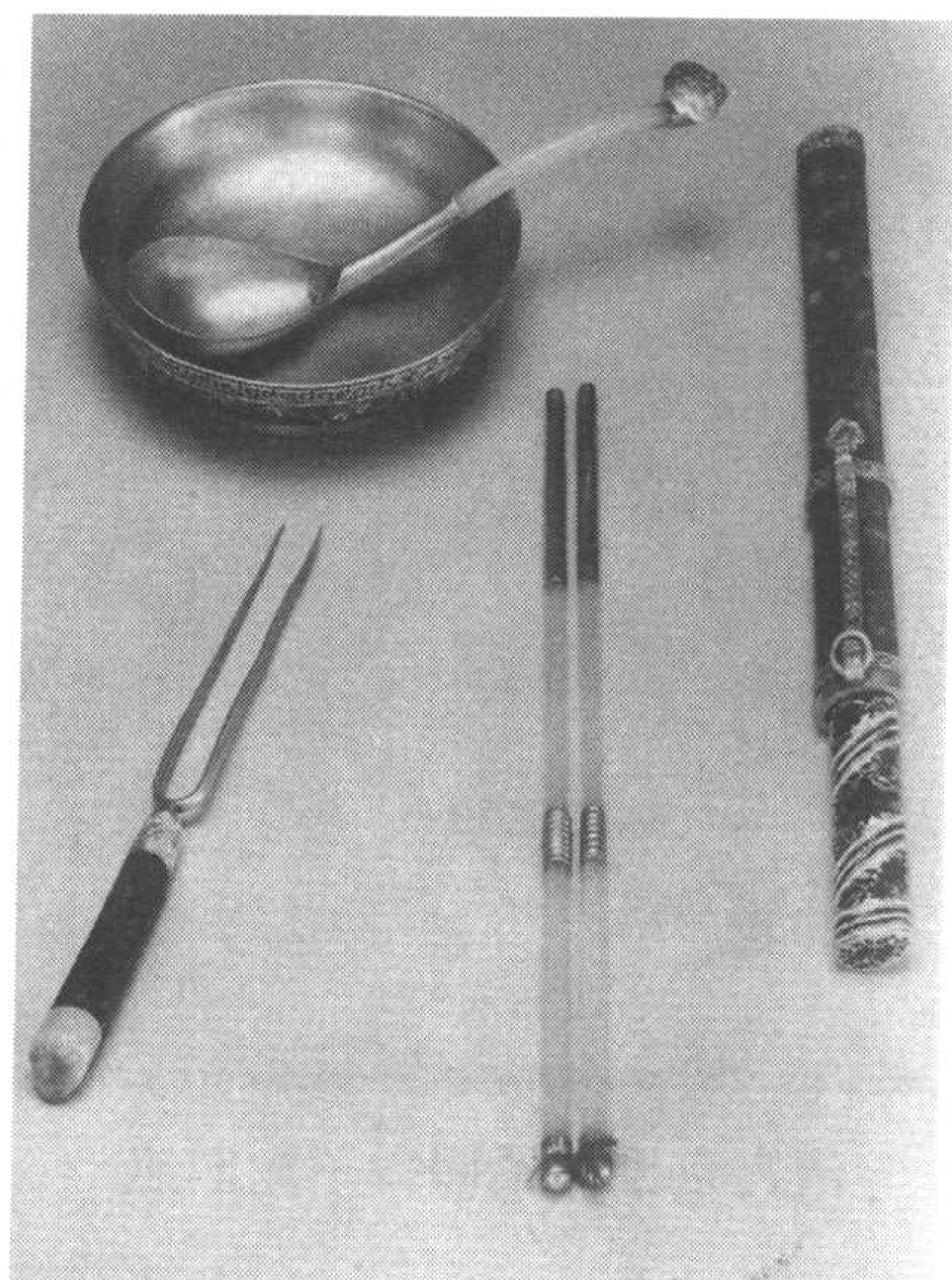
清《白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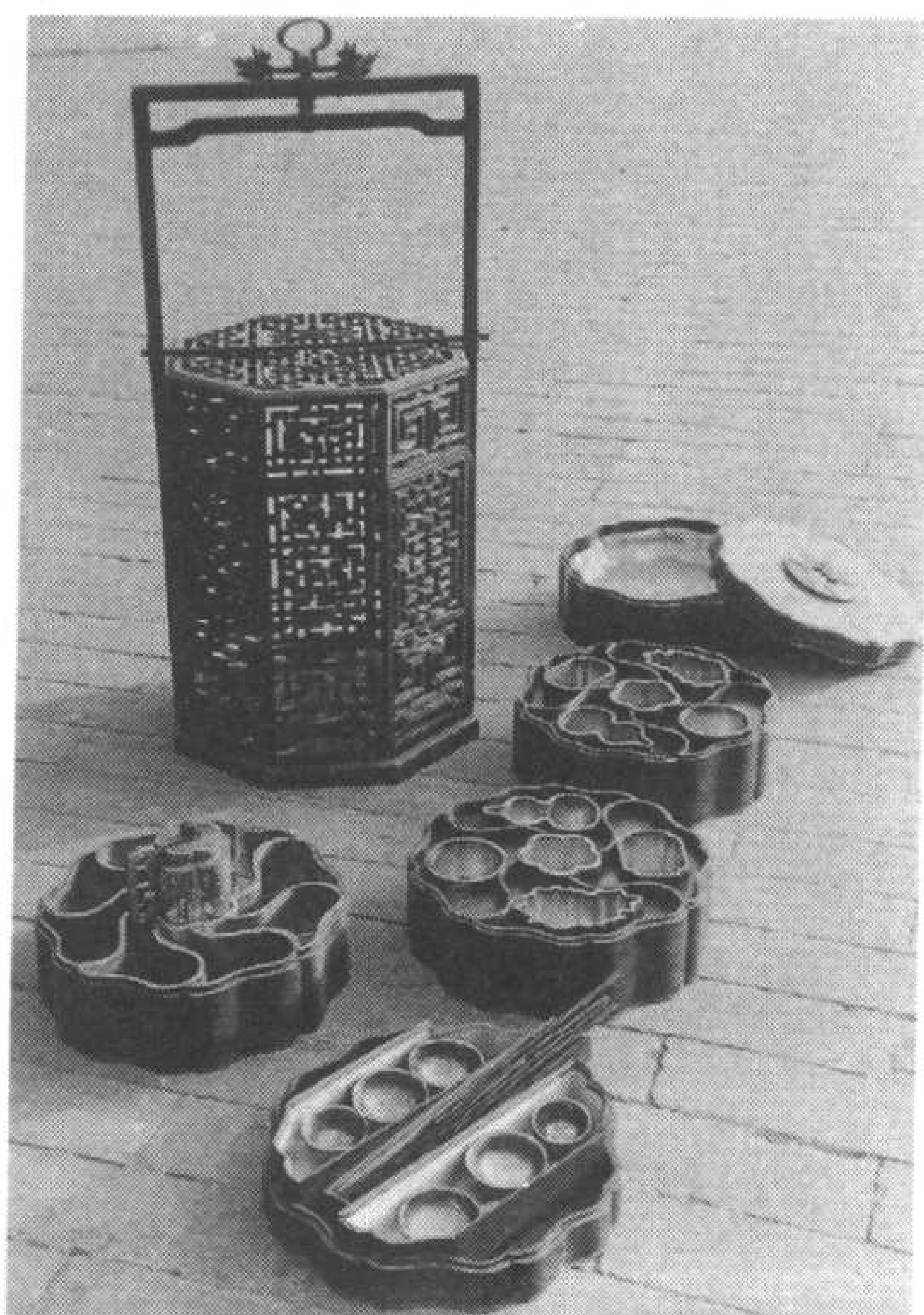
清宫普洱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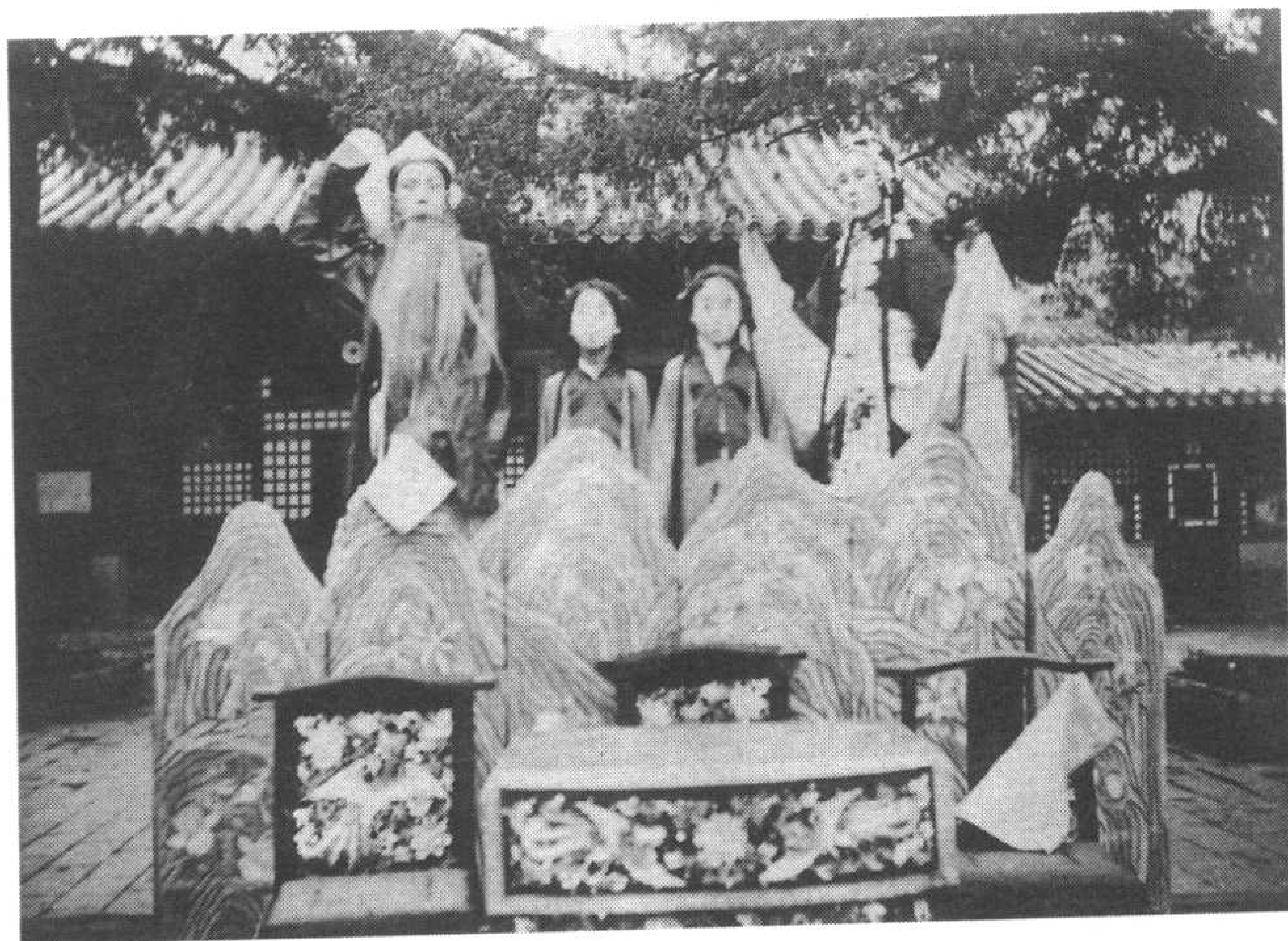
乾隆仿制竹茶炉



清宫餐具



清花梨木多层食盒挑



清宫京剧《桑园寄子》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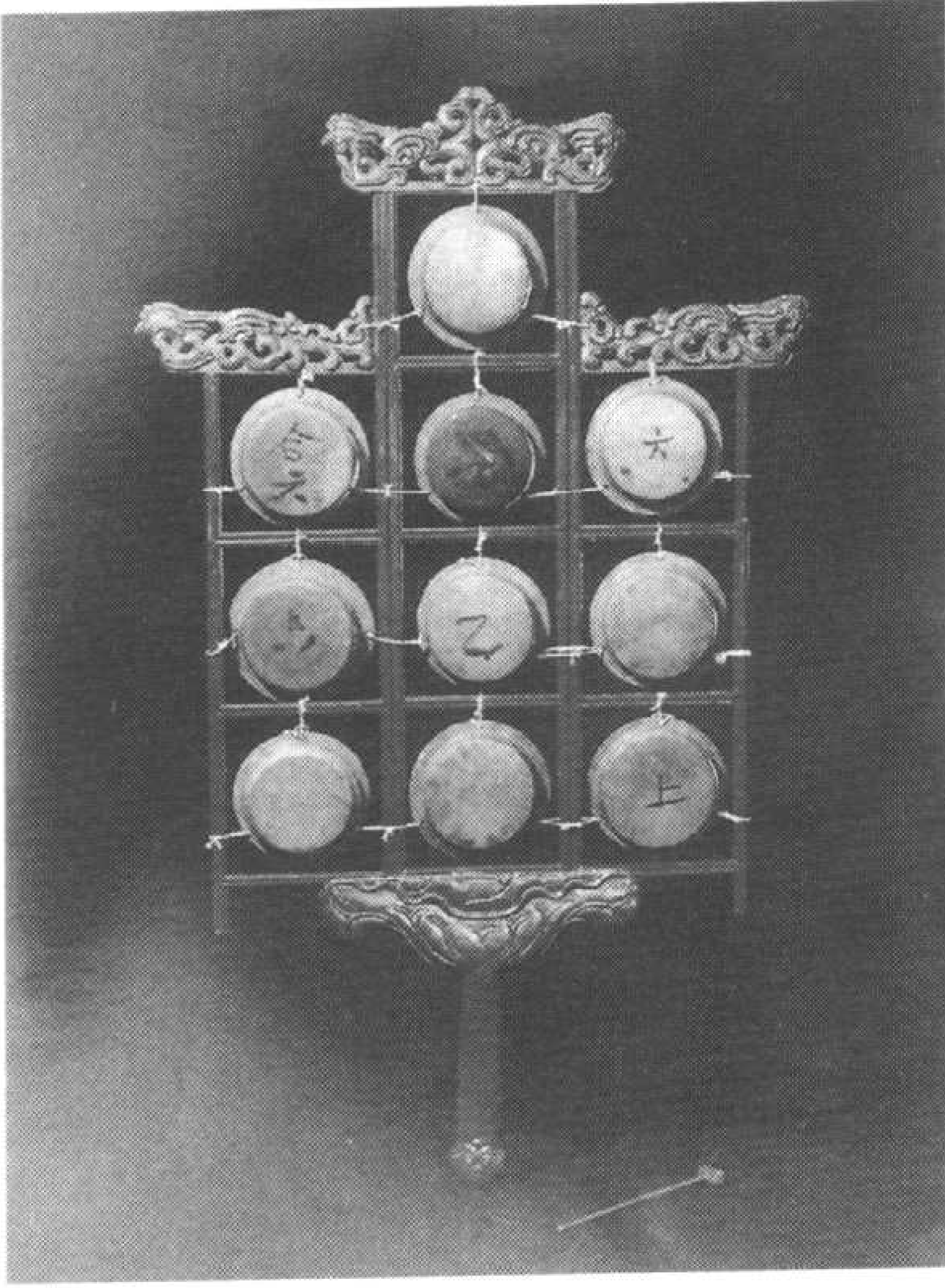
清宫京剧《乌盆记》旧照



清宫升平署戏衣——女靠



方响，群臣行朝会礼时演奏的敲击乐器。钢板皆长 23.328 厘米



云锣，锣面外径 11.29 厘米



龙鼓，面径 49.15 厘米

一样的心愿

皇宫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过去平民百姓是不能进去的，只能远远地望着，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后来，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人们有机会出入了，由于只看到了空空的院落和紧锁的大殿，心里依旧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那就是当初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呢？有的人甚至发现一个秘密：皇宫里怎么没有卫生间？最近在沈阳故宫里发现一个厕所的遗址，不是也引起文物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吗？不知道就要去琢磨，反正知道那是一个人间的天堂，一切都是雍容华贵，极端奢侈的，这一切从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里可以找到依据，帝王的享受只能一代比一代强，绝不会缩减的，即使是偏安一隅、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也要讲排场，直到最后的一息。

其实宫里的人也和外边的百姓一样，向往着外边的生活，如果是从小进宫的

太监和宫女，他们也在琢磨，外边的人又是怎么一个状况呢？记得京剧《贵妃醉酒》里的一句台词："外边的人哪儿知道，这里边的烦恼多着呢！"说开了，宫里宫外的生活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饮食起居，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皇宫里是多讲些排场。有人说皇宫就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皇帝就是家长。就是这样，这个家庭里每天也是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皇帝的麻烦更多些，除了把国家大事处理好，还要关心自己的"小日子"。而且他们和外边的人有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把日子过好。

俗话说："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那么，要知皇宫事呢？一定是要问宫中人了。过去的宫中人是无可寻找了，好在现在宫中还有许多人，他们不是来这里过日子的，而是做事业的，就比如宫廷部的毛宪民先生，我认识他差不多有十年了。那是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一本《中国宫廷生活》，他和他的几位伙伴是撰稿人。那本书有六十多万字，把皇家的饮食起居说了个遍。毛先生和我的交往一直延续了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一直笔耕不辍。正好我社要编辑一套

"文化百科丛书"，我就去找他。他手上有些近年来写的稿子，我看了很是吃惊。因为原来我认为他写得已经很不错了。语言流畅、生动，还有鲜为人知的宫廷逸闻。可现在的稿子明显的有了提高，在深度和精度上，都有了非常抢眼的地方。我们不是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吗？毛先生奋斗的十年中，又该有若干个三日呢？

在这本书名曰《皇宫祈福》里，毛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清代帝后新年节令御书福寿、宫廷万寿庆典福寿食品的特点、清帝祈福求寿的楹联诗文的有关情况；还有宫廷的环卫、防火、演戏等具体安排；还有皇宫便器的考略，这就给前面说的皇宫里怎么没有卫生间找到了答案。这些内容有些是直接祈福期盼吉祥如意的，有些则是在述说过日子的细节。其实御书福寿也好，防火也好，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把日子过好。原本零散的事情，已经用一条看不见但是又非常清晰的线索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既然如此，我们的书名叫《皇宫祈福》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皇宫的生活是豪华的，但是那是对皇帝或者太后等顶尖人物而言的，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如履薄冰、时刻都在是非中的。就连演戏、看戏这样的事，

也弄得人们光提心吊胆还不行，还得具备随机应变的本事。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祸事临头。这些事情，在本书里都能看到。比如清同治帝能唱武生，在三国戏《黄鹤楼》里，他演赵云，太监高四演刘备。这一来君臣的位置就颠倒了。按戏的规矩是刘备上场端端正正地坐好，赵云上来行礼，并且说“参见主公！”没想到同治帝没说完，高四赶紧就站了起来，战战兢兢地说：“奴才，不…敢。”气得同治帝说：“有你这么演戏的吗?”旁边的人只不定怎么忍着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戏里有戏，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发生在皇宫里。过去戏剧界有句话叫“上台无大小，下台立规矩”，一家子在一个戏班子里的事多着呢，儿子演皇帝，爸爸演大臣，照样得跪下磕头。可这句话到皇宫里就不灵了，你知道皇帝这会儿高兴不高兴啊！

现在电视广告词有一句话很时髦，那就是“下面更精彩”！好了，我就说到这里，还是请诸君开卷，自己去寻找乐趣吧。

崔陟　癸未酷暑于红楼

目　　录

宫廷祈求福寿艺术特点

清代帝后新年节令御书福寿

清代宫廷习俗节令中，庆贺活动最多的莫过于新年前后；自立春日，清代皇帝在宫中延庆殿，九叩迎春，为民祈福。

自康熙朝始，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有开笔书福之典。自此清代皇帝在皇宫内廷要亲自御笔书“福”字，所写出来的第一个“福”字要悬挂于乾清宫正殿，其余张贴皇宫内廷各处，以及颁赐后妃贵戚、王公宠臣、翰林近侍等。

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云：

> 溯其缘起，自圣祖时已书赐近臣。查初白集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除夕前一日，蒙恩赐御书大“福”字，恭记七言律诗一首，有“捧出深宫荣并受”句，则当时同直者，皆得受赐可知。又康熙丁未冬，赐大臣“福”字，以蒋文肃廷锡母忧，特书金笺“福”字以赐，时称异数。据此，则自康熙以来，已岁为恒例。

此后，每岁除夕，清帝在元旦凌晨子时，要净面、着冠服，在皇宫内廷养心殿拈香行辞岁迎新礼，再到养心殿东暖阁临窗坐处曰：“明窗”（取窗纸通明，亦寓明目达聪之义）行开笔之典仪式。此后，清宫御赐“福”字仪奉为皇朝典制，为后世皇帝纷纷效仿，敬循家法，岁岁遵循之旨。

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康熙年间，偶蒙亲书“福”字，颁赐臣工，至雍正朝时遂为成例。皇家认为十二月是进入年终的月份，也是人们祈求吉祥、驱避邪魔，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满的终结，并满怀欣喜地恭候、迎接新年。

雍正皇帝御位十三年，每年腊月底都要开笔书“福”字，有“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诸臣奏谢皆称受朕赐福之恩”之谕，这就不仅是在宫苑处张贴和仅赐内臣了，而且还御书“福”、“寿”字，分别颁赐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后朝皇帝均沿袭之。

乾隆皇帝更是讲究书“福”之典，“皆以季冬朔日在重华宫开笔书‘福’”，并赋予御制诗表示永远“绳承家法”。

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记

载：

> 阐福寺建于乾隆十一年。自十七年后季冬之朔，高宗开笔书福，必先诣寺拈香。还御重华宫之漱芳斋书福，岁为恒典。仁宗、宣宗以后，皆踵行之。又开笔书第一福字，所用笔管，端镌正书四字，曰："赐福苍生"。相传为圣祖御用，留贻盖已百数十年。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

乾隆皇帝在使用康熙皇帝遗留下来的"赐福苍生"笔时，此笔非常珍贵，平日贮藏在其御用贮笔檀匣内，匣面上镌刻有寄寓自己所要达到的"大清全盛之势"的"乾隆御铭"：

> 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子孙保之，万祀千春。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乾隆皇帝御书"福"字，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英王和英王的船队官员。

嘉庆皇帝一向标榜自己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书"福"字颁赐，当然也恪遵前代成例。他曾御制书"福"联句诗，注云："御书第一'福'字，悬于乾清宫正殿，其余宫廷园苑等处"，张贴近二十幅"福"字。

不仅如此，嘉庆皇帝在书“福”字之暇，“又颁赐皇子、内廷行走、宗藩、蒙古藩王、大学士、尚书、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官员、御前侍卫、各省督、抚、新疆将军、参赞等，宝墨腾辉，函蒙祉福，诚盛事也”。另别书五七言至十三言朱红云龙笺对联及“长寿”字、“宜春迎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余幅。然后，嘉庆皇帝除恩赐外，还命人在内宫寝殿楹楣处张贴，以示吉祥如意。

道光皇帝“间书‘龙’字赐内廷王大臣，则宸翰偶涉，不为恒典”。

咸丰皇帝从即位元年起，每年“十二月初一午时，重华宫开笔……用‘赐福苍生’笔，写贴用朱红绢‘福’字一张（挂）乾清宫”。

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杂件》的档案中，记载有咸丰皇帝赏赐“福”、“寿”字和春贴对联赐予皇后、妃嫔、贵人、常在等皇家宫眷的名单。另外，还有咸丰皇帝赏赐给伊犁将军奕山、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每人御笔朱红绢“福”、“寿”字的名单。

同治皇帝不但写“福”字颁赐给近臣或张贴宫内，而且还花样翻新地写

“寿”、“喜”、“龙”、“虎”、“福禄寿”、“福寿喜”等字张贴在宫廷院落内。

光绪皇帝每年入冬要先给慈禧皇太后进呈御笔朱红绢“福”字一件、“寿”字一件、朱红笺纸“福”字一件，还有“龙”字、“寿”字，以及祝福吉祥如意的对联等。

慈禧皇太后在六十、七十岁寿辰时，也写了不少“福”、“寿”、“龙”、“虎”等字，赏赐给内外臣工等。慈禧皇太后所御笔书“喜”字轴，纵 179.8 厘米、横 89.4 厘米，其字别具一格。

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在“光绪戊子新正御笔”所书《福禄寿》字，纵 128.3 厘米、横 62 厘米，其字更像是一副画，其“福禄寿”三字拼写出一位“老寿星”，他慈眉目秀，手拄拐杖，手捧寿桃，好不自在。

清臣吴树梅敬题诗一首：

一曲山香白雪高，玉清新赐绛绡袍。
金堂玉室如仙篆，定拜金盘五色桃。

不过，据有关史料记载，慈禧皇太后书写的大字，是由人代笔或事先在纸上打好了字模，然后她在按字模临摹而成。由于慈禧皇太后是一个十足的戏迷，她还特意将“福”、“寿”等字，赏赐给

入宫演戏的名伶等。

清代帝后赏赐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等官员“福”字时，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御赐“福”字场地，一般均在皇宫内廷的乾清宫或重华宫举行。

届时，清代皇帝御赐“福”字者，每岁十余人或不及十人，受赐者依次跪于案前，仰瞻皇帝御书“福”字，叩首谢恩，两名御前太监对持“福”字笺而出，受赐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谢，寓满身都是“福”，再恭捧退下。王公大臣等官员均以得到御赐“福”字为幸事。

特别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在扬州驻跸时，写了不少“福”字颁赐给地方官员、士绅和盐商，受赐者“以为奕世光宠”，“敬装龙匾”悬挂在厅堂，谓之“福”字厅。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瓯北集》下卷三七《乙卯元日》中诗云：

爆竹声中早起虔，望空遥拜九重天。
归田身久东皋隐，祝国心犹北阙悬。
三白腊寒留旧雪，五云晓霁庆非烟。
国家大福吾私福，身阅乾隆六十年。

赵翼这首诗，很能说明那些被宠赐“福”字王公大臣等人的喜悦心态，真所谓“国家大福吾私福”，其身前后世的荣

华富贵，福禄寿喜，都是与皇朝兴衰紧密系结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乾隆朝在任三十一年的尚书王际华，曾得到“福”字二十四张，他不但装裱悬挂堂厅内，而且自诩此屋为“二十四福堂”，真可谓是“光宗耀祖”自不待言了。

清帝书福寿使用的纸笔特点

清代皇帝每岁御书第一“福”字所用的笔，必敬用康熙皇帝珍用的上镌“赐福苍生”正书的毛笔，被认为是“御用吉祥法物”，宜于锡福。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清宫廷遗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毛笔，如一对明堆朱人物雕管笔、玳瑁管紫毫笔、堆黑云纹笔、彩漆描金双龙管貂毫笔、黑漆描金龙凤管笔、雕漆紫檀管提笔、檀香木雕龙凤管笔、竹雕云龙管笔、明万历檀木雕龙管笔等等。

清早期竹管大霜翠毫笔、清康熙白璜恭进“天子万年”竹管翠毫笔。特别清乾隆朝制作的笔保存最多，其质地也最为讲究，形制也十分精美，如有檀香木彩画福寿紫毫笔、黑檀彩漆云蝠管紫毫笔、漆管描金万寿字鬃毫提笔、象牙

八仙雕狼毫笔、象牙镂雕古钱纹管笔、白玉管碧玉斗提笔、青玉龙雕管珐琅斗狼毫提笔、青花云龙管鬃毫提笔、御制诗花卉雕管紫毫笔、象牙管红木斗鬃羊毫提笔、竹管小紫颖笔、漆管鬃毫大抓笔、碧玉山水渔舟笔筒连笔等等。

明清制笔家在笔毫上采用羊毫、鸡毫、狼毫、紫毫和貂毫。根据书写字体的不同需要，制作有管笔、斗笔、抓笔，笔头又分为竹笋式、葫芦式和兰花式等样式。在制作笔管上也不惜成本，有瓷管、象牙管、玳瑁管、玉管、棕竹管、斑竹管、檀香管、乌木管、彩漆管、雕漆管、黑漆描金管等笔管。由于这些毛笔是专门为宫廷帝王制作的，所以雕镂玲珑，富丽华贵，是典型的宫廷“御用文房用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清代皇帝在书写新年（元旦）第一笔时，还要使用清宫饮酒器具“金瓯永固杯”。此杯金质，三象足，夔龙双耳，通体雕宝相花和西蕃莲纹，面镶嵌红、蓝宝石和碧玺、珍珠等珍宝，既美观又庄重华丽。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清帝届时将“金瓯永固杯”置放在紫檀长案上，杯内注入屠苏酒（古俗元日饮屠苏酒可避瘟

疫)，亲燃“玉烛长调”蜡台上的蜡烛，用先帝留之的“御用法物”，在吉祥炉上薰一下，然后以朱墨濡染，端立凝然，亲挥宸翰，书写福寿字和吉祥语对联等。

乾隆皇帝在元旦开笔仪式，曾饱蘸新墨，欣然御书：

三百六旬中一日，富贵贫贱皆新春。

嘉庆皇帝在元旦开笔仪式上，使用先帝的“万年青”御笔书吉语吉联：

嘉庆元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

三阳启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有幸参加过皇帝元旦开笔仪式，目睹了嘉庆皇帝挥毫御书的情景。他所著《瓯北集》下卷三八《嘉庆元年元旦试笔》，谈到此刻的心情其诗云：

履端晨正雨如膏，椒酒今年光倍豪。
龙诰欣传新黼座，羔纶仍有旧宫袍。
推排遂作三朝老，著述将成一尺高。
嘉庆元年年七十，后人应羡此翁遭。

清代皇帝书写的对联和吉语帖，仍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清帝亲挥宸翰书写吉语吉联，无非是以祈一岁之福、一岁

之政和事理，祈求江山社稷平安永固。

清代皇帝所书“福”、“寿”字之笺，质以丝绢，以丹砂为底色，上绘以金龙云纹，由江苏按尺度制造。

明清时期，造纸业发展主要制作用于书写、绘画的“宣纸”，它具有细腻、紧密、均匀、洁白、坚韧、耐久的特点。为了增进纸张的质量，对纸的加工也日趋复杂，有施胶、染色、加蜡、研光、施粉、描金、洒金等方法。这类纸常常作为贡品献入宫廷。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大量的明清宫廷用纸，有明宣德描金云龙纹粉纸、明兰花图蜡笺、明赤壁游故事蜡笺等等。

清初时期的珊瑚色开花纸、御制淳化轩刻画宣纸；康熙曹寅恭进黄纸（附纸签：“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曹寅进黄素笺纸十张”）；雍正罗纹洒金纸；乾隆描金宫绢卷轴、梅花玉版笺、仿明仁殿描金如意云纹粉纸、松竹梅粉纸等等。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从明清皇宫内廷养心殿、乾清宫等殿堂内，换下来的“福”、“寿”字斗封，其框架为普通松木，正方形，中为“井”字格，木条以固定框架，每边长约六十厘米，后装潢饰以黄绢，前是书“福”、“寿”

字的丹砂红绢，其红绢上以黑墨勾勒云龙纹，再施以金、银粉，其龙纹在菱形状框架上方为一正形龙，两侧各为一升龙和降龙，下方为一行龙，其中间为一火焰升腾的银色火珠，周围以流云纹缠绕，其红绢制作得分外精美雅致。

然后，以墨书写的“福”、“寿”字形，恰巧在四条龙纹菱形之中间，显得字体十分饱满大方。显然，这宫殿内悬挂的“福”、“寿”字为皇帝亲笔书写所为。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清帝每年都要按例书写“福”、“寿”等字，所以这个斗封框架上已经张贴了有二十余张“福”字，也就是说，某位皇帝已经使用了这个斗封贴“福”字，至少已有二十余年了。

现在，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内寝宫和坤宁宫大婚东暖阁内，还悬挂着清帝书写的世代相传的“福”、“寿”大字。

清帝祈求福寿诗文楹联赏析

清代乾隆皇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地位首屈一指，因为他即位皇帝时间最长，在皇帝宝座上端坐了六十年，加之太上

皇三年；又因一生显赫至尊，文治武功，晚年五世同堂，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乾隆皇帝对他自己的一生，评价极高，自诩“千古第一全人”，“幸为千古全人”，把他一生中十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总结为“十全武功”，自号“十全老人”。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三集》卷八《十全记》中将其所作所为之功绩，具体概括为：

>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四部为一，扫金川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再加之在历代帝王中享年最高，在位最长，五福五代同堂，所谓集“位、禄、福、寿”于一身的“四得”皇帝，确实自古罕有，享年八十九岁。

乾隆皇帝作为一个太上皇帝，他曾在乾隆六十二年（1797 年即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谕旨中谈到：

> 念圣祖仁皇帝八龄，御极在位六十一年，享寿六十有九。朕二十有五践阼，纪元六十年传位皇帝。春秋八十有七，精神纯固，康健如常，见五代元孙，武功十全，诸福

备具，并未倦勤，日亲训政，此实仰邀昊贶笃祐之隆。逾于皇祖自揣受恩，过厚益凛持盈……。

在清代历史上最好时期的“康乾盛世”，乾隆皇帝自诩为“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诸福备具”。他为进一步向往终身“福”、“寿”，在《乾隆宝薮》中也采以《论语》之“仁者寿”，《尚书》之“飨用五福”来寄托其理想；镌刻制“飨用五福”印章，达十五方。

乾隆皇帝在八十万寿庆典时，仅镌刻制印含“福”“寿”内容，以青田石、寿山石、铜等材料制成的诗文玺，即达六百六十方之多。当时，王公大臣们所进万寿礼物，多选取乾隆皇帝御制诗文，故凡带“福”字的称为“宝典福书”，带“寿”字的称为“元音寿耋”。这些颇具雅韵特色的寿礼，自然使皇帝龙颜大悦，心满意足。

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一记载：

纯庙八旬万寿，华祝嵩呼之盛，尤为史牒未有。万寿盛典中，图绘一门，所画万寿长图凡一百数十页。

当时，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圣节庆典，从圆明园宫门外始，至京城紫禁城，

沿途即建成无数寿山，寿星台，更建有重檐演剧戏台，蟠桃进献，曼衍百戏，胪置前后，观者如堵，人海腾欢。万寿盛会，更是彩坊林立，花架锦簇，奇葩瑶草，丹宝翠阴，纷敷如绘。真是金粟霏香，吉祥缀景，天阊晓景，结构精严。总之，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圣节庆典布景，“极山川之奇丽，缋洞天之胜景”。

而更让人感叹的是，沿途楹联飞舞，尽显“福”“寿”之美誉之词，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又确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可想其当时的文臣学士、翰林词臣的良苦用心。楹联从四言至十七言止，“福”“寿”融化每一楹联词林中，读之令人咂舌，回味无穷。

四言云：

百顺为福，六合同春。

佛天佛日，寿世寿民。

皇建福极，位在德元。

愿圣人寿，近天子光。

五言云：

尧龄增瑞甲，轩纪叶长庚。

九五福曰寿，八千岁为秋。

八徵陈姒范，三祝晋尧封。

祝恒河沙寿，歌大海潮音。

五位逢交泰，三登庆屡丰。

六言云：

景命寿于旗翼，淳风卷彼垓埏。

五福堂同五代，八旬时念八徵。

七言云：

寿星四照环辰北，王会来同暨日南。

皇响福锡庶民福，帝如春与四时春。

位禄名寿德惟券，高明博厚久斯徵。

八功八德无量佛，千春千秋大椿年。

鸠杖作朋春宴饫，莺衣呈舞嘏词新。

春台煦育歌绥万，化日舒长纪大千。

能以美利利天下，是用多福福一人。

八言云：

东西朔南，讫于四海；

岁时月日，惟曰万年。

山盈川冲，受滋介福；

辕萌壤叟，同我太平。

文武圣神，在明明德；

位禄名寿，得全全昌。

敬天勤民，以笃庆祚；

揆文奋武，载扬天声。

九言云：

五十有五年，堂开五代；

八旬兼八月，玺刻八徵。

祝曼寿须弥，化渐印度；

赞文殊师利，景丽台怀。

七曜灿珠囊，荣镜宇宙；

万年帛宝箓，合撰升恒。

十言云：

万古稀逢，岂止三四五六；
一人有庆，直至亿兆京垓。
久道、久照、久成、久徵不息；
贞观、贞明、贞一、贞下起元。
无我相，无人相，无边寿相；
有善缘，有德缘，有大福缘。

十一言云：

五试经纶，蕊榜宏开科甲乙；
七均正乐，葩诗新订谱宫商。
旸雨协丰占，徵念九畴之八；
京垓增泰荚，呼闻万寿者三。
就如日，瞻如云，梯航群介寿；
轩乎鼓，髮乎舞，街壤徧熙春。

十二言云：

翠箓演天元，泰策揲图书正位；
珠弧环斗柄，寿星辉角亢南躔。
期艾应昌禔，七旬赴宴三千叟；
埏垓昭景贶，五代同堂二百家。

十五言云：

集山海梯航，东鲽西鹣，万国图归王会；
感风云律吕，南兜北味，九重乐奏钧天。

十七言云：

八月际昌期，玉琯金钟，谱出一十三徽律吕；
亿年开景福，丹缄翠箓，歌成万八千岁春秋。

以上楹联均记载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一中，可见其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庆典规模宏大。据记载还是仿照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十六年（1771年）孝圣宪皇后万寿庆典办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分三段，令两淮、长芦、浙江商众承办。西直门至圆明园，宫门前由总理庆典大臣等承办。所需经费，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则于俸廉内坐扣，外省则于通省养廉内扣交十分之二五。又漕督、河督、学政、仓场侍郎、将军、副都统、盛京五部、盐政、织造、坐粮厅、各省官差、税务、城守尉，皆分别银数交纳。原拟经费银一百七十一万八千两，嗣减定一百十四万两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

另据梁章钜《楹联丛话》记载：

> 闻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八旬万寿，经坛中有一长联最为壮丽，脍炙人口久矣。相传为彭文勤师元瑞所撰，而恭缮《万寿盛典》中实未之载，仅记录之。惟所闻字句小有异同，无关体要也。句云："龙飞五十有五年，庆一时五数合天，五事合地，五事修，五福备，五世同堂，五色斑斓辉彩服；鹤算八旬逢八月，祝

万寿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元进，八恺登，八音从律，八风缥缈奏丹墀。”

以上所谈到的“五福”，据《康熙政要》云：

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

据《说文》解释“福，备也；福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广义的福即为洪福，洪福谓之福鼎，又称之鸿福，洪福可与天齐。康熙皇帝所采录的“五福”，正是来自于《尚书·洪范》之所云：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我国古代人民所追求的“五福”，其实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一种心安理得、安平富乐的知足心态。

清乾隆皇帝具体解释了在《康熙政要》中谈到的“五福”，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三七《五福颂》中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余以为寿、富、康宁及考

> 终命，皆受之于天，而好德则修之于人。玩五皇极之辞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与此互相发明。中庸言：位禄明寿，必推本于大德，足为五福主德之证。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

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乾隆时期制作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白玉交龙纽。这是乾隆皇帝七旬万寿时，依据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意，镌刻“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自诩“古稀天子”，将景福宫原“五福堂”匾额书为“五福五代堂”，不但墨书御制文《五福五代堂记》，而且还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以永世保存。

在清宫制作的青玉质“八徵耄念之宝”，其印匣镌金字《八徵耄念之宝记》其云：

> 予年七十时用杜甫句镌“古稀天子之宝”，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不敢怠于政也……

现在，让我们欣赏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一五《五福五代堂记》中云：

五福堂者，皇祖御笔，赐皇考之匾额也。我皇考敬谨摹泐奎章于雍和宫、圆明园，胥用此颜堂，以垂永世。丙申年，予葺宁寿宫内之景福宫，以待归政后，宴息娱老。景福者，皇祖所定名，以侍养孝惠皇太后之所也。予曾为五福颂以书屏，而未以五福名堂者，盖引而未发抑亦有待也。

兹蒙天贶，予得元孙，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乡其事则予之。所以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堂，正宜用五福之名，且即景福宫之地，不必别有构作而重熙累庆仍即。

皇祖皇考，垂裕后昆贻万世无疆之庥也。若夫获福，必归于好德，而好德尤在好其善，以敛锡厥，庶民五章之中三致意焉。兹不复赘，予子孙曾元读是记及堂中五福颂者应敬思。

皇祖皇考所以承天之福，必在于敬天爱民，勤政亲贤，毋忘旧章。予之所以心皇祖皇考之心，朝乾夕惕，不敢暇逸，以幸获五代同堂之庆，于万斯年，恒保此福，奕叶云

仍可不勉乎，可不慎乎。

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十六年至六十年期间，每至新正重华宫茶宴廷臣内廷翰林用洪范九五福之一曰寿、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洪范九五福之三曰康宁、洪范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为题联句，并收录在乾隆御制诗集中。

清代康熙皇帝还利用吉祥佛教语等宗教色彩来祈求“福”“寿”，这又可以从清宫珍藏的《消寒益气歌》中看出端倪来。

清宫藏《消寒益气歌图》，原悬挂于东六宫的景仁宫东厢，是另一种形式的《九九消寒图》。其图长39.1厘米、宽28厘米，每九配一图，每图由九个圆圈组成，凡九九八十一圈。自冬至数九始，据天气情况，逐日在一个个圈内以朱色点染，与上述阴阳符号规定同。所不同的是，每图均有祈祷吉祥的佛教语歌词，读来令人趣味无穷。

那么，《消寒益气歌》为什么使用吉祥佛教语呢？

这也许与康熙皇帝诞生于景仁宫有关。另外，人们发现宫中旧藏的档案中，称康熙皇帝为文殊菩萨皇帝、仁圣太平

皇帝、至尊皇帝等。

现将《消寒益气歌》歌词录之于下：

七星拱一图

阿弥陀佛第一声，一九阳回日日增。有位古佛释迦祖，一个木鱼一本经，一意渡众生。

左右合和图

阿弥陀佛第二声，二九阳回万物生。二位仙师和合子，二人同意念真经，事事都亨通。

三星在户图

阿弥陀佛第三声，三九阳回喜气盈。三位星君福禄寿，三阳开泰阳明通，吉人靠天公。

四平八稳图

阿弥陀佛第四声，四九阳回四相通。四面观音四面渡，四时吉庆喜相逢，养气自然平。

一门五福图

阿弥陀佛第五声，五九阳回向阳生。五位古佛正中坐，五伦顺序五路通，无处不兴隆。

六合得正图

阿弥陀佛第六声，六九阳回地气通。西来六祖达摩子，面壁十年渡众生，感化不非轻。

奇财子禄图

阿弥陀佛第七声，七九阳回动春风。七夕仙子从天降，福禄寿考汾阳公，德厚享高龄。

八方朝贡图

阿弥陀佛第八声，八九阳回细柳青。八洞仙人八种宝，齐向瑶池祝寿星，仙酒醉长生。

九五至尊图

阿弥陀佛第九声，九九阳回遍地青。九星斗姥云端坐，九如散与帝王宫，九州复大清。

我们看到清康熙朝的《消寒益气歌》图，它不仅能忠实地记录数九天气变化和细注阴阳符号，而且还能从歌词“阿弥陀佛”声中，集“七星”、“合和”、“三星”、“四平八稳”、“五福”、“得正”、“奇财子禄”、“朝贡”、“至尊”等等吉祥语，反映出皇宫对“福”、“寿”祈求的愿望，和皇宫内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及研究、了解当时深宫中帝王的心态等。

乾隆皇帝继承了前世的衣钵，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初集》卷二八《福禄寿三星赞》中云：

《福》

我受命溥将降福，穰穰大有元亨用，敷锡厥，庶民岂弟，君子受天之祜，永言保之，俾缉熙于纯嘏。

《禄》

俾尔戬谷，受天百禄，惠我无疆，宠绥四方，受小球大球，天其申，命永休，绥万邦，屡半年，万物皆致养焉。

《寿》

天宝定尔，万寿无疆，保合太和，身其康强，君子所其无逸，信彼南山，以引以翼，惟曰欲至万年。

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初集》卷三〇《南极寿星赞》中云：

高弧之南，曰有六星。
聚而为体，一老人形。
一六为七，七日复来。
慈宁大庆，七袠爰开。
绮眉聃耳，曲录其膂。
长头丰额，丝发飘萧。
老人谓予，来祝懿寿。
如髮寿箕，无疆悠久。

清周士彪等辑《类珠·吉事部·寿》卷二十，对“寿”进行了考证：

应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之祝，而居五福（五福：寿、富、

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先者寿也。观于华封祝尧闷宫颂鲁，祝颂之事（诗颂鲁僖公万有千岁眉寿无有□），自古尚之。故夫秀眉介难老之（眉长而秀者多寿），休黄发来（老人发□黄者，寿征），引年之庆笃（诗黄考台背脊上有龟文），维其之祜由是，愿以长生放金龙之鸽（王丞相生日□大卿放鸽数十祝之）。期以遐笑纪海屋之筹（老子云：海变桑田，吾以一筹纪之，今筹满屋矣），以老征献函谷之图（钱穆公为应天府扬次公画老子出关图祝之），冀以永龄摩宫门之狄（蓟子训与一翁摩铜狄曰：适见铸此已五百年），若是者固易发、更齿者（学仙成者齿落更生，发白熏黑），再阅百岁如一舜。伐毛（见仙）洗髓者三等，古今若朝暮（见老人），四百度甲子永进蟠桃八千岁（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春秋时，登若木是果，服白石之髓（王烈入太行山见石，列流髓食之寿数百）餐佐鹿之脯（鹿千年而苍，又五百年而白，而□服餐鹿脯寿二千岁），饱元精于不泄乎。抑又吞甘谷之英，茹商山芝（古有

菊，落英水中，饮之寿三五百岁，商山玉芝服之，故寿)，固元气于不摇乎。则是颂九如之辞（九如如丘陵冈阜，日升月恒，南山之寿，松柘之茂，川之方至)，何非克践，上千秋之（见圣诞)，鉴举足同，称临沅之，丹砂入井诸沃之（临沅民世多百岁，以丹砂汁入井也。诸沃之野，摇山之，饮甘露，寿少者亦八百岁)，甘露为浆皆寿之征也。钦若后世昧自然之，道而忘求长生惑也。尧以多年为过，聃以有身为患，石火电光，何足恃乎。立其不朽神圣至今存矣。

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物精品，其制作上大部分反映着“福”、“禄”、“寿”三字，清代皇帝为寄托“于万亿年”的情思，也是将其这三个字寓意为“三星”。

如清宫缂丝画轴《缂丝加绣三星图》，它悬挂在皇宫内廷的后妃寝室内。画面中部是三星，手中抱小孩子的是福星，身佩玉带的是禄星，手托寿桃的是寿星。在三星身边有桃树、松树、山石、鹿等；画面上还绣有仙鹤、牡丹、灵芝、绿竹、寿菊等花卉。画卷上书有清代乾

隆皇帝的吉语，“锡羡增龄”大意是神明赐予富足长寿。在画心上部绣有乾隆御笔《三星图颂》，其云：

箕畴五福，居一斯寿，富即禄也。继而为偶，曰寿曰禄，资福以受，必有司焉。丽天拱门，旭日和风，松苍花茂，境乎仙乎。胥携手相，好天福垂，蔽佩久司，禄抱子朓。然慈母天星，惟寿如现，于西狱狱，彬彬紫垣，三友锡祉，佑我九有，于万亿年。视此丝络。

乾隆壬寅和月御笔

清康熙时期制作的万寿字瓷瓶，高77厘米、口径37.5厘米、足径28厘米。整个瓶体用青花釉写满一万个不同形体的篆书“寿”字，寓“万寿无疆”之意。康熙款五彩麻姑献寿盘，径25厘米；“麻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曾以灵芝酿酒为西王母祝寿。康熙款万寿五彩盘，口径28.9厘米、高5.2厘米……等等。

清乾隆朝制作的画珐琅花卉开光福字缸，腹径64厘米、高51.5厘米。红雕漆寿山福海插屏，长70.7厘米、宽14.3厘米、高67.5厘米。乾隆款青玉雕百寿字填金盖碗，口径14厘米、高

9.3厘米。乾隆款粉彩八仙庆寿尊，腹径15.5厘米、高29.8厘米。象牙刻海屋添筹插屏，通高150厘米、座长98厘米、宽60厘米等等。

清宫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各种材料的如意，在"福""寿"的运用和制作上，更是尽显吉祥吉利之意；仅以《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六一为例，他所作的《咏檀玉福如意》诗云：

荆蝠出乳穴①，青莲传语真。
何时化为玉，千载白如银。
取譬名如意。须知召自身。
箕畴陈敛锡，愿被万民方。

①片玉如蝙蝠，形世遂借名，为福禄之福，以为如意之首，亦取吉之意也。

清代历朝皇宫内廷的帝后们，为了祈求"福""寿"，在艺术品制作造型或纹饰上，都是以"福"、"禄"、"寿"吉祥如意为主题，这在帝后万寿礼物贡品中也表现得最为抢眼；它们不仅在书画上反映得十分突出，而且在各种工艺品上也反映得十分强烈，在制作精美的工艺品上，更是讲求质量，追求完美，精雕细琢，巧夺天工。

总之，清宫总管内务府所要求做到的方方面面，均要达到帝王后妃祈求盼

望“福”、“寿”满意为止。

宫廷万寿庆典福寿食品特点

清代皇帝、皇太后、皇后及嫔妃等皇家宫眷寿辰之日，朝廷上下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恭敬祝福一番。

笔者仅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煦奏折，来看康熙朝皇帝万寿祝寿之特点。

李煦，清康雍间人，正白旗满洲，祖籍山东莱州府。早年历官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畅春园总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出任苏州织造，并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在织造任内，四十四年（1705 年）因预备康熙皇帝玄烨第五次南巡有“功”，议叙加衔为大理寺卿。五十六年（1717 年）又以“补完盐课亏欠”，议叙加户部右侍郎衔。

现介绍一下李煦奏折祝寿的情况，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二月二十日，李煦奏折恭祝康熙皇帝万寿庆典所书《祝寿折》，其云：

> 窃我万岁文武圣神，四海永清之福主，聪明睿智，万年有道之仁

人。秀芝草而增辉，殿陛荣敷瑞荚，映庆云以呈彩，薇垣星朗长庚，恭逢三月十八日，万寿圣诞，普天称庆，更胜康衢之祝。臣以包衣犬马，惟有喜极而舞，敬设香案，望阙叩头，遥祝圣寿无疆。伏愿万岁，甲子绵绵，日升月恒，齐寿春秋，亿亿天长，地老遐龄。而臣煦遭逢圣主，长沐恩荣，固与向阳，草木沾光无尽矣。臣谨具折奏贺，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踊跃欢忭之至。

朱批：知道了。

清代档案中有关这类《祝寿折》、《请安折》、《贺元旦折》、《贺节令折》颇多，每年臣僚奏折其内容大同小异。如李煦每年的祝寿奏折，其内容几乎与上年奏折内容，甚至词语都差不多，实则是一种例行公事、公文而已。

除了王公大臣、官僚衙门进祝寿奏折外，地方的商人也十分踊跃地表达为康熙皇帝祝寿之心。

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二月初四日，李煦奏《两淮商人延僧建醮祝寿折》，其云：

窃两淮商人，感戴万岁洪恩，莫可报效。恭遇皇上六十大庆，自

二月初一日起，各于江天、高旻、香阜、天宁、静慧等寺，现在延僧建醮，祝颂万寿无疆。而百姓以生长太平之世，又感蠲免钱粮，今恭逢万寿，处处巷舞途歌，欢声动地。理合奏闻。

至于苏州、扬州，自正月以来，天气晴和，二麦秀发，米价照常仍贱。

所有苏州、扬州正月晴雨册进呈，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看来，清代康熙朝时，“蠲免钱粮”，物价稳定，气象万千，太平盛世，的确有欣欣向荣之景象。在此情形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十七日，李煦又奏《淮商进京祝寿势难谕留折》，其云：

二月十五日，臣家人恭齐进呈折子回扬，臣即敬设香案，叩头开读，奉御批：“知道了。商人不必来罢。”既钦奉旨意，商人自当凛遵。但两淮众商欲在京中拜千佛忏，祝颂圣寿齐天，所以于批折未到之前，陆续起身进都，业经多人。其尚有随臣起身者，臣宣示谕旨，而商人

皆云："我等受万岁隆恩，亘古未有，虽犬马尚之感激，况我等俱有人心。今恭逢万岁六十大庆，我等必要赴阙，瞻天仰圣，叩祝万寿无疆，以稍申一点蚁忱，必求奏达天听"等语。臣煦观两淮众商，身受天恩，非常感激，其叩祝万寿，诚心坚决，人人踊跃，必于随臣进京，势不能以谕留。理合奏闻。

臣盐务紧要事，俱皆全办，于二月十九日，自扬州起身叩贺圣寿矣，伏乞睿鉴。臣煦临奏不胜鼓舞欢忭之至。

朱批：知道了。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奏折随王公大臣等官衔们的进呈，必然还要带上所贡献的礼物，其中为祝皇帝万寿不仅进贡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更是以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进献的"万寿九九盒"食物、果品而独具特色。

笔者在谈"万寿九九盒"食物、果品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李煦奏折中所贡食品、果品及调味品等贡品的档案记载。

如康熙三十七年（1697 年）十月，李煦《请安折》内的《进果酒单》云：

佛手计二桶、香圆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计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水仙计四桶、泉酒计一百坛。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1705 年），李煦奏《进燕来笋折》云：

恭请皇上万安。

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恭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伏乞睿智。

至于扬州地方，春气和暖，雨顺风调，万民乐业，无不感颂皇恩，并奏以闻。

康熙四十六年（1706 年）十月，李煦奏《苏属民田收成并进冬笋折》云：

恭请皇上万安。

苏属民田，现在收割，收成尚好，约其大概，可得七八分之数。目下米价一两二钱不等。合奏以闻。

康熙四十七年（1707 年）四月，李煦奏《进枇杷果折》云：

恭请万岁万安。

所有苏州新出枇杷果，臣煦理合恭进，伏乞恩鉴。

朱批：知道了。

另外，李煦除了向宫中进送食物、果品等贡品外，还要向热河进送贡品。总之皇帝走到哪里，贡品等帝后所需求的物品就及时地跟随哪里。

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初二日，李煦奏《遵旨送丹桂至热河折》云：

> 窃奴才家人曹三齐折南回，于四月十八日到苏州云：四月初一日魏珠传万岁旨意，着奴才儿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六月中要到。钦此钦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选桂花，现在雇觅船只装载，即日从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热河。理合奏闻，伏乞圣鉴。

仅从上述所进食物、果品及调味品等其它贡品的情况，即可通过贡品一斑而窥之全豹。

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每年万寿圣节，用绢花二百枝。大宴桌每张用苹果、秋梨、黄梨、红梨、棠梨、冻接梨、槟子、葡萄、核桃、榛子、栗子、红枣、晒山梨、英俄瓣、圆眼、荔枝、干葡萄、做馅桃仁、黑枣。班桌、内用桌、翟鸟桌大致同。

按《枝巢清宫词》注载：宫中以苹果为常供，喜其名也。盘以九为数，皆取果之全红者。果在树未变红时，以墨书“平安吉庆”诸字，果熟拭墨，皆成红地绿字。九皇殿与三宫常年不撤。

当这些各地的贡品源源不断地送入宫中后，其宫中膳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清宫总管内务府。宫中日常需要的米、面、菜、糖、酒、醋等物，则由总管内务府属下的“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管理。总管内务府还设有的其它机构，如广储司的茶库，营造司的炭库、柴库，掌仪司的果房和庆丰司管理的牛、羊群等。

皇宫内廷御膳房（在养心殿之南）对各类食品、果品、调味品进行分类、选料、调配、加工，以此将做出的食品、果品等食物，达到香味俱佳的口感效果。这种由皇宫御膳房精心细致地做出来的食物，再放入“万寿九九盒”内，由清宫内务府总管大臣进献呈上。

可想而知，“万寿九九盒”内的“四大宗”食品，的确囊括了当时天下之美食。这样说，其实并不为过。

何谓带有吉祥福寿寓意的“万寿九九盒”？

自古人们视“九”为最大的阳数，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以此之道所进九九八十一福寿盒食品，充分表示臣下祈祝皇帝永远“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祈福永世万寿无疆之意，的确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

“万寿九九盒”食品种类分为四大宗：饽饽、鲜果、蜜饯、肉食。

饽饽有：寿字饼、万字饼、福字饼、禄字饼、喜字饼、如意饼、福寿饼、鹤年饼、长春饼、百花酥、三桃饼、松仁酥、花桃酥、七星饼、松寿饼等十五种。

鲜果有：苹果、白梨、葡萄、鲜桃、黄李子、南芥、石榴等。

蜜饯有：桃脯、杏脯、苹果脯、梨脯等。

肉食有：熏猪、熏鸡、熏肉等。

这些食品表面上突出了一个“实”字，吃食不受汁汤制约，易于摆放，携带方便，并可相对延长保存时间。然而细细思忖，这种以“实”为特征的“万寿九九盒”中，却又充满了富于变幻和独运匠心之处。

仅“四大宗”食品中，依其式样制作而言，主要集中在饽饽面上的万、福、禄、寿、喜、如意等吉祥寓意的字眼上，

加之那道道阴阳交错构成的美好图像、图案，无不倾注着臣工对其帝王后妃的敬畏和衷心祝福。

再从色泽上看，呈现的有胜似象牙白的饽饽，酷似翡翠嵌芙蓉的鲜桃、紫晶般的圆圆的葡萄、殷红鲜艳的苹果、丹顶红式的石榴、金橙橙的黄梨；蜜蜡剔透的杏脯、黄玛瑙似的梨脯、碧玉晶亮的苹果脯等；以及色泽褐红、腌制腊味扑鼻溢香、十分诱人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熏肉品种。

这些色彩绚丽、美不胜收的各类食物，将顷刻间把宫殿宴桌席面点缀成一个色彩斑栿的美食天地，那诱人的赏心悦目的各类食品，的确令人垂涎欲滴。仅以味道而论，饽饽松软可口，鲜果、蜜饯散发着缕缕幽香，品尝之中又有一股甜丝丝、酸甜适口等多变口感；尤其是熏肉类食品，闻之则含有松烈烟香之气，入口之中又有肉质肥厚而不腻、瘦而又不柴、浓郁酥香之口感。

纵观这些食物，应当说是主、副食品，面面俱全，小吃食兼而有之，其甜咸搭配适度，干鲜调和适宜，完全可做正餐之用；而其色浓、味香、形美食品之精华，能巧妙地浓缩于这“四大宗”

食物里，不也正是宫廷宴席中品类上以少胜多的配餐之用法吗？

宫廷“万寿九九盒”食品的构成，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源于宫中膳食之习俗。如饽饽最早为满族人必食食物，平素皇家宫眷善肉食，喜啖蜜饯，一年四季水果飘香，伴随帝后的饮食，但在烹饪加工制作上，清宫廷却又选择了南味食品。仅以熏肉和蜜饯为例，宫廷御膳房以南味为正宗，用来满足帝后及皇家宫眷之口福。

由此可见，清代宫廷的“万寿九九盒”，体现了南北方饮食文化的融合。

然而，这些蜜香喷溢的万寿祝福类食品，并非皇帝、皇太后等人独享，而主要用于庆寿典礼的隆重仪式中，王公大臣们所进献的“万寿九九盒”食品，不但其装潢精美，而且食物精华非常诱人，再经过皇帝过目后，便旨意赐给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以及由各地来京祝寿官衙臣工以及商贾人员等食用。

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十三日，李煦奏《进京祝寿蒙赐食品谢恩折》云：

> 臣煦诣阙恭祝万寿，瞻天颂圣，得慰犬马下忱。而万国朝贡，欢声

动地，臣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是盛事之躬逢，臣煦已属厚幸。乃又蒙我万岁天高地厚之恩，霁颜教诲，且赏赐饮食，蚁忱感激，欲歌欲舞。而臣妻韩氏回到扬州，又敬述五月初九日，恩赐榛子、鹿肉条、口外蜜饯、果品诸异味。臣煦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夫妇包衣下贱，受圣主之豢养，历数十年之久，今进京叩祝，又蒙万岁隆恩异数。臣与妻韩氏无可报效，惟有朝夕焚香，祝颂圣寿之无疆也。理合具折奏谢，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踊跃欢忭之至。

朱批：知道了。

这种将宫中融合南北方精华之美食，分赐给宫内外人的档案记载是很多的，可以从康熙朝一直沿至后世历朝。

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总管内务府折云：

预算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供献筵宴用及日常用鸡蛋，共六十七万零四十个。御膳房及各处用白米六千六百六十石一斗一升五合，黄老米七百六十八石二斗三合一勺。御膳房内管领，成作饽饽桌张及各

处用蜂蜜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五斤七两五钱。

届时，清宫制作的各种筵宴精美的福寿食品，其采用的各种原料都是十分惊人的。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由清宫内务府总管大臣进献的“万寿九九盒”，经慈禧太后懿旨赐给皇帝、皇后、总管太监首领、亲信太监、宫女、会亲妈妈等不同等级人就多达五十余盒。

清宫皇家寿宴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万寿九九盒”食品，由进贡到赏赐，为君者施皇恩浩荡之计，王公臣僚以及外藩们自然深感荣幸，受宠若惊，承蒙皇上厚爱，谢主降恩，恭祝福寿，既而深表臣子耿耿忠心、尽善尽美之责，以此报孝皇家犬马之劳。

宫廷皇帝卤簿仪象研究

有清一代的卤簿，初期较简，入关后多因袭明制，至乾隆朝始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四等。其銮仪卫职掌卤簿中（从康熙朝始）均设有仪象，兹初步考证如下。

古代宫廷卤簿仪象的简要历史

我国古代驯养大象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殷商时代。

魏晋间的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有“群象耕田”之语。

东晋文学家郭璞咏一首《象赞》诗，仅二十四字，却将大象描写的形象十分生动：

象实魁梧，体巨貌诡。
肉兼十牛，目不逾豕。
望头如尾，动若丘徙。

封建统治者大都喜欢大象和象牙雕饰品，除三国时代有“乐舞象”外，唐朝宫廷里也驯养了大批舞象，其技艺异常高超。另外，驯象还用于战争，以助

长军旅声威。

然而，史书记载最多的是从汉代以来，特别宋、元、明、清历代宫廷均将大象，作为皇帝卤簿仪象加以驯养，备朝会陈设及皇帝郊圜大祀，导驾开道，以示壮观，警跸之用，以此振奋皇朝国威，加强封建主义社会统治。

清代乾隆十三年（1784 年），乾隆皇帝在亲为厘定卤簿制度时，称“参用宋明以来之旧”（《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因此，有必要追溯“宋明”卤簿仪象的历史沿革情况。

实际上，卤簿中有仪象，并非始自宋明，至晚在汉代卤簿中即已出现。蔡邕《独断》中写道：

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

汉应劭《汉官仪》亦有类似记载：

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之为簿，故曰卤簿。

程良孺撰《读书考定》卷二六卤簿云：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名。唐人谓卤橹也，甲盾之别名；凡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

曰卤簿。

《晋书·舆服志》卷二五载：

象车，汉卤簿在前。

《汉书·武帝纪》卷六云：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其驯象即可能用于卤簿。

汉永元六年（94年），亦有“郡缴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六）。晋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中朝，大驾卤簿中“先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晋书·舆服志》卷二五）。可见汉晋都是作为卤簿前导而设用的。

不过，当时卤簿前部多为车，故象皆以驾车。至唐代“开元中畜巨象于闲厩，供陈设仪象”（《三才图会·仪制》），但未见有象车的记载。

宋代卤簿中效仿“自汉卤簿，象最在前”的仪制，也“以象居先”：

每象，南越军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两庄养象所奏：诏以象十于南郊引驾，开宝九年（976年）南郊时，其象止六引前排列。诏卤簿使

领其事（《宋史·仪卫志》卷一四八）。

宋政和大驾卤簿，用“象六，分左右”（《宋史·仪卫志》卷一四六）。宋绍兴卤簿则“用象六、副象一（原注：乾道用象一，淳熙用象六而不设副，绍熙如乾道，庆元后不设）”。（《宋史·仪卫志》卷一四七）

可见，宋卤簿中的仪象是沿袭汉、晋、唐卤簿用象的特点，但不载车，只以象六只为卤簿导驾而设用。

元卤簿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在至治元年（1321年），“英宗亲祀大庙，复置卤簿”（《元史·舆服制》卷七八），其“崇天卤簿”也规定：

> 象六……导者六人，驭者南越军六人……横列而前行（《元史·舆服制》卷七九）。

这说明，元卤簿中也是因袭前代卤簿“象六”的格局。

明洪武元年（1368年），定金吾卫陈设卤簿，在奉天门外之东西，也是设“驯象六，分左右”（《明太祖实录》卷三五）；南京博物院藏有《明宫城图》，两观楼左右宫门前即跪着六只仪象。

明永乐三年（1405年）、嘉靖十六

年（1537年）更定卤簿大驾，锦衣卫陈设卤簿，均以洪武规制为准则。不过据《明会典》记载：明朝中期在重大祭祀典仪中，在各主要街道路口城门处均置仪象，数目较大；大祀南郊时，包括天坛内四门，共设置仪象达三十一只。

明代锦衣卫驯象卫驯养仪象考

明代宫廷驯象卫始建于洪武年间，后又设置了演象所和驯象所，隶属于锦衣卫管辖，专管领本卫“象奴”（军奴）驯养大象，以备朝会陈设及皇帝乘大辂、玉辂等卤簿之用。

明代宫廷驯养的象只，主要来源于各藩国进献和地方土司贡象。

据《明实录》记载，仅洪武至永乐朝，南亚各国，如占城（古国名也叫占婆，今越南中南部）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国王阿答阿者遣于宝部领诗那日勿等来朝贺，天寿圣节献象五十四只及象牙……”；同年，安南（越南）“陈炜遣使贡象及金银器”。

另外，还有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老挝等藩国，以及我国云南腾冲、永昌、车乌户撒等地方土司，总共

进贡大象五十次之多。

明代宫廷驯象的另一来源，是皇帝旨意南方地方官府、军队与驯象卫的配合协作，大量地捕猎野象。驯象卫里有所谓“百夷族人”（即白彝族）和占城人，他们是捕猎和驯养野象的行家里手。《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八月，谕旨：

> 命营阳侯杨通、靖宁侯叶升，领兵捕象于广西左江之十万山。

尔后，明朝廷又派遣驯象卫指挥使司于广西左江，“卫令谪戍三人充卫卒专捕象，每象以一奴畜，俟其驯优始于贡，徙卫治地横州”（今广西横县一带）。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驯象卫进象，先是诏思明太平田川、龙州诸土官，领兵会驯象卫官军往钦廉藤蔼澳等山捕象，豢养驯押，至是以进”。一次，广东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居然向明宫廷进象竟达一百二十七只，真可谓象只数量庞大惊人。

尽管明初宫廷驯象骤增，即便奉旨进象数量大，但卤簿仪象仍依宋、元卤簿之制，以“象六”和“驾辂象”四只来规制。正如前节所述的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定元旦朝贺仪，陈设

卤簿于“奉天门外中道……，驯象六，分左右”的仪象阵容。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六月，“命礼官重定朝贺传制等仪”，凡正旦、冬至、圣节、朝会等仪制，锦衣卫典牧官陈仪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副《明宫城图》，它细致地描绘了皇宫午门前跪着的仪象六只，左右各为三只，它们身披屜，呈红色几何纹，饰形各异；而它们身后是巍峨壮观的五凤两观楼，看着六只跪在皇宫门口警跸威仪的庞然大物，似有“驯象六，分左右”的卤簿意境，这怎能不令人“肃仪而拜”呢？

随着政治中心北移，明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宫廷驯养象只也随之北迁。

《钦定日下旧闻考》和《燕都丛考》等史书都记载，象房建在皇城“宣武门西城墙北”，即今北京城宣武区象来街一带。“象房系前明弘治八年（1495 年）”修盖过。但推测象房的建立，应和紫禁城皇宫的竣工，时间上相距不会太远。

因为，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十一月，北京紫禁城诞生之际，一位波斯使者以亲身经历著述《沙哈遣使中国记》，写了紫禁城皇宫午门前驯养的仪

象：

> 十只大象站在宫门的尽头，左边五只，右边也是五只，象鼻伸向路上，使臣们穿过象鼻，进入皇宫。

这一皇宫落成的盛典气势，皇帝卤簿仪象规模，是多么的恢宏、壮观。

明代宫廷每年初伏至三伏日，是驯象的洗浴时节，成为明朝京城一年一度的佳景盛会。

届时，明“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即宣武门——笔者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城下岸边还搭盖了彩棚，设立仪官公廨监督洗象，他们身着整齐的官服，挥舞导引象群的小旗，钟乐齐鸣，歌吹不断，观者云集，喧哗起伏，热闹非凡。

明代文人骚客纪录下许多有趣的“洗象”纪实性诗文，吟咏颇有韵味。

刘侗《帝京景物略》云：

> 象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者两岸各万众，面首如鳞次贝编焉。然浴之不能须臾，象奴辄调御令起，云久则相雌雄，相雌雄则狂。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观“洗象”

后，诗云：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
决荡粗泥落，吹喷细雪残。
鼻卷荷屈水，牙划藕穿澜。
出没漩涡口，崔嵬甃岸端。
巴蛇吞未干，滟石浸还乾。
逐队趋蹄易，呼群拭背难。
秣刍厮养习，湔刷羽林官。
并是生殊域，同来饲上阑。
不争侍力大，共荷主恩宽。

明代锦衣卫在长安右门外，管辖着驯象所和演象所。当南方或南亚各国进贡宫廷大象被“象奴”护解京都象房后，首先由“象奴”来对这些象只进行严格的训练。

明《野获编》云：

象初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其在象房，人有入观者，能以鼻作觱篥铜鼓声，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

看来，驯象与“象奴”配合的相当默契，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的地步。然后，才可交驯象所接受进一步符合宫廷卤簿典仪的训练。

驯顺听话懂人意的大象，将受到皇家饲养的特别优待。“象咸有俸，视年劳为多寡”，并以先后为序安排位号，如同宫廷武弁接受封爵，根据位号食几品料；同样，常朝驯象值班“立仗”，所站立位置方向也要视其爵禄高低，先后为序。

据《广信府志》记载：

> 朝仪，每日早朝，午门外用象六只，夹陛而立，俟左、右掖门启钥，象始下朝，见者乃肃仪而拜，此常仪也。

如皇帝未上朝时，仪象可以纵游吃草，但及“钟鸣鞭响，则肃然翼待，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退朝时驯象又恢复如常左右而立。

> 嘉靖辛亥（1551 年）九月十日，值班之象偶病，令一象代之，其象也不乐行，象奴强之，途间每喷喷作声，若抱不平状。及至西安门方启钥，因天尚昧爽，门概尚存焉，象鹿以鼻触之，门概斩然两折，闯门而入，立承天门（今天安门，清顺治八年（1651 年）重建始改名——笔者注）下，不肯进；群象后至者相率导之乃行，然犹有不平状，

象奴莫能制。

若这种极不驯服有过失或伤人的驯象，一则“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二则“贬秩”，不但撤消优厚饲养食品料，而且“立仗必居所贬之位，不敢仍常立”。

可怜这些从南方崇山峻岭而来的驯象，仍要受到朝廷皇家的淫威统治。

关于明代宫廷驯象，在皇帝卤簿中究竟要使用多少只？

若依《明实录》或《明史》均为“驯象六，分左右”，并且欲因繁就简，均“以洪武创制为准则焉”（《明史》卷六四）。但据明弘治朝孝宗旨意徐溥主编的《明会典》，弘治十五年（1502 年）成书一八〇卷；后嘉靖八年（1529 年）续修，世宗皇帝敕谕内阁，要求“正其差讹，补其脱漏”；至万历年间又重修《明会典》共二二八卷，其中最后一卷中，记载了锦衣卫驯象所“备朝会陈列及驾辇驮宝之用”的仪象情况：

凡大祀用象三十一只：

大明门象二只、长安门左右门象四只、正阳桥象二只、正阳牌坊迤南东西街象二只、西天门里外象四只、南天门象二只、东天门象二

只、北天门象二只、北天门象二只、斋宫各门象六只、宝匣象一只、玉辂辇象二只。

凡圣节、正旦、冬至三大朝会用象三十一只：

宝匣象一只、玉辂辇象二只、大辂辇象二只、奉天门前象四只、东西角门前象四只、午门象六只、端门象四只、承天门象四只、长安左右门象四只。

凡享太庙用象十只，列于承天门内。

凡常朝用象六只，列于午门前。

以上记载，可知明代中、晚期皇帝卤簿中仪象使用情况之一斑。

但明朝末期，皇朝内忧外患，特别宫廷内宦猖獗，专断国政，政治日益腐败，加之社会极度动乱，国力日趋衰落，锦衣卫驯象所也随之走向末路。

清代銮仪卫驯象所养象考

清代銮仪卫沿袭明代锦衣卫驯象卫即演象所和驯象所制度，从顺治元年(1644 年）开始，即设置驯象所东、西二司，以驯养“皇帝卤簿”使用的仪象。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

隆十三年（1748 年）定，驯象所民尉二百零二名，每月仍皆给银九钱五分五厘”；“十四年（1749 年）又定，喂象民尉缺，即以民尉所生之子补充”。

“民尉”，在明代宫廷是专管喂象、驯象的“象奴”。清袭明制，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驯象所有“校尉二百零六名”，而且，乾隆、嘉庆、道光等朝，每三年由銮仪卫“行文工部，照例办造细蓝布面羊皮二百零六件”（《銮仪卫全宗档》卷一四三，以下简称《銮档》），以旧换新。

通过清代档案，可窥銮仪卫驯象所对仪象之重视，可见一斑。

（一）象房

銮仪卫驯象所（明代称“象坊”），遗址在今“宣武门西城墙北”，无疑是明代锦衣卫的遗产，这在《钦定日下旧闻考》和《燕都丛考》等史书和明清笔记中均有记载。

《燕都丛考》中附有城区简明图，对“象来街”（街名现仍延续使用）有细致的描绘，城墙边还标有“象房桥”字样，当然这些遗迹早已不复存在了。

但当时各国进贡、地方衙署采办或当地土司上贡的象只，均要经过象来街，

蹒跚地被驱入驯象所房内驯养。

象房的建筑规模到底有多大?

史书仅仅记载着象房在明“弘治八年（1495 年）加固修盖”。通过这一线索，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銮仪卫全宗档》档案，可略见端倪。

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十一月初二日，廓尔喀（尼泊尔）进贡牙象一只，入四十二房”（《銮档》卷一三八)。这说明驯象所管辖的象房至少有“四十二”座，从而使我们大略窥视清代銮仪卫驯象所的建筑规模，以及驯象所驯养象只的情况。

笔者撷取、归纳清档记载，将乾隆朝至咸丰朝之间，銮仪卫驯象所喂养象只数额统计如下：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十一月，本卫喂养象三十只；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十二月，本卫喂养象三十四只；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七月，本卫喂养象二十三只；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二月，本卫喂养象十九只；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四月，本卫喂养象二十三只；

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本卫喂养象十七只；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二月，本卫喂养象十七只；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本卫喂养象二十二只；

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本卫喂养象十八只。（《銮档》卷一四四至一四七）

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本卫喂养象三十四只；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本卫喂养象三十五只；

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本卫喂养象三十二只；

嘉庆六年（1801年），本卫喂养象二十八只；

嘉庆十五年（1810年），本卫喂养象十六只；

嘉庆十七年（1812年），本卫喂养象二十一只、小象一只；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闰四月，本卫喂养象十九只；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本卫喂养象二十二只。（《銮档》卷一四八、一四九）

道光三年（1823年），本卫喂养象九只；

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本卫喂养象十二只；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本卫喂养象十五只；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本卫喂养象十二只；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本卫喂养象十一只；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本卫喂养象十一只。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本卫喂养象六只。（《銮档》卷一五五）

嘉庆初年，驯象所喂养的象只竟达到三十五只之多，这是乾隆朝留下来的遗产。因为，乾隆末年，象房已拥挤不堪，乾隆皇帝只得通过谕旨，拒绝收纳进象。

每只新象到驯象所来，将被及时地安排到“某某号”象房。

例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二月十六日，安南国（越南）进四十房牙象一只”（《銮档》卷一三八）；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驯象所于九月十九日南掌国（老挝）进

象三只，到卫分补三十三房、三十四房、三十九房。照例新象到卫，每只应行工部办造象具”（同上）。

以上说明，每号象房只能安放一只大象。

（二）象具

为使新象“安居”，还要为每只新象置办一份“象具”，诸如象毡、象被等。此事责工部“赶紧办造”、“幸勿迟缓”，以免象只严冬受凉。

另外，象只的饮食器具和驯服象只的铁器工具也要备齐。工部是专“掌天下造作之政令与其经费”的机构，它管辖的制造库，其中一项即负责銮仪卫卤簿、车驾、仪仗等器具的管理修缮。

每只大象需要的一份象具：

象毡一床，长二丈二尺、宽一丈八尺；

象被一床，长二丈二尺、宽一丈八尺，蓝布面白布裹，重九十斤；

铁索二条，每条二丈五尺；

铁绊二副，每副凑长二丈；

铁蒺藜六十个、铁头竹杆枪二枝、铁头木杆钩枪一枝、铁头木杆铙钩一杆；

铁锅一口，口面（径）二尺五寸；

大木桶一只，高一尺六寸，口面

（径）一尺六寸，铁箍木耳；

饮水桶一只，高一尺，口面（径）七寸，铁箍铁梁。（《銮档》卷一三八、一四一）。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驯象所有小象二只，咨文工部办造象具。工部认为，小象所用象具应"酌改轻小"，銮仪卫回咨则曰："象只备用，其丈尺、斤重难以酌改轻小，是以遵照大象旧例行取"。并再次重申督办，"其丈尺斤重，毋庸酌改轻小，即造成大象应用旧例办造，完竣送卫，以便备用可也"（《銮档》卷一四一）。

每只象所用象具，规定一般使用期为五年。届时由銮仪卫催促，"相应行文工部支取"，以旧换新。

乾隆朝，对銮仪卫要求速造象具，都能有求必应，绝不敢"任意久悬"。

然而到了嘉庆朝，銮仪卫失却了前朝发号施令的威风，虽严责工部速造象具，但工部却不那么雷厉风行，而是软磨拖延，甚至有些玩忽职守了。

嘉庆十三年（1808年）七月，銮仪卫咨文总管内务府、工部："本卫于去年十月十一日，两次新象到卫时，立即行取工部造送（象具）在案。迄今尚未送

到，除现毙象一份，毋庸再造送外，尚短锅、索五份，因何任意久悬？现在立等应用，应移咨工部，迅速赶紧办造送卫，毋得再迟可也”（《銮档》卷一四一）。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二月，銮仪卫再次咨公文督促：“本卫本年正月内所毙象一只，系十二年分到驯象六只之新象，所需锅、索等项，屡经本卫节次催工部造送，讵竟任意悬宕，迄今终未送卫。兹除去年闰五月，并本年正月内所毙新象二只，毋庸造送锅、索外，尚有新象四只，应用锅、索四份，业已隔有年余，毋得再为拖延，不成体制。务于文到十日内迅速造送，毋任玩视可也。”

嘉庆十二年，銮仪卫驯象所分来六只新象，至十四年还未解决必备的象具，这可能与嘉庆年间社会的动荡不安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新象来自云贵高原的青山绿岭、原始森林，难以适应气候十分干燥寒冷的北京城，“各新象际此严寒初到，又加沿途行走疲乏，自应急需毡被，赶办送交，以资安养而御受冻”。对驯象所连“毙新象二只”，从公文上分析，把责任推诿到工部身上是情理中的事，因为

没有备其“象具”，是“毙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饲象

銮仪卫驯象所喂养大象的饲料，由户部统筹调拨解决，具体办法是每月提前将下月喂养的象只实数，咨公文户部核实后纳领。

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本卫养象三十只，每只一昼夜食老米三仓斗、稻草一百六十斤，共应领本年十二月份喂象老米二百七十石，稻草十四万四千斤”（《銮档》卷一四七）。对于刚刚进入驯象所的新象，供应的饲料据实天数进补，小象则照例减半。

驯象所校尉对小象的喂养格外照顾。一般小象都是在象房内出生的，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乐事，每逢这时校尉们便昼夜值班，精心照料。

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驯象所喂养小象一只，昼夜应用拌饭薑、糖，并看象校尉所需用炭、蜡等项，每日用银五钱在案。今应领本年三月份薑、糖、炭、蜡十五两。

试想，二月的北方，春寒料峭，用薑、糖拌饭喂养小象，可起到驱寒暖身的保健特护功效。

（四）毙象

毙象大多为老死或病死的。据记载，病象耳中出油，谓之“山性发”。

如嘉庆十二年（1807 年）九月，銮仪卫驯象所为“象只倒毙”给总管内务府堂稿曰：查本衙门旧有象只及新到之象只二十只，除现患病流油病症者象三只外，仅剩象十七只，此内若偶然患病恐不敷用……（《銮档》卷一三九）。这种担忧不是偶然的，象只一旦患了“流油病症”，就会因无法医治而死去，也就必然会影响“皇帝卤簿”之仪象的应差。

对于毙象的处理，工部即刻呈文銮仪卫，对“每个毙象所用过的铁索、锅、绊等，由工部查收，另铁挠钩重四十斤”，一律立即上交工部。同时将毙象知照户部，将下月供应的老米、稻草“抵扣在案”。

驯象所不但严格照办，还按规定剥掉象皮、取下象牙，一同上交内务府。据清《銮仪卫全宗档案》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 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倒毙象一只，所有左牙一只长一尺、右牙一只长一尺，相应交内务府；磕碎大小牙劈二十七块，相应咨内务府查收。”即便象只没有倒毙，如果有“截落”的象牙，

也要一点不留地交给总管内务府收存。试想，清代象牙工艺品的原料，当然主要来自各国进贡的象牙，但其中的一部分也许就来源于銮仪卫驯象所。

（五）洗象

銮仪卫驯象所每年初伏日，都要让象只在护城河中沐浴一番。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

洗象，会典自顺、康时已然。

乾隆二十三年（1767年）六月，驯象所呈为“放水沐象事，照得本年六月十八日初伏起，所有本卫象只轮流沐洗，相应行文工部，在宣武门外滚渡闸西沐洗，可也”（《銮档》卷一四〇）。

其实，“放水洗象”只是清代銮仪卫沿袭明锦衣卫象所的故事。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云：

每年六月初伏日，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濠内洗濯。

清代画家丁观鹏绘《弘历洗象图》（轴），纸本，设色，纵132.5厘米、横62.6厘米。图中弘历装扮成佛教里普贤菩萨的样子，正在观看众人洗刷白象，白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画中乾隆皇帝弘历及部分人物的头像，当是出自郎世宁之手，人物的衣服及背景为丁观鹏所

绘，线条抖动弯曲，很有特色。

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些有关“洗象”题材的工艺美术品，乾隆皇帝也多有吟诗。如他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六二《洗象歌咏宋宣和端石砚》，其诗云：

宣和博古通儒释，选材制砚凿端古。
命工刻作洗象图，不述圣经述佛迹。
应知洗象寓色空，而何通全启金隙。
汴梁富丽一朝尽，可怜龙宾埋瓦砾。
是谁得之谁用之，依旧无言演梵筴。

乾隆皇帝对銮仪卫驯象所大象很感兴趣，特意吟诗《姚文瀚扫象图赞》，并将其收集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初集》卷二八，诗云：

檀林宴坐，义手如如。
牵来香象，课童埽除。
象即非象，尘自何来。
曰何来者，宁非纤埃。
踏河到底，惊雷成纹。
具此正见，曾不疏分。
大士不言，象自了了。
运帚挥苕，侍者颠倒。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初集》卷三十《赵孟宽浴象图有赞》中云：

五蕴六根，人物皆具。

岸然香象，岂不可度。

以八得水，浴四大身。

曰浴非浴，则堕声闻。

清嘉庆、道光朝《銮仪卫全宗档案》都较全面地记载了每年初伏日，请工部开闸放水，让大象尽情地沐洗。这是清代銮仪卫的规章，也形成了驯象所的惯例。

在清代，每年初伏都要举行隆重的“洗象”仪式，成为当时京城一年一度的佳景盛会。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迎春洗象，旗手卫官率校尉陈设金鼓。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盛》中也记述了乾隆初年的沐象情景：

銮仪卫驯象所，于三伏日，仪官俱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之。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

正如当时《竹枝词》所云：

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

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王继皋《六月九日宣武门外洗象十韵》，其中有“旗鼓壕池涨，喧阗男女

窥”；“两岸人如壁，连镳官共随”之诗句。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更简捷地描述了洗象现场：

> 六月初六日，宣武门外护城河洗象，当年此日，游人士女极多……。

谁不想看看敬供皇朝“卤簿”中的仪象呢？兴奋中人们交头接耳，喧哗笑语，满足了好奇心理，也使生活在北方的大象，在河水中“沉浮山起伏，嘘吸雨纷丝。垂首欣先浴，前纵恋久嬉”。其热闹非凡的“洗象”场面，可窥一斑。

查阅清代《銮仪卫全宗档》档案，关于驯象所洗象，乾隆朝还有这样一种惯例，即“每年沐洗象只，预备公案棚座饭食等项，需用银十五两”（《銮档》卷一四〇）。清代档案虽记载的是乾隆年间的事，但我们因至少推至顺治、康熙年间，因为乾隆朝銮仪卫驯象所，也是根据前朝“旧例”行事的。

但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五月，驯象所呈文“六月初十日初伏，应行沐洗象只，预备公案棚座茶水等项，应领银八两”。在此以前均准备“饭食”，现在则改为“茶水”；银两也由“十五

两”减至“八两”。从这里也反映了道光朝末年内帑日见空虚，国家内外交困的情景。

到了道光朝后期，随着象只进入驯象所的日趋骤减，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日趋腐朽，礼制尽摧。这无疑影响了后朝的政治、经济基础，“故咸丰以后十年象房无象”（《燕京岁时记》）。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虽安南国有进贡象六、七只，但后因象疯，“掷玉辂于空中碎之。遂逸出西长安门，物遭之碎，人遇之伤”（《天咫偶闻》），从此象不复入仪仗。

光绪十年（1884 年）后，“京师遂无象”。

最后，笔者以清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来结束此节。

其一，因为清乾隆皇帝曾路过銮仪卫驯象所，故特去驯象房观赏过这些庞然大物，其喜爱程度可窥一斑。

其二，至佛教产生后，象常用以象征释迦牟尼，在下凡入胎和六牙白象等本生故事中，象就是佛的化身，因而受到皇朝特别重视。

所以，乾隆皇帝特写《驯象歌》给

予赞美，从诗咏中可以看出这些驯象所大象，还特意为他做了精彩的表演，其御制诗收在《清高宗乐善堂全集》卷二十，其诗云：

皇灵赫濯昭八荒，西极咸池东扶桑。
于阗盘况求王章，岁岁奉贡来九阊。
厥贡维象象云驯，庞然巨体性孔良。
金羁锦襟饰身首，正朝分立金门旁。
玉辂金辂高数丈，驾缚安稳行堂堂。
升平仪卫匪异物，屹然排仗威遐方。
我闻象形如珂雪，又闻象力绝羁镶。
生花拄地曾耳听，究竟未见嗟荒唐。
辛亥九秋猎海子，路西却过驯象房。
因缘一览惬宿愿，长准大武诚昂藏。
蛮奴五六蹋其背，随所使令如驱羊。
或俯厥鼻一叩地，特作鼓声鸣镗镗。
仰天时亦戛长韵，鼻孔呕哑吹笙簧。
渴来吸水尽巨瓮，俄然喷出如西江。
作乐者曾效率舞，占星闻说散瑶光。
犹猊狮子称善吼，山林巨足供庙廊。

清代皇帝卤簿仪象的主要来源

从清顺治朝至咸丰朝，南掌（老挝）、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尼泊尔）、缅甸等国都向清廷进贡大

批驯象。

各国进贡宫廷象只方式有二：

（一）按清廷所定贡期照例进象。

据清代档案统计，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至五十八年（1793 年）间，南掌、暹罗、安南、廓尔喀进象十四只，尤以南掌国进象最频。

（二）在帝、后万寿节进象，以示祝贺。

据《云南通志》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南掌国王为“庆贺万寿进象二只与年贡驯象二只，并进”。乾隆时期，南亚各国总共进象达五十余只。

清代宫廷另一条仪象来源渠道，即谕云贵督抚采办象只和当地土司贡象的相互结合。

清代档案记载，当地土司入贡驯象都“堪以拉玉辇、驮宝瓶”；再则也以恭祝万寿节进贡驯象为主。官方采办象只，主要责成云南普洱、永昌（今保山县）、顺宁（今凤庆县）三府于所属土司内购办，银两则由“该府存公银内先行动项垫发承办”。

清代乾隆年间是清卤簿制度完备的时期，也是銮仪卫驯象所象房豢养象只

数量最多的时期，其养象数量高于清代历朝。

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一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十一月谕军机大臣等：

> 向来安南、缅甸、南掌等国，俱有例进象只。因其远道抒忱，均予收纳。现在銮仪卫有象三十九只，为数已多，若年复加增，不但象房不敷豢养，抑且虚縻禀给。著传谕云贵、两广督抚等，嗣后外藩所献方物内，如有象只一项，该督抚接到咨会，即可檄知该国，以天朝梯航毕集，现有象只甚多，除别项贡品，俱准其呈进外，所有象只不必收受送京，在各省既可免长途伴送之费，而该国亦可省购觅之劳，实为两便。

当然，各国“远道抒忱”进贡清皇朝的象只，朝廷不可推回以免失礼。乾隆皇帝想出“实为两便”的办法，也只好由云贵、两广督抚将象只代收驯养。这样，实际又增加了地方省府衙门的经济负担，但客观上又形成了安置这些驯象的“大本营”和托收转运基地。

若一旦銮仪卫咨文驯象所需要予以

补充象只时，即由兵部令地方督抚担当责任，委派武职游击（三品）、守备（五品）等官员，全力以赴，带领武弁兵役和“象奴”，立刻将所需象只“护解入京”。

“护解象只”也惊动了清乾隆皇帝，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四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辛丑谕军机大臣曰：

> 福安康等奏，廓尔喀进贡象只马匹，在途行走情形各折。据称廓尔喀进贡象、马，因哲孟雄宗木，道路难行，绕由巴尔底萨杂哩部落，行走布鲁克巴等。俱派人护送，并预备草料喂饲等语。布鲁克巴部落，见廓尔喀进贡象、马，经过该处，即派人护送供支，极为恭顺。而巴尔底萨哩部落，向来未通声教，亦能派人照料供支，尤为驯谨可嘉。著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蟒锦缎四匹，以示嘉奖。计此旨到时，若福康安已经起身，即著和琳将赏赐物件分颁给。至廓尔喀所进象、马，经福康安等遵旨分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一只外，其余象只马匹，若由察木多打箭一带

进京，未免道路崎岖，福康安等请在前藏暂行喂养。俟四月间，冰融草长时，派员由青海一路，缓程由西宁进口适与朕意相合，自因如此办理。

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四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谕：

据勒保等奏廓尔喀所进驯象、马匹，派员出口照料，并令沿途各蒙古番族，预备牛羊、乌拉应用，按数给价。嗣据扎萨克等声称，应需羊只等项，所值无几，不敢收领价值，现已准其办供等语。廓尔喀进贡象、马，经过青海地方，该扎萨克等预备羊只等项，并据称不敢领土完整请价值，踊跃急公，出于至诚，殊属可嘉。扎萨克贝勒济克默特伊什，贝子车登多尔济，公拉特纳锡第，俱著加恩，各赏给缎二匹，以示奖励。

为清廷"护解象只"的差事极为辛苦。每次一般送两只大象，要求六十天到京。沿途经过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各省，乾隆皇帝特别谕旨："经过各省添派妥员护送攒行，目不虞其任意迟缓"，"著沿途地方官护送照看，应

用夫马食物从厚支给”，为此每站给夫二名，拨武弁一员、兵十名，以资防护长解，并备草料、口粮、住宿棚房、过渡船只等也给予便利。每只象，日给料谷三斤斗，糯米四斤升，稻草三十束，每束重八斤。护送者一路翻越穷山恶水，栉风沐雨，昼夜兼程，担惊受怕，自不必多言。

清代皇帝卤簿仪象的使用特点

清代皇帝卤簿中的仪象与前代卤簿中的仪象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有着本朝代的特点。

从清入关前后，这一阶段是艰苦创业时期，“御前卤簿”中并无仪象。

清天聪六年（1632 年，即明崇祯五年）定仪仗之制，但“其制甚简”。

天聪十年（1636 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数目及品官仪从。当内院官拟设御前仪仗请旨时，皇太极针对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又是征战频繁时期，表明态度曰：

> 仪仗止美观瞻，非于国有益于兵有用也，命酌量裁减之。

于是，定议御前仪仗，其中仅设有

"鞍马十"；在所备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的"大驾卤簿"中仅设有"马十匹"(《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并无使用仪象的记载，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及地理条件限制，也绝不可能会有仪象。

迨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上以定鼎燕京，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清世祖实录》卷九)，其卤簿前导，"一仍旧制"。

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锦衣卫改称銮仪卫时，仍定"一切典礼俱照国朝旧制"。三年"皇帝仪卫，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清世祖实录》卷九)；六月定"御前卤簿"仍仅设有"马五对"，当然俱照国朝旧制，并规定"凡郊祀大典，万寿、元旦、冬至三大朝会及诸典礼皆用之"(《清史稿·舆服》卷一〇五)。虽"参稽往制，量加增饰"，但这时期的清代卤簿中仍未见有仪象之记载。

《东华录》虽载有："我朝定鼎以来……驯象所设东、西二司"，这可以说明，清代接管了明锦衣卫驯象所遗留下来的建置机构及官员、"象奴"等人员，仅是一个过渡性因循维持阶段。

经查阅清代历史档案，未见有顺治

朝驯象所养象的汉文记载，但在清人笔记中有所记述，如谈迁《北游录·纪邮上》称，顺治十一年（1654 年），宣武门西象房有“旧象十七，新象三”。虽明旧象还有遗留，但由于顺治朝卤簿据依“国朝旧制”，可能还没有使用仪象。

清康熙朝（特别是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政权已经初步奠定了较稳固的基础，也是清代盛世康泰平安的起点。康熙皇帝是有清一代英明的君主之一。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崇尚和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上调整满汉之间的关系，促成了清政权的长治久安，其融合吸收汉文化的特点，也表现在卤簿中已开始使用仪象。此可为卤簿仪象的逐渐恢复阶段。

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銮仪卫全宗档》中，虽未发现康熙朝驯象所象房养象的记录，但当时俄国使节所著《俄国使华笔记》一书中，记述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銮仪卫驯象所象房曾有十四只象，其中有一只白象。

《清宫词·大朝仪》也谈到：

崇文学士奏铙歌，滇蜀初平庆止戈。
清初金鸡宣大赦，一双驯象宝瓶驮。

清初所谓崇文院，实沿唐、宋、元

之“崇文院”旧制，属天聪十年（崇德元年，1636 年）设立的“内三院”之一。

顺治朝中一度改为内阁及翰林院，是文翰荟萃“储才之地”。

康熙九年（1670 年）遂为定制。当时集有吴伟业、王士祯、朱彝尊为代表的知名学士，他们有的善工词曲书画，诗咏风华绮丽；有的善作铙歌，颂扬功德。这些也正符合清统治阶级以诗歌粉饰太平的需要。这首宫词中的“滇蜀初平”，当是指康熙二十年（1681 年），平定“三藩”叛乱而以示庆祝的，同时通过这首宫词也不难看到，卤簿中使用仪象制度尚简，仅以二只驯象驮宝瓶立于仗前。

上述宫词，反映了康熙朝卤簿已开始使用了仪象，在一些清人笔记中还有的将象作皇家玩物看待，如王士祯《池北偶谈》中曾记载，康熙皇帝驾幸南苑，观象与虎恶斗，最终虎不敌象而毙。这或许说明，象在康熙初年，作为皇朝礼仪中的仪象，还没有被朝廷重视。

然而据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康熙南巡图》和《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就不难看出，在康熙中期之后，康熙朝銮

仪卫驯象所仪象在卤簿中已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清康熙朝宫廷画家王翚绘《康熙南巡图》共十二卷，场面宏大，再现了当时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盛大景况。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正月初八日，康熙帝起程离京，图中画的卤簿是“行幸仪仗”，即后来乾隆十三年（1748 年）钦定改为“骑驾卤簿”的行幸仪仗，从永定门凉水河桥头起，岸旁有十一只仪象。在最后一卷中，又描绘了仪象翘首侍望康熙皇帝回銮皇宫的场面。

乾隆时宫廷摹本《康熙六巡万寿庆典图》，原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正月，即庆寿四年之后，原画已轶失。现藏乾隆朝冷枚等十四名画家所绘《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上卷长约四十米，描绘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康熙六旬寿辰，从北京西郊畅春园经西直门到达皇宫，沿途街巷分别设置的五十段龙棚、经棚等壮锦纷华的场面，画面上也绘有十一只身躯高大的仪象，安排在热闹街道左右。两画卷足以说明，康熙时使用仪象的庞大阵容。

乾隆十三年（1713 年），乾隆皇帝集“宋明”卤簿之大成，为了“敬天尊

祖，寅承毖祀，坛庙祭器，聿既稽考古典”，而加以增减，亲自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其中对仪象的使用也更加规范，以昭后世遵循的盛典。

乾隆朝规定，銮仪卫是专门“供奉乘舆，秩序卤簿，辨其名数，与其班例。凡祭祀、朝会、时巡、大阅，则帅所司而敬供之”；它所隶属的“六所一卫”（左、右、中、前、后、驯象所及旗手一卫）内“驯象所掌仪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八）。清皇帝卤簿仪象中有“宝象”、“导象”（不同卤簿又称“朝象”、“开路象”）和“驾辇象”之分。

从《康熙南巡图》和《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中，可十分清晰地看出“导象”四只，“宝象”五只，“驾辇象”二只，以及它们身上装饰佩带之不同。这十一只仪象，又十分符合乾隆十三年所厘定“卤簿五辂之制”，显然是乾隆皇帝依据康熙朝旧例继承规范化的。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銮仪卫驯象所职掌卤簿仪象，即“陈大驾卤簿，前列导象四，民尉二十八人；次

宝象五，民尉八十人。……金辂驾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玉辂驾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由于卤簿的规范不同，所用“旗章麾盖”各有区别，但均是“前例导象、次宝象”的阵容；典制不同，仪象立仗的位置亦不同。

如“朝会御殿”规定：

> 五辂在午门外，宝象在五辂之南，铙歌大乐在宝象之南，朝象（即导象）在天安门外。

“御楼受俘”规定：

> 设辇辂宝象于天安门外。若于圆明园行庆贺礼，则陈卤簿于正大光明殿阶下，至大宫门外，辇辂仪象不设。

清代卤簿仪象还主要用于“朝会执事”和“祭祀执事”。

在“朝会执事”中规定：

> 凡升殿及常朝，用驮宝象五只、驾辇象二只；又每日黎明，设常朝四象于天安门外左右排列。

在“祭祀执事”中规定：

> 凡用驮宝象五只、驾辇象二只、开路象四只。

总之，清代卤簿中的仪象，在乾隆十三年定制时，既不囿于宋、元、明仪

象只数的规模，又继承了清前期的模式。无论是象只数量的排列，还是驭象校尉、民尉（汉、宋、元卤簿仪象均为“南越军”人驾驭）人员的数量，都是不同于前代的。

清代皇帝卤簿仪象的区别特点

清代卤簿仪象中“宝象”与“导象”及“驾辇象”是有区别的。

《钦定大清会典图》和《皇朝礼器图式》不但载有卤簿仪象的文字说明，而且还绘有“皇帝卤簿宝象图”和“皇帝卤簿导象图”等。

清代皇帝卤簿宝象驮的“宝瓶”，与前代所驮装饰物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

> 皇帝卤簿宝象，络首钩膺革秋攀，皆编黄绒紃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上载宝瓶，铜质鎏金，亦饰杂宝。深一尺六寸五分、口径八寸六分、腹围五尺七寸六分；缕朵云纹，盖径一尺三寸；冠火焰顶，座高一尺三寸。（《皇朝礼器图式》

卷十一）

清卤簿“宝象”，实际上是参照宋、元仪象装饰制定的。宋卤簿仪象身上“设木莲花座，金蕉盘”（《宋史·仪卫志》卷一四八）。元卤簿仪象身上“象鞯鞍，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莲花座上，金涂银香炉一”（《元史·舆服志》卷七九）。而《明会典》记载，锦衣卫驯象所“领本卫军奴养象，以备朝会陈列及驾辇、驮宝之用”，凡大祀、大朝会中均设“宝匣象”一只。

由此可见，宋卤簿有象驮“金蕉盘”；元卤簿有象驮“香炉”；明卤簿有象驮“宝匣”；清卤簿则是象驮“宝瓶”。

显然，各代卤簿象驮宝物之不同，一般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又与历史文化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清卤簿中象驮“宝瓶”的实质及其象征意义，首先是有汉文化传统影响的烙印，同时又是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清政权的巩固、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必然做法。其次，深刻地反映着自己本民族（满族）的特色。《匏庵随笔·效祀恭纪》云：宝象背负“冠火焰顶”宝瓶，象奴恭引缓行。“闻宝瓶内贮有火绒、火石、火镰，

系满洲旧俗所需，以示不忘也”。

这说明，象驮宝瓶内盛装的宝物，是满族风俗、民众之物，也是“敬天尊祖”的象征。它与清代皇帝朝带上佩饰的“燧”（即取火器）恰好相通，而保存火种，也正是很多民族最为重视的。

另外，清卤簿象驮宝瓶的“瓶”字又与“天下太平”的“平”字相谐音，内蕴含誓不忘祖宗艰苦征得天下之意境。因为，顺治入京定鼎前夕，即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大学士冯铨、谢陞、洪承畴参考了“前代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为由，撷取佳名昭郊庙及社稷乐章选吉字，特奏言：“本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拟改用平字”（《清世祖实录》卷八），以寓“太平有象，庆祚无疆”（《清宫史续编·典礼二》卷八）之意；清人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对卤簿仪象也记有“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载道”吉祥用语。

所以，乾隆年间及后世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作极为精美的铜镀金“宝象”，掐丝珐琅“太平有象”熏香炉等等象形工艺精品。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六五《题紫金石太平有象砚》诗云：

紫金石砚临朐产，起墨益毫略次端。
刻作太平称有象，斯之未信敢心宽。

这些精雕细琢的工艺精品，再配之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它们既是宫中精美之装饰，又是象征国家强盛、万世长青之寓意，不但遍及宫中，而且象驮“宝瓶”装饰于皇帝御座旁之左右，也就不难理解了。

乾隆十三年（1748 年），钦定的皇帝卤簿仪象中除“宝象”外，还有“导象”（即朝象、开路象）及金辂驾象、玉辂驾象，称谓“驾辇象”。

清卤簿“导象”身“披蓝屉，不加羁饰”（《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一），比之前代导驾象都安排的比较有秩序，也反映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到清代更加森严。

清卤簿中的“驾辇象”也颇具特色，与“驾辇象”直接关联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 年）钦定“卤簿五辂之制”，它是以《周礼·春官·巾车》王之五辂（古通辂），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和历代车辂制度规定的。

早在乾隆八年（1743 年）即将清初的“大辂改为金辂，大马辇改为象辂，小步辇改为革辂，香步辇改为木辂，玉

辂仍旧，以符五辂之制”（《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这就将前代和康熙朝卤簿车舆制度完善了，正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所谕：“五辂酌仿《周官》及唐宋遗制，金、玉、象、革、木，各如其仪，乘用亦自今岁南郊始”，“以称巨典”（《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

清代卤簿中之五辂，外形相似，大小颜色装饰不同，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其中“金辂”、“玉辂”陈设卤簿时，皆用“驾象一，鞅以朱绒纠”，并以行马二承辕（《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七七）。

清卤簿“驾辇象”也来源于元代的象轿和明代的“驾辇象”。据《元史·舆服志》：“象轿，驾以象，凡巡幸则御之”；“行幸则蕃官骑引，以道大驾，以驾巨辇”。明永乐朝则定“大辂……以二象驾之。玉辂亦驾以二象，制如大辂”（《明史·仪卫制》卷六五）。

清卤簿“驾辇象”，虽与元代象轿驾象、明卤簿大辂、玉辂各驾象不同，但清卤簿仪象比宋、元、明卤簿中使用的仪象，规定的更加细微、明确。

清代皇帝卤簿掌象民役着装特点

清代銮仪卫驯象所掌仪象的校尉、民尉，在乾隆朝时定有二百零六名，他们在皇帝卤簿的“朝会执事”和“祭祀执事”的掌管仪象时，着装也有十分明确的规定：“俱衣红缎团花逊衣，系绿绸带，戴红纬青毡帽，素铜顶上插黄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

这无疑是继承了前代卤簿驭象者的装束，如宋朝规定：驭象者身着“花脚幞头、绯绣窄衣、银带”；元朝规定：身着“弓花角唐帽，绯襟销金斡衫，镀金束带，乌靴”；明仍元制。

清卤簿掌仪象校尉、民尉，身着服饰色彩更加艳丽，而且头“戴红纬青毡帽，素铜顶上插黄翎”，则完全是清代的民族特色。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清代乾隆朝物质经济基础雄厚。

结　　语

然而，随着清嘉庆朝及后朝的日趋衰落，清代銮仪卫驯象所象房象只也渐次减少。据清代档案统计：嘉庆朝最多三十五只，最少十六只；道光朝最多十

五只，最少九只；而咸丰五年（1855年），象房内仅喂养六只了。

道光朝后期，随着象只进入驯象所的日趋骤减，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社会结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变化，清政府大量白银外流、库储枯竭，“朝廷体制”尊严扫地，礼制尽摧。

咸丰初年，虽南掌国还贡象，但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清政府考虑贡使安全，竟谕“使臣毋庸来京”，护解象只入京的象奴，则要寻他道“绕远行走之处”（《清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故咸丰以后十余年，象房无象”。

同治、光绪初年，虽安南国进贡象六、七只，但此象已不复入仗，加之财政拮据，不敷豢养，而象只相继毙矣。光绪十年后，“京师遂无象”。

综上所述，自汉卤簿有仪象，特别是宋、元、明以来，封建帝王卤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既是封建王朝礼制的集中体现，同时又通过卤簿中仪象的奢简变化，反映了封建皇朝盛衰。

清代以乾隆朝为代表厘定的和陈设的“卤簿五辂之制”，可谓“光昭羽卫，用肃明礼”。銮仪卫“恪恭舆卫”，就是

要达到“尊朝廷、彰国彩”之目的；虽说在“旗章麾盖”方面“视前倍简”，但在使用卤簿仪象上确实制度分明，特色突出，工料精致，超过前代。虽说“参用宋明以来之旧”制，但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清代乾隆朝之后的“卤簿五辂之制”，特别是仪象在卤簿中的壮观警跸作用，则随着清皇朝国力衰微而日益简陋了。

宫廷环卫整理措施初探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曾经居住过二十四位皇帝，若再加上每朝的后妃宫眷等人就数不胜数了。因此，紫禁城内的卫生状况如何，就显得十分突出重要了。

紫禁城环卫整理概况

据清代宫廷档案和文献史料记载：清袭明制，每年的三伏日和十月内，要两次组织宫役人登上紫禁城城墙芟除草棘；在立秋后，还要派人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庭院及宫殿屋顶上拔除青草；而紫禁城其它宫室殿阁，如乾清宫、坤宁宫等内廷东、西六宫，以及皇宫外的地安门北之钟鼓楼顶上的青草，则要由钦天监择吉日，照例同日一起拔除。

每年春季三月，明皇宫要开长庚、苍震门等，放役夫浚通宫中沟渠，对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沟水管，俱于此时油捻之。另则将防火铜缸、铁缸刷洗一新，以换清水。

清宫在浚通水道、沟渠方面，宫中

档案就记载得较为详尽了。如管理紫禁城内河道，即由神武门西地沟引护城河水流入，沿西一带经西华门内武英殿前，至太和门前内金水河桥下，复流经文渊阁前至上驷院三座门，再从銮驾库巽方绕出，共长六百五十丈五尺。凡内廷暗沟出水，皆汇此河，为防河身节节壅塞，沟水不通，又保证以挑挖沟，宣畅河身为最要。

清宫总管内务府将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各编成十班，每班负责十至三十余米长不等距离，以保证浚通水道。

另外，清宫总管内务府又组织工匠挑浚宫内水沟，如同治八年（1869年），修理乾清宫内水沟十三道，凑长四百二十九丈；寿康宫内水沟七道，凑长一百四十九丈五尺……。

总之，在清宫档案中，详尽地记载了皇宫修建沟邦、暗沟改道、拆砌灰城砖渗坑，以及皇宫内的暗沟状况、尺寸等等。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总管内务府营造司，负责凡遇宫殿内有损裂渗漏之处，经值年大臣每年秋季派匠役人进宫内修理，由该司监修。再如紫禁城

御花园内的金鱼池，应行沟水修补，由奉宸苑移咨营造司办理，其进水铜管渗漏壅滞，移咨工部办理。

每年春三月和秋八月，更换太和殿、乾清宫及凡宫殿内设宝座之褥，夏秋用黄龙妆缎，春冬用黑豹兼备随侍缎褥皮褥。平日，皇帝不御宝座时，宝座上皆罩黄围套，名曰："座罩"，俗曰："围幕罩儿"。

清雍正皇帝发现太监在打扫宫殿内的卫生时，竟不讲礼节，实大有不敬之处。对此，雍正元年（1723 年）六月二十二日谕旨：

> 近来，新进太监不知规矩，朕曾见伊等扫地时，竟挟持笤帚从宝座前昂然直走，全无敬畏之意，尔等传与乾清宫等处首领太监等，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番恭敬之心，急趋数步方合礼节，若仍不改，尔等即严切教训，如屡诲不悛，即将伊治罪。至朕向尔等首领太监问话，遇下雨泥水之处，只须躬身答应，不必跪奏。

此谕旨被载入《宫中现行则例·敬事房事例》中，成为太监必须时刻遵循的宫规之一。

每年夏季，皇宫内要搭盖凉棚、罩棚，防暑降温。如内廷养心殿、寿康宫择吉日支搭凉棚，宫殿各处也搭盖罩棚以遮阳。冬天，宫殿则搭盖毡棚，以保温暖。

另外，立夏后，内廷养心殿等皇家宫眷所住的宫殿，要在纸窗上安装纱棂，俗曰："替窗"，以便采光通风。在八、九、十月内选择吉日，由掌仪司负责抽调各司管辖的工匠人（如裱匠、木匠、斫花匠、菱花匠、钉铰匠、油匠等）糊饰宫内窗棂；而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等处及紫禁城门各门看守房屋，均由工部负责办理。

秋季宫内等处主要是岁修工程，俱有钦天监择定吉期，一般修缮活，由内监匠人承担，遇有大项工程，则须传用民匠。一般乾清宫等主要宫殿，三年就要修葺一次，并对宫殿的岁修工程"定以保固之限"三年；若拆换大木重新盖造者，保固十年；挑换椽望揭瓦头者，保固五年；新筑地基成砌石砖墙垣者，保固十年；补修拆砌者，保固三年；新筑常例灰土墙，保固三年……如有内倾圮者，监修官赔修。

另外，体仁阁（太和殿庭院东）楼

上供奉御用甲胄，由上驷院卿会同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查验抖晾一次；八旗各营备操盔甲存储东华门楼，要用木架安设，再用蓝布垂帘苫盖……。

总之，“凡器物，慎其收储”。

每年冬季，宫内等处换铺红、白毡及择吉日换窗纸、掸尘。十二月各宫殿扫尘，由内管理事关防处选择吉日、吉时奏闻，知会宫殿监打扫，再增派苏拉（宫中差役）等二百余人进宫内协同打扫。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十二月，福隆安、和珅面奏谕旨：

> 从前圆明园等处房屋，恐有蝎虎子等物，曾交内务府届时派员捕捉。各坛庙以及各宫殿，亦恐有蝎虎子、蜘蛛等物，自宜一体打扫，搜捕洁净。嗣后各宫殿，著交内务府大臣，届时派员认真捕捉。其各坛庙亦著交内务府大臣，会同太常寺堂官，届时各派妥员，认真捕捉，务使净尽。

看来，乾隆皇帝对宫中环境卫生十分关注，当然也为辞岁迎新、万事如意、万事大吉地过新年做好准备。

十一月初一日，清宫中始烧暖炕，

设围炉火盆等，谓之开炉节。为讲究清洁卫生起见，煤火主要以烧炭为主，与明代宫廷一样，炭用红漆箩筐盛着，故称“红箩炭”。宫内所使用的火炭都是经过反复精选的，统如筷子一般长短的上等硬木炭，敲击之则叮当作响，坚实耐烧。其红箩炭又分为两个品种：一种是燃完后呈白灰色，故谓之“白骨炭”；另一种燃烧时像菊花瓣一样，呈青灰色，故谓之“菊花炭”。两种炭的最大特点是，燃烧时火苗旺，热量大，无火星，无烟尘，无臭味，异常干净又不会污染空气。

每逢瑞雪纷飞紫禁城后，即于京营内拨三千名军士及宫役人入皇宫扫雪，对御园苑囿的积雪，要扫取培壅树根。清雍正皇帝还煞费苦心地旨意：

> 可将宫内太监编集成队，每队派头领一名，每十队立总头领一名，不但救火，即扫雪、搬运什物用人时，只须点某头领，彼自齐集所属，同往料理。纵使人多，各有头领点头约束，必不至于紊乱。

除内廷有太监等宫役扫雪外，其它各处安排：乾清门前积雪，由内管领等带领苏拉扫除；太和门内三大殿（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积雪，由营造司员查看，各佐领下披甲人扫除；午门以内积雪，工部派员查看，由步军扫除。

除此之外，紫禁城内一年四季的地面清洁卫生，由内务府俱派正身苏拉进内扫除。每日，苏拉二百名承应打扫皇宫内的一切地方，然后由值年内务府大臣查看是否清洁整齐？并由该大臣负责到底，出了问题自然拿他问罪了。

清乾隆皇帝就曾谕旨：

> 紫禁城内各处俱当洁净整齐，如有应修之处，亦当即行补修，岂可致令不洁不整？今朕经过地方，竟有不洁不整之处。

可见，对紫禁城内的卫生清洁状况，连皇帝都是一丝不苟，非常重视的。另外，明清皇宫内的粪便处理，除清宫藏有便器具外，两代皇宫多用粪车，即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以空车拥入一换，以确保宫内清洁。

宫廷对工匠役人稽查特点

紫禁城内的卫生及整理，必用各类行业工匠役人。为此，明清皇宫均制定了宫廷规章。

如明代宫廷规定，凡诸色工匠人，

差拨赴内府及库房工作，若不亲身带关牌入内应役，而是雇佣冒名和私自代替他人，各杖一百，雇工钱入官。对工匠姓名，报门官及守卫官于所入门首，逐一点视，再放入工作；待出宫时，仍须相视形貌，照数点出，其不出宫者绞死。

清宫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工匠，多为苏州、广东人，这是乾隆皇帝旨意苏州织造及粤海关监督认真挑选，“应择其手艺精工而无家累牵制者送京，亦可省将来告假纷纷，稽查往返。”

同时，紫禁城内的各工程项目，如营造司修建宫殿，“自应随工雇觅民夫”；宫内岁修活计及淘沟应用匠役，一般由宫内太监承担，如不敷用可传用民匠。每年乾清宫要立天灯、万寿灯等项工程，一般从工部派搭材匠三十名，五城民搭材匠三十名，前往宫廷传用。甚至于紫禁城内收拾渣土打扫地面之用苏拉（宫中劳役）；“年例糊饰坤宁宫等处殿宇窗户，俱系传用营造司食钱粮裱匠，该司匠役如不敷应用，即雇觅民匠”；“总理工程处年例搭重华宫戏台进匠三十名，拆卸帮搭物件进匠三十名，俱系雇觅民匠”等等。

紫禁城皇宫内这么多工匠役人的出

入，的确是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确实发现有服夫役衣、随役而进的游闲少年充其役，以观禁掖深居的妃嫔者；甚至太傅明珠之子，也扮作喇嘛僧得窥已选入宫闱的亲戚。

对此，康熙十六年（1677 年）八月初一日上谕：

> 著内务府总管传与二十家内管领，宫内一应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进宫，公事毕，即应出外，不许久停闲坐，将外间事入内传说，并窃听宫内往外传说，种种情弊，皆所不免，除以往究外，嗣后如有此等一经查出，必重处不赦，该管领一并治罪，绝不轻恕。

无疑，康熙皇帝的训谕，成为后世皇朝宫规所遵循的法则，并将谕旨饬禁载入宫史，永远照章执行！

在康熙十九年（1680 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谕：

> 凡放匠之处，著总管用心关防，妃嫔贵人等，不许行走；俟晚间放匠后，方许行走。如有错误，必重惩尔等毋贻后悔。

据清《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由于这些工匠役人等闲杂人员的进入宫

廷，为进一步加强紫禁城皇宫重地的防护，必须建立“设官稽查”制度。

宫内“设官稽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在皇宫内王公大臣官员等，随带仆从各按品秩大小立以限制，并随从人等所至地面拨派官役分地稽查。二是对苏拉匠役、闲杂人员的稽查。

乾隆三年（1738 年）七月，奉旨“内务府向有专设之御史”制度，注意需更换、顶补原缺者事宜。

乾隆二十年（1755 年）正月，庄亲王允禄等议复奏准禁城重地理宜严肃，请交护军统领饬各该门章京等严行盘查，并饬交内管领等于该管处所不时严加搜查，遇有闲人即行逐出。再内务府原设有御史二员，专司稽查之责；如遇有此等闲杂之人于各处容留及混行出入，即将容留之处据实参照。倘该御史等或虚应故事，不实力稽查，别经内务府大臣等查出，即将该御史等一并题参。

在此基础上，嘉庆朝面对各项工程民匠的增多，无不担忧其宫内的安全。所以严格规定了停止使用上述民匠工役，非用不可的，必须找安分守己的民匠。

宫内遇有大项工程，不得不传用民匠者，臣等拟令承办监督等委

> 可靠工头，令该工头等于素日熟悉之民匠内，择其安静本分者传用。

这些工匠进宫还必须要造“花名清册”，按名点验，不能有私毫大意和懈怠。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三年（1798年）《满文咨文》档案，对于在紫禁城内供事的闲散差役，管理颇严。主要由清宫总管内务府挑派之差使及打扫地面闲散当差之人，每日进出无常，自应以腰牌为准。由内务府挑派之有顶戴领催四员查验放行，“严查冒混”。值有差使，向来开门报单，只于进内右门时，查点进出；而于进景运、隆宗、后左、后右门时，必须严格查点进出；而于进景运、隆宗、后左、后右门时，并不查点，恐致掺杂滋弊。嗣后，应令带领之员携带门单，面交管门章京等查点。进出其扫雪官兵，亦由该衙门开报人数，派员亲带入内各门，按人数查点，不得有误。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二月奏准通行《稽察门禁章程》十一条，其中有几条牵涉“花名木牌”、“腰牌”等条文，均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

> 第一条，向来各衙门官员出入

景运、隆宗、后左、后右各门，年底造具花名木牌移送景运门稽。覆臣等伏思一年之内，官员等升迁改调时有更换，兼有新到衙门之员，仅于年底造具花名木牌不能符合，仍属有名无实。而乾隆六十年会议，令每门行走各官员开写职名查验，迨后亦未实力奉行。今拟各门除王公大臣及内廷行走，各官员暨值宿侍卫等，本系在内常川行走易于认识外，其余各衙门文武官员，以及王公大臣护卫跟随各员，俱饬令随身携带职名，于进门时交纳值班章京、护军，收执查验准行出门时，各该员仍自行向该门领取，原交职名如查对不符即行究办。

第五条，后右门应走各等处，内务府各库官员，上虞备用处侍卫处主事、笔帖式，内务府各项苏拉匠役，嗣后应申明旧制，毋违任意贪便行走，如有违例不遵者，该管门护军阻回，设被阻不遵令，该管大臣参处。

第六条，景运门、隆宗门内，各值房承值差使及打扫地面闲散当差之人，向由内务府挑派，此等人

> 役每日进出无常，自应以腰牌为准，到门时比对查验。门内应由内务府挑派有顶戴领催四员稽查人数，严查冒混至匠役人等值有差使。向来开报门单只于进内右门之时查点进出，而于进景运、隆宗、后左、后右四门之时并不查点，恐滋掺杂滋弊。嗣后应令带领之员，携带面单交该管门章京等查验进出，其扫雪官兵亦由该衙门开报人数派员亲带入内，各门按数点查。

嘉庆十八年（1813 年）十一月，奉旨内务府大臣具奏酌定宫内进匠章程一折云：

> 嗣后，竖立乾清宫、宁寿宫天灯、万寿灯应进匠役，著派乾清门侍卫二员、大门侍卫十员、亲军十名在内佩刀管束。俟该匠役等散工后方准该侍卫等撤去，惟准其换班吃饭至宫内遇有大项工程，不得不传用民匠，若朕在宫内时著派乾清门侍卫、大门侍卫亲军妥为弹压管束。朕在园时，著派侍卫处章京带领亲军稽查管束，视其民匠多寡，酌量除派官兵，永著为例，依议。钦此。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衙门听差人役并各太监及听差苏拉人等出入禁门”的管理，奉旨由清宫总管内务府颁发腰牌，若要进宫时令其佩带。

但稽查人员在宫廷执行中也发现一个问题，其腰牌未注明某处人役，无法区别，恐该听差人等私自换带。所以必须将原设腰牌式样，添注各部院衙门等名目。同时敬徵等奏要求腰牌“铸造火印戳记颁发，各等处人役佩带以示区别”。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几千余件这种木质腰牌，此类腰牌是出入宫门的重要凭证，长11厘米、宽7.5厘米，正面漆桐油，火烫和墨书汉字：“内务府升平署，苏拉宝兴年四十三岁，面黄无须，第一千三百七十二号”。背面火烫中为满文，其两侧火烫书汉字：“内务府发给癸亥年造”。

咸丰年间，清宫总管内务府为进一步加强对“内务府各处办公值房，其听差之披甲人苏拉匠役等，所佩腰牌及宗人府内阁各部院衙门行取腰牌，均更换咸丰年号字样，即将本人年岁、面貌，详细开写于腰牌后面，并饬令各衙门及

各他坦等处，将各项当差人役花名年貌，详细填写，造具清册两份。”其中一份交内务府以备考查；一份送皇宫内廷景运门处，以便出入禁门时易于查对。

另外，咸丰朝至清朝晚期宫廷规定，每三年更换新腰牌一次，将旧腰牌收回集中销毁，以昭慎重。对营造司大量使用苏拉匠役等人，规定严格按花名清册发给腰牌，按名点验，每十名派官一员带领进宫，并详细开写人数清单，报门放验。同时进一步规定：

> 嗣后，非遇大项工程，不得不传用民夫，其零星活计，均传用官匠以期该管官员易于认识，并由值班之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严饬守御各禁门，官员兵丁等于各项人役出入时详细查验，如无腰牌或有腰牌而年貌不符者，一概不准放入等。

这种严格的紫禁城皇宫内廷的门禁稽查制度，自从康熙朝始至晚清时期，都进行了严格规章制度管理，使之万无一失，从而保证了皇宫内廷的绝对安全。

宫廷除溷与便器具考略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其宫中内廷有否厕所？史料与文献资料均没有多少记载。因为这是宫中最隐秘之事，又因为封建道德观念的约束，那个时代的文人慑于皇威，自然也不敢问津。而现今也有人竟武断地说："紫禁城内（明清皇宫）没有厕所。"

那么，明清皇宫究竟有没有厕所？答案是肯定的："有！"只要我们通过零星文献记载和清宫的文物藏品——便器具，则可窥视皇宫大内除溷的大致端倪。据《南亭笔记》记载，明清皇宫"宫人多用粪车，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以空车拥入一换。"真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之。

明宫"便溺之所"

据明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又称《明宫史》）一书中记载：在紫禁城外朝与内廷之间的乾清门围墙之内，左右廊庑之间朝南半间房，曰"东夹墙"和"西夹墙"处，"皆宫眷、内官便溺之

所”。

另，在隆宗门外慈宁宫东小门内有北司房，即文书房；再南是司礼监掌管处，“即两班四拨写字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为便溺之所”，即称之为“西茅”。

看来，所谓“便溺之所”、“西茅”等，即是明宫内廷所设置的厕所了。而在这些厕所宫墙之外，有宫内太监“净军”在此值班，随时接应和忙不迭地打扫卫生。

所谓“净军”，即是太监中地位最低贱的苦役，一般是太监犯了宫规或得罪了某位内官大人，即被严惩发配来干这种活。他们无论春夏秋冬，每日每时都要在“便溺之所”的宫墙外等候，因在“宫墙之外，砖砌之门，安大石于上，凿悬孔垂之，各有净军在接盛”，也就是接粪便等，下设有“恭桶”一类的便器具。

同时，“净军”还要负责随时打扫“便溺之所”，一般说来大扫除仍是按“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开玄武门（清改称神武门—笔者注）及各小门打扫之”；不但如此，而且宫廷在此日子里，还要“放夫匠及打扫净军，抬运堆积粪壤”等。

明宫使用的卫生纸

明宫内使用的卫生纸（又称“草纸”），主要由宝钞司（其址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南花园）负责制造。该衙门左临河，后倚河，专有包稻草池，有作坊七十二房。制作草纸方法是“竖不足二尺，阔不足三尺，各用帘抄成一张，即以独轮小车运至平地晒干，类总入库，每岁进宫中备宫人使用。”

看来，供宫人使用的草纸相当粗糙，当然不及皇帝使用的卫生纸了。

明代皇帝曾有一段时间，以丝织品作“卫生纸”用。据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

> 大内供御溷厕所用，乃以川中贡野蚕所吐成茧，织以成帛，大仅如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

在明孝宗时，皇帝所弃掷的帛，被一宫监浣洗干净收存起来。他将收集的这些帛，竟缝纫成一块能挡风寒日晒的帘帷之类的东西。一次，某皇帝见之不知是何物所织，当被告之是“除溷之帛”后，呼曰：“如此殊可惜！”即敕以纸代之。

上述所记载的供奉的“御用之物”，

估计为明中期之贡物。至晚明时期，皇帝所使用的卫生纸来源有二：一是“惟市买杭州好草纸用之”；二是皇帝所用卫生纸，专由“内宫监纸房抄造，淡黄色，绵软细厚，裁方可三寸余，进交管净侍收”，而又非宝钞司所造也。

清宫便器具

清帝后妃等人上厕所，则主要采用便器具的形式，而存放便器具的处所称之为“净房”。解大溲时，便器具内盛满香炭灰，解完后香炭灰盖严；解小溲时，便器具不用香炭灰，毕后倒进恭桶内，然后用木盖盖好。每天由小太监清理，并将便器具涮洗干净。

皇帝、后妃等专用的便器具称之为“官房”，由太监专人保管。若需要时就传唤太监或宫女送进“官房”，平日为清洁起见，这类便器具不放寝宫内。

据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记载老宫监回忆：

> 娘娘行使溺之盆，木匣盛着，外袱布套，便溺不出寝宫，完毕后木盆在下层洗涮，凡太监不能近事，均由下屋女子承当。

其它宫中下人使用的便器具称之为

“便盆”，他们不可能每人专用一具，大都每个院落合用一两个而已，均放在宫殿附近的“净房”内。

“官房”有长方和椭圆两种形式，有木质、锡质和瓷质之分。木质大都内镶锡里，形如抽屉，外围木框，木框上开椭圆形口，口上覆有盖，便屉可以拉出或合拢。这类便器具的等级较高，多为帝后妃们所享用。

至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个木质锡里便器具，长 61．5 厘米、宽 31 厘米、高 31 厘米；下有 3．5 厘米高的腿足，上平面开出长 35 厘米、宽 18．5 厘米的椭圆形洞口；靠前端堵头开方口，装一具宽 21．5 厘米、高 15 厘米、长 58．5 厘米的抽屉。抽屉内镶锡皮里。此器木质不重，有戗茬相间的木纹，可能是香楠木，外罩饰红油。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盆式“官房”，以锡质者居多，宫中尚存这类实物，常见为椭圆形，大小不等。大者长 36 厘米、宽 21．7 厘米、高 13．3 厘米；小者长 25 厘米、宽 18 厘米、高 13 厘米，盆上附仔口木盖，木盖正中挖出银锭钮。有的还在里口沿下镶一圈带槽锡条。盆的一头开出与槽口平行的扁口，另用一块

锡块随盆内弧形状，做成椭圆形抽拉盖，盖的一头安有拉环，使用时可以盆外将盖板拉出。用后插上锡盖儿，再将上口木盖盖好，可以减少在搬运过程中，因上下颠簸震动而造成脏物外溢。使用这种便器具，还要配有便凳，便凳也叫“恭凳”、“茅凳”等。四足与常用坐凳无异，只是坐面上开有椭圆形口，有的把坐面前边开通，便盆可以从凳前腿间放入凳下“接盛”。

另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种圆形夜尿壶，俗称“夜壶”或“虎子”，高11.6厘米，也属于锡制品，口上附盖，侧处有提梁，外面包装一层黄色锦缎，质地精细，作工考究。

据考古发现，1985年，镇江谏壁王家山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墙铁壁虎子，椭圆形的器身两侧，分别铸有两只蜷曲的兽足。这是目前见的年代最早的“虎子”。六朝的“虎子”都是青瓷的。汉代还有铜“虎子”、陶“虎子”和木雕彩绘的漆“虎子”。

有关“虎子”的名称出之于汉代。据《史记·万石列传》集解引贾逵解《周官》：“腧，虎子也。窬，行清也。”《说文解字》释“腧”曰：“腧窬，亵器也。”

孟康曰："厕，行清；窬，行中受粪者也。东南人谓凿林中空如曹谓之窬。"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曰："虎子所以小便，行清所以大便。腧窬二物，许类举之。"也就是说，腧即虎子，就是夜壶。窬，就是马桶。

由此说来，清宫中都有"腧窬"这样两种"亵器"之物，只是它们均用锡制品制成。

另据清史专家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慈禧太后坐火车谒西陵，商务大臣盛宣怀和北洋大臣袁世凯为讨好西太后，不仅抢修了京芦铁路，使其和芦（卢沟桥）汉（汉口）铁路相接，还特制了专用龙车。龙车内安置了舒适的卧室，在卧室的床侧另辟一门，这门里是特别的卫生间，备有"如意桶"。

所谓如意桶者，便溺器具也。桶外裹以宫绒缎为套，如同绣墩（一种墩形的坐凳）一般，好使西太后方便时称心如意。这在当时条件下，也可算是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慈禧、光绪使用的卫生纸

据金易《宫女谈往录》谈及慈禧太

后使用的卫生纸，是专由宫女加工好的细软的白棉纸，使用之前，宫女要先将一大张白棉纸分开裁好，然后把纸喷得发潮发蔫以后，垫上湿布，再用热熨斗熨两遍，为使不带毛的纸发滑，而带毛的纸又不发涩，折叠好后随时备用。

据《清宫述闻》记载，当时清宫陈姓老宫监讲，光绪皇帝居住养心殿时，“便所在寝宫套殿（一般宫殿寝室净房，都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装一扇或两扇小门儿，里面是一个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儿，专为解溲之用），小便用锡夜壶，大便用腰圆盆，或磁或锡或木盆。有蹲足盆架，用时内垫以纸，大便用纸，即用揉过去硝之裱心纸。”

清宫“净房”

也许读者要问：宫中帝后妃嫔等主位众多，每人每天解溲至少几次，为他们清理“官房”，必然要有一个特定的场所；那么，成千的宫女、太监也要有个临时存贮便器具的地方吧？

这个场所确实存在，宫中称之为“净房”，设在各个宫殿院落配房之后的旮旯小屋内（与各主位区别的是，解溲不设在宫殿寝宫内）。“净房”内备有恭

桶、茅凳（便凳）、便盆、灰槽等，是供下等役人使用的。每次解溲后，都要用炭灰吸干，倒入恭桶，盖好盖子，以防臭味弥漫，然后将便盆擦抹干净，放于茅凳之下，以供后来者使用。

清宫中还备有专收取打扫粪便的夫役，均沿袭明制称为“净军”，也是每月逢四（即初四、十四、二十四）进宫将便桶调换。通常情况，在紧靠“净房”不远，还另设一屋，内设板床、柜橱等物，是专为主子们传唤“官房”的值班室。当然也应称之为“净房”。这又可从清宫档案记载中得到证实。

据清代《三海各殿座添做、改做装修、床张等项做法清册》载：

>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四日传：迎祥馆后添改木板棚净房一座。见方八尺，起脊，两山挂博缝，前檐夹门窗，木坎墙代风门一槽。新样城砖底盘，宽八寸。屋内尺二方砖地面。前檐新样城砖接脚。上顶挽灰泥背一层，青灰背二层。板棚外皮并外檐装修油饰红油。屋内茅凳二个，大灰槽二个。
>
> 东群房内添做挂面床一份，面宽一丈零二寸，进深四尺九寸五分，

高一尺五寸五分。柜厨一张，高二尺七寸，宽三尺，深一尺七寸，油饰黄油。大灰槽二个，见方一尺四寸，小灰槽十二个，见方九寸，俱油朱红油。叉子、拐子、御前巴掌各三份，油红朱油。六腿盆架二个，小板凳六个，茅凳二个。

依笔者分析，床是供值班太监休息用的，柜橱是存储零用杂物的，灰槽是盛炭灰以供清除脏物和擦抹便器具时的洁用之物，叉子、拐子、御前巴掌是净房内的必用工具，可惜遗物未存。虽然三海（即紫禁城外西苑北、中、南海）不在紫禁城皇宫内，但可窥知大内宫殿院落“净房”的规模。

清代《圆明园堂谕司谕档》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874年6月2日）一份承恩堂改建工程的谕旨，有“东、西净房二间撤去，着照转角房加高”的记载。可知每个院落内殿堂左、右设有两座“净房”。

由此判断，宫中下等奴仆们解大、小溲是男女分开的。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遂即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又将这些便器具等物从各宫殿“净房”内清除出去，

留下的空屋当然又与其它屋子没有什么特别区别，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宫中似乎没有厕所的疑问，实际上，宫中的“净房”，就是厕所的代名词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厕所，即明宫中有之“便溺之所”；清宫中有之“净房”，以及现藏的便器具。因此，那些认为明清皇宫内没有“厕所”的臆测之词，是毫无根据而不可信的！

宫廷防火措置研究

紫禁城遭遇火灾概况

坐落在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城池，建筑宏伟，殿阁成群，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迄今为止已有五百八十年历史。这座建筑宏伟的皇宫，曾遭受大的火灾二十余次，几乎每五十年要发生一次大的火灾。失火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如太和殿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遭受雷电袭击两次，而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清康熙十八年（1680年）人为失火两次。

据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专家于倬云先生主编《紫禁城宫殿》及参见文献史料记载，由于紫禁城宫殿建筑都是砖木结构，明清两代宫内建筑屡次遭受火灾。

据不完全统计：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

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乾清宫毁

于火。

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文渊阁火灾。

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乾清门火灾。

明弘治十一年（1498 年），清宁宫毁于火。

明正德九年（1514 年），乾清、坤宁二宫毁于火。

明嘉靖元年（1522 年），清宁宫后三宫火灾。

明嘉靖四年（1525 年），仁寿宫火灾。

明嘉靖三十六（1557 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又遭遇火灾。

明万历元年（1573 年），慈宁宫后殿火灾。

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慈宁宫火灾。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西华门城楼火灾。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乾清、坤宁宫火灾。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殿）火灾。

至清代，康熙十八年（1680 年），

太和殿火灾。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贞度门、熙和门等处火灾。

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火灾。

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佛堂火灾。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火灾。

咸丰八年（1858年），延辉阁火灾。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火灾。

同治九年（1870年），北五所敬事房木库毁于火。

光绪十四年（1888年），贞度门、太和门火灾……

根据以上统计，不难看出明代宫廷火灾明显多于清代宫廷。因此，各朝各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恐惧皇宫火灾的发生，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火设施与措置。

紫禁城实施的防火措置

紫禁城的建筑设计师出于防火考虑在建造銮驾、红本、实录等库（明称"古今通集库"），均采用硬山式黄琉璃瓦屋顶，四周厚重的砖砌墙身，两山安有琉璃博风，前后采用封护檐做法，不露

出木质结构特点。

紫禁城皇宫内廷的乾清宫、坤宁宫东西两庑，相对设施了两组防火墙，其南北长 1．6 米、厚 7．7 米。若一旦两宫发生火灾，能隔断火势向两庑及后宫延烧。

明代初建紫禁城时，设计师即巧妙地将护城河水引入皇宫，由西北至东南出，既美化环境（外有护城筒子河，内有御河），解决工程用水，又能及时解决救火水源。

明天启六年（1626 年），武英殿油漆作发生大火，即取御河水扑灭。皇宫内廷还掘井约八十口，除供宫女、太监引用外，也为救火之用。

紫禁城内实行值宿制度。据《明宫史》记载：每夜掌印、秉笔、掌事牌子等人，在乾清宫各值房内居住，“伺候暗灯及烛于桌上，立铜箍头攒竹五尺一根于桌旁”；“凡夜间御前有事，忽有传召或值火灾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驾前，以防卫之”。

同时，当差听事分两班四拨，每拨有数十人，夜间轮流“叫火巡风”，一旦发现哪有光亮，便立即寻找是否失火？由于宫内设有大小佛堂，因而特派警侍

卫司其灯烛香火。凡遇大风之日，警侍卫便大声呼喊：

谨慎灯烛，牢插线香。

另外，在紫禁城外四周，设置红铺四十处，每铺旗军十名，昼夜看守。每夜起更时分，官军提铜铃相继传递巡查。每晚还有一员勋臣在紫禁城阙左门值宿。

清代沿袭明制，紫禁城"禁饬火烛"的值宿制度更加严格。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谕旨：

八旗都统、副都统更番入值紫禁城。

紫禁城内诸王及满洲文武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轮流值宿，谓之"六大班"。值宿点在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的为"内班"；太和门的为"外班"。

紫禁城的守卫军队主要是护军营。该营设有护军统领、护军参领及护军校等员，"掌司门禁，率值班官兵，以守卫宫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处咨文》规定紫禁城内：

值班官员必须在辰刻至景运门内九卿房面行交替接班，然后仍在

景运门内外班房会集，时刻不能远离。至申酉之间，始准各自散归值宿处。

另据《王氏东华续录》载：

紫禁城内住班王大臣，例应于辰刻进内接班，其出班之人，应俟接班者进内面行交替，始准散归。

紫禁城内还有管激桶大臣、官员兵丁，谓之“火班”。如一旦宫内起火，倘有传用激桶之事，各库官员司库报名官门大臣，迅速将火班调集景运门归值宿统领指挥。

关于值宿者有空班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乾隆皇帝不止一次地怒斥。据《国朝宫史续编》卷一·训谕一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 年）十月十一日奉谕旨：

内廷坐更，最关紧要，至御前更，尤宜慎重，倍加认真，轮流坐守。向来坐御前更者，所有更头、更二，俱系首领太监，及食三两钱粮执事太监之差。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六月十二日奉谕旨：

大门上侍卫等，皆在内廷当差。一切进班扈从，甚属紧要，伊等各宜谨慎小心，黾勉差务。今据领侍

卫内大臣等奏称，侍卫等在紫禁城东园、南园进班。及跟随阿哥等出入，有空者数人。进班之散秩大臣，非正管之人，往往含糊了事，请饬散秩大臣等，嗣后进班。务须查侍卫等语，侍卫等疏懒成习，朕屡经降旨训饬，伊等仍复不悛。皆因领侍卫内大臣，平日并不严查所致。如会恒、阿里衮系军机大臣，等项甚多，无暇及此。其余该管大臣扎拉丰阿、兆德、达色等所思何事。理宜留心稽查，严加管束。嗣后各该管大臣如不查，以致因循空班，查出必将伊等一并从重治罪，并令进班之散秩大臣等留心稽查，本班侍卫空班，因参奏者参奏。因禀知领侍卫内大臣者即行禀知。倘不以为事，因循故纵，被领侍卫内大臣查出，将散秩大臣一并参奏。再前恐紫禁城内进班之护军等，坐更送筹疏懒，特饬委员严查至今并未派委。日久恐有怠惰，着将此旨并交各该管大臣通行晓谕侍卫、护军，敬谨遵行。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防止值宿营官兵、太监丧失警惕，松弛怠惰，清代宫廷摒

弃明代宫廷的“铜铃传递”，而采取“五筹递传”的接力方式。

据《钦定大清会典》卷八七记载，紫禁城皇宫内廷每夜“传筹”巡逻：

> 自景运门发筹西行，过乾清门，出隆宗门。循而北，过启祥门。迤而西，过凝华门。迤而北，过中正殿后门，至西北隅。迤而东，过顺贞门、吉祥门，至东北隅。迤而南，过苍震门，至东南隅。迤而西，仍至景运门。凡十二汛为一周。传筹五。

紫禁城皇宫外朝每夜“传筹”巡逻：

> 自隆宗门发筹东行，出景运门。循而南，过左翼门、协和门，迤而北，过昭德门，循而西，过贞度门，迤而南，过熙和门，循而北，过右翼门，仍至隆宗门。凡八汛为一周。传筹五。

另外，在太和门院内也布置了每夜“传筹”巡逻：

> 自中左门发筹，过东大库、西大库、中右门，仍至中左门。凡四汛为一周。传筹三。

紫禁城皇宫内廷、外朝和太和门院内，每夜累计“共以十三筹递传”巡逻。

据《钦定大清会典》卷八七记载：

> 以护军校一人，护军九人直（值）景运门送筹，隆宗门送筹如之。以护军校一人，护军七人直（值）火班。

紫禁城诸宫门中，景运门和隆宗门是皇宫内廷与外朝的分界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来往人多，所关尤钜。因此，除值班官兵之外，景运、隆宗二门外，向来有内务府派了番役头目，在彼值班稽查。各护军在紫禁城内各门、各库及各处都有确定人数，这样就保证了紫禁城皇宫内外的防火、防盗安全，而且以"传筹"的形式巡逻，也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值宿、巡逻失职的一些漏洞。

清代皇帝重视宫廷防火

紫禁城历经明清两代二十四个皇帝。在宫廷防火措置的相互比较中，清代皇帝要比明代皇帝重视得多。他们不仅严谕宫内"禁饬火烛"，而且，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据《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等文献记载，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多次谕旨，要求隆冬有风季节，小心谨慎宫内烛火。

康熙十八年（1679 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火灾之后，康熙皇帝即谕旨：

宫内各处灯火最为紧要。凡有火之处必著人看守，不许一时少人，总管不时巡察。

为避免紫禁城皇宫内廷失火，曾严格控制禁止吃烟。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十月初一日上谕，奉太后懿旨：

今隆冬有风之际，各宫灯火著用心谨防。不许任意吃烟，着不时严察。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

宫内地方火烛，务要小心，着总管严传。

为了防火之需，康熙朝时在东华、西华门外，还设置了防火步军。这可以说，是为雍正朝建立紫禁城火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皇帝早在幼年时代，就耳闻目睹康熙十八年（1679 年）太和殿因人为因素失火焚毁的惨状。直至他二十岁时，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金碧辉煌的太和殿才在废墟上完工。

雍正皇帝御位的短程十三年中，即

非常重视“紫禁城内每年冬令禁饬火烛”。在隆冬有风季节，经常告诫宫人“宫中火烛最要小心”。

首先，在宫殿房屋建筑方面增加设置了防火措施。

据《国朝宫史》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皇帝发现乾清宫两侧的日精门、月华门向南一带围房后面有做饭值房，他告诫做饭值房人员，“虽尔等素知小心，凡事不可不为之预防”。嗣后，他发现做饭值房时常有火星儿在房檐处附进飞闪，危险异常。他又即刻降旨：

> 可将围房檐改为风火檐。即十二宫中大房，有相近做饭小房之处，看其应改风火檐者，亦行更改。

“风火檐”也称“风护檐”。凡悬山与硬山建筑，檐墙由地面直抵檐下，两侧近檐口处置挑檐石，使其上皮与檐枋下皮平齐，一般只用于后檐，主要不露明梁头或斗拱等木构件。“在墙头砌叠涩菱角牙子、枭混线、砖椽等，直达瓦头之下”（《中国建筑史·清式建筑做法》）在雍正皇帝训谕的督促下，总管内务府责成造办处将内廷东西十二宫的“小房之处”房檐，全部更改为封护檐式样，

“以昭慎重”，做到防患于未然。

其次，紫禁城内宫中防火组织的建立。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

紫禁城内火班始于雍正五年。

雍正皇帝为使紫禁城火班建制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旨意新“添设防范火烛班房人员”，要求“东华门、西华门外派有防火步兵，即于此内熟习之人酌量派出”；“紫禁城里该班人内作何分派？及派出之人俱在何处？住班之处？尔等区划，永远可行之”。

清宫总管内务府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对防范火烛班房人员进行了具体分派。

（一）抽调“步军校两名，步军四十名，内务府所属护军八名，披甲人二十名，苏拉二十名，銮仪卫校尉十名，共一百名为一班”。

（二）必须挑选“年力尤为强壮”，并“择其操演技艺娴熟”、“妥固整齐者”。

（三）由总管内务府负责，将他们周期性地“按期派往该班，令其更换，以备防范火烛”之需要。

（四）每日，紫禁城火班由“该班司官内管领等管辖稽查”，同时规定值班

"内务府大臣、护军统领掌钥匙，护军参领共同稽查"；"专管稽查齐集之处，应令现在慈宁宫正门"的紫禁城火班人员。

总之，在雍正皇帝的亲自过问下，紫禁城火班从人员分派、值班场所、安排住宿、器具齐全等各个方面，都安排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可见，雍正皇帝对紫禁城内的防火安全是何等的重视！

据雍正七年（1729年）统计，"紫禁城内值班官员、侍卫兵丁共一千二百八十八人"，有三十七处侍卫值宿点。

《啸亭杂录》卷八云：

> 凡宿卫大内，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钥，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值宿。其值宿西华门北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

《清宫史略》云：

> 三旗侍卫分内外班值乾清门、三大殿。八旗前锋营、护军营守卫内外各门，按日分班、轮番值宿。又防范火班遇时调集总隶于景运门值班统领。

我们通过以上文献史料记载，大致

也可窥见雍正朝侍卫兵丁值宿之一斑。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卷一记载：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或领侍卫内大臣或散秩大臣带领该班（紫禁城火班——笔者注）之司官内管领等”负责；“太和门值班侍卫什长等三员，带领亲军二十名”；“除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体仁阁、弘义阁、午门、景运门、隆宗门、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等紧要十四处看守护军不派外，将左翼门等二十三处护军，每处派出二名，共派四十六名”，前往齐集之处是慈宁宫正门。

另外，三十七处均分配有“应用防火器具”，即“俱照步军校咨呈都虞司转行各该处发”。这样，在紫禁城内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防火网络。

但由此出现一个问题，一旦“应用齐集”、四面八方奔来众多官兵，不可能面面相熟，更何况紫禁城内官兵绝不能随便走动互串。路过一些关防，没有可靠凭据怎能放行？

因为，平常王公大臣要入内廷都极为不宜，更何况那些普普通通的侍卫官兵了。显然，这牵涉祖制和不可逾越的宫规。

为此，雍正皇帝谕王公大臣和官员以“合符”、“印钥”、“金牌”为进出宫门的凭证。

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谕旨：

> 夜间遇有开城门事件，令尔等传旨者，若无勘验实据，看门人等难以凭信。著造办处制合符四件：一交乾清门该班内大臣，一交左翼，一交右翼，其一尔等收贮。凡夜间开门，将符合对，以为凭据（《国朝宫史》卷三）。

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上谕档》也记载紫禁城皇宫门禁之制：

> 于景运门、隆宗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各有阴文合符一扇；午门及午门西门各一扇；若夜间奉旨饬遣。须马上开门时，务持出阳文合符，比验相符，方能启门。苍震门、启祥门，遇阳文合符至门，则由护军统领所带阴文合符，查验放行。若无阳文合符，切不可启门放行。

“宫中门禁”中使用的“合符”，《清宫史略》云：

> 涂金镌阳文圣旨字，藏大内与

景运、隆宗、东华、神武门，预颁阴文合符。

然后进宫人将手持的“阳文”，比验相符合格者“立放”；同时“其余各门驰报步军统领比验，启放，均于次日具奏”。

据《养吉斋丛录》卷四记载：

雍正十年，铸“办理军机处”印。乾隆初，换铸清、汉篆，其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印藏大内，印钥以领班之军机大臣佩之。有事，则直（值）日章京至内奏事处请印，向军机大臣请钥，用印毕，即送入内。乾隆间，军报旁午，难于屡请屡缴，故请印出，则钤就数日百封函，以备取用，自后遂习以为常。凡请印钥，以金牌为验。牌广约五分，厚一分，修约二寸，镌“军机处”三字，直日章京佩之。封印后，领班章京佩之。若有扈从之役，则先出都一日请印，交领班大臣管带。

以上介绍的“合符”、“印钥”、“金牌”，的确保障了皇宫内廷的安全，又不耽搁火急报朝公事；凡是王公大臣、官僚衙门进宫门需查验，即一切均以持

“合符”、“印钥”、“金牌”为凭。现故宫博物院将其作为珍贵文物珍藏着。

但是，紫禁城火班及千余人侍宿卫处都在内廷之外围区域，倘若皇宫内廷东、西六宫出现火情等突发事件如何处置？

雍正皇帝明白火患非同小可，虽然总管内务府敬事房有“查视各门启闭巡查火烛关防等事”（《清宫史略》），必须将内廷太监组织编队，适应指挥管理，才能应付燃眉之急。

因此，在雍正五年（1733年）十一月谕旨：

> 旧年造办处太监等抬水救火，虽属齐集，但少统领约束之方。可将宫内太监编集成队，每队派头领一名，每十队立总头领一名，不但救火，即扫雪、搬运什物用人时，只须点某头领，彼自齐集所属，同往料理。纵使人多，各有头领点头约束，必不至于紊乱（《国朝宫史》卷三）。

不难看出，雍正皇帝对紫禁城内的防火措施的每个细节，都是煞费苦心的。可以这样说，紫禁城在清朝二百余年风雨中保存下来，正是与清代雍正皇帝

“事必躬亲”，重视宫中火患分不开的。

清乾隆皇帝也十分重视宫廷中的防火措施。

据《国朝宫史》卷十八载，乾隆七年（1742 年）十月初五日定《宫中现行则例》，严厉规定：

各处太监等有不谨慎火烛失误看守者，系首领罚月银四个月，系太监重责四十板；

各处太监等有不谨慎坐更贪睡失误者，系首领罚月银四个月，系太监重责四十板；

如系太监犯罪，该管首领失于觉察者，应照本罪减等罚月银一个月。

《国朝宫史续编》卷三·训谕三记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奉谕旨传谕总管等：

嗣后宫内等处，倘遇有火烛之事，总管等即行开门，放外边王公大臣进内扑救。并着总管等量其相近之门开放，不可着外边人等绕远，如开较远之门，未免迟滞，以后谨记。

乾隆皇帝的这一旨意，终于突破了宫规所规定的外人不许随意人内廷的界

限，在宫中火灾面前，只要能及时将其扑灭，这点付出是完全应该的。

清道光皇帝发现紫禁城太和殿等殿安设火盆，但一遇风吹却满地星火，故提出了改进措施，最后旨意将殿内所设的灯笼，永远裁撤之。

据《钦定总管内务府堂现行则例》一卷·常朝仪制记载，道光二年（1822年）月奉旨：

本日，朕御太和殿，殿内安设火盆过多，后面三槽隔扇开，又遇风吹，火星满地。经御前大臣侍卫等纷纷踩灭，并不御寒，竟为开销地步，徒费无益，此皆内务府大臣漫不经心所致。嗣后，每遇保和殿筵宴，太和殿受贺筵宴及御太和殿，俱在地平二层两角安设炭火二盆，盆内炭火用灰掩盖，两边隔扇俱不准开，仅开中隔扇。每遇看祝版，中和殿、太和殿毋庸安设火盆，两边隔扇也不准开，永著为例。并著内务府大臣一人，每次查看，如有违例，多安火盆，不掩两边隔扇者，司官革责。本日查之，内务府大臣即时降级不贷。钦此。

是月奉旨：嗣后，每遇祭天坛、

太庙、奉先殿其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内所设灯笼，均著永远裁撤，毋庸安设。钦此。

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奉上谕：

李宏谟奏禁城屡次失火，请饬予（预）防等语。禁城重地，近年以来，三次不戒于火。该处看守人役及值班人等，漫不经心实非寻常疏忽可比，除此次神武门内敬事房木库失火之看守值班人等，业经交慎刑司审办外，嗣后著禁城内各该管大臣，暨总管内务府大臣督饬各该处员役，并传谕总管太监等，随时严密稽查，小心防范，毋得稍有疏失致于重惩。钦此。

看来，清代历朝皇帝都是十分重视宫廷火烛，并严格控制火盆、灯笼的安设；同时，对于玩忽职守的王公值班、领班官员，即使是失察的内务府大臣，也照样降级惩罚，决不姑息。这也是紫禁城皇宫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紫禁城内的防火器具

紫禁城内无论是“外朝”或是“内

廷”的宫殿庭院及东、西六宫长街处，均设置着无数引人注目的“吉祥缸”（也称“太平缸”）。吉祥缸有铜缸和铁缸两种，其质可分为“镀金海”铜缸、青铜缸和铁缸三类。

皇宫各处陈设吉祥缸的大小、多少，是随着环境而定的。如太和殿、保和殿及乾清门等处各东、西两侧，陈设的都是“镀金海”铜缸，而在东、西六宫等庭院及长街上所陈设的就是较小的青铜缸或铁缸了。它们既是美化宫中的装饰品，又是必不可缺的消防器材。

古人将吉祥缸称赞为“门海”。盖门海者，门前大海也。古人相信，门前有大海，就不怕闹火灾。这些吉祥缸常年备储清水，一旦宫中失火，即取最近处的吉祥缸内水扑救之。

对明、清皇宫所铸造的吉祥缸如何区别呢？

明代吉祥缸用铁或青铜铸成，特点是上奢下敛，缸周围有明显的相铸痕迹，两耳上系加铁环，虽古朴大方，但工艺较为粗糙。

清代则铸成“烧古”青铜缸，看去表像涂上了一层乌亮的青漆，典雅古朴；而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乾清门等

处十八口“镀金海”铜缸，铸造精美雅致，外表富丽堂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腹大口收，缸面光滑，工艺精细，两耳被装饰为兽面纹铺首铜环。

这种“大清乾隆年造”的“镀金海”铜缸，据清代宫中档案记载，直径五尺（清尺约1.6公尺），每只缸高约1.2公尺，约重三千三百九十二公斤；而一般青铜缸直径四尺（清尺约1.28公尺），每只缸高约1.2公尺，约重二千一百六十六公斤。五尺直径的大铜缸，每口的铸造费用约合白银五百多两。

紫禁城内大小“吉祥缸”在清代中期有三百零八口，一年四季都储满清水。

清宫规定，为防缸水干涸，内廷的吉祥缸，每日由关防衙门内管领率领苏拉（满语，即宫中差役）进内廷添水；外朝的“吉祥缸”，每日由宫中激桶处苏拉将缸水添足。

清宫总管内务府派司员四人负责管理，每五天检查一次吉祥缸储水情况。北京冬天气候寒冷，每年上冻之前，每个缸都套上一层厚厚的棉外套；每岁小雪节，要在吉祥缸上安设缸盖，盖中设铁屉，贮火融冰；在缸的下边置放通红的木炭，昼夜不息，防止结冰。待到第

二年惊蛰大地回春时才撤火。所用的木炭，都是优质硬木精心烧制而成，没有气味和烟尘，以保持皇宫大内的整洁安全。

为了便于冬季生火，所有的吉祥缸，都架在专制的石圈座上面。石圈座一般是由四块或多块弧形石头围组而成，其大小刚好与缸底一样。石圈座一般高约35公分，也有稍矮一些的。每个石圈座的内侧都留有一个豁口，供添放炭火之用，谓之“熏铜”或“熏缸”。

清宫规定：吉祥缸“其缸盖铁屉，营造司首领太监等掌之。用火融冰，熟火处首领等掌之。统司于宫殿监，凡用火日其先后，俱宫殿监酌量气候寒暖，传之熟火处遵行”（《国朝宫史》卷八）。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皇帝看到紫禁城外边各处均有防范火具，发现紫禁城内反而防火空虚，存有漏洞，于是提出：

> 紫禁城内更属紧要，理应特行派人防范火烛。

当时，紫禁城内已有了各种防火器具，如铁锚、斧镢器具、长杆铁杈子、长杆钩子、长杆麻刷、蜈蚣梯子，以及大小水桶、扁担钩绳等。总管内务府特

将其安排在紫禁城内西北部的咸安宫（乾隆间更名为寿安宫）前墙西空地，盖造板房二十五间，以便火班“贮放器具，并防火人等该班之处”。所谓蜈蚣梯子，它是一根笔直伸长的沙槁，上钉横棍，如同蜈蚣双脚那样立直可攀。

每年春秋两季，皇宫内都要举行大型操练演习。届时，紫禁城火班人员、步护军官兵及宫内太监、苏拉等杂役人员云集出动。

雍正朝规定紫禁城内“额设激桶八架”。同时，宫中还增添“西洋国水铳器”。

据《李朝实录》载，雍正元年（1723年），朝鲜“观象监”“入往燕中，得来乃救火灾者也。”所谓“燕中”即指北京皇宫。所谓“水铳器”即激桶，是一种由人工操作的喷水灭火设备；其构造恰如一个放大尺寸的水枪，它的主体是一副竹套筒或金属套筒，内筒顶端有用皮子做成的活塞，下部有分岔的支脚，扬水时即以支脚步承抵地面，将外筒顶端喷射，将水射至火场。

清宫总管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案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旨意：激桶“作竹子的，若怕裂，外面做漆的，钦

此。”

嘉庆朝时，清宫内已使用主体是以挂有锡里的水箱——西洋激桶，可能来源于宫廷供奉的西洋耶稣传教士之手。也有可能是嘉庆二年（1797 年），乾清宫失火，那些宫内装备的竹漆、皮制激桶在熊熊烈火中已成废物，由此促使嘉庆皇帝引进货真价实的西洋真品了。

据乾隆年统计，乾清宫安设激桶六十五架（《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为七十架——笔者注），慈宁宫、宁寿宫安设激桶各十架。东华门内东北筒间房内安设激桶四架，西华门内筒子河朱旗房三间内安设激桶四架。“倘有传用激桶之事，距各库切近者，各库官员司库报明管门大臣投递职名进内，在本处看守防范”。

清宫“每月二十五日，宫殿监率首领太监等查看，或有风干漏水之处，即行修理；其遮盖激桶布单，每遇岁暮染新。经三年后，有损坏者，由宫殿监行文广储司换给”（《国朝宫史》卷八）。

由此看来，皇宫内廷是重点。不过后来，又分配给护卫紫禁城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佐领管领下，设激桶一百三十架，水桶二百一十四副。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二月，太和门西的贞度门人为失火，接着又延烧了太和门、昭德门三十余间朝房，“黑烟如芝盖”。

灾后险些影响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的皇帝大婚。当时，残门颓墙，“不及修建，乃以扎彩为之”。事后总结经验教训，乃是防火器具年久失修又不完备所致。

为此，清宫内务府仿照京城水会局规模，采买头号深激桶四架，还请直隶总督代办购买“洋水龙”，宫内又备置了长杆号灯、提杆小灯、催水旗杆、随上油水管、长短木梯、长杆笸萝、抬水笸萝、铁矛、铁锯、拱钩、柳罐、镢头等若干件防火器具。

宣统二年（1910 年）九月，清宫还特意从日本东京激桶机械制作所购进四辆蒸汽激桶车。

如今，紫禁城皇宫内遗存有铜、铁“吉祥缸”一百零八口，以及激桶等其他防火器具。

紫禁城防火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清代康熙、雍正皇帝对紫禁城皇宫

内消除火患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对策，并对后世皇朝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促使后代皇帝们只能加强完善而绝不可削弱之。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添紫禁火班官兵一百八十二名。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添设火班内务府护军四十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还专设一百名操演激桶的披甲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除紫禁城火班人员外，又配代役苏拉二百名、步军营兵丁一百名。

特别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拟定《紫禁城内及圆明园火班章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议准《紫禁城火班章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再次酌拟《紫禁城火班章程》。

这里，笔者特意介绍光绪朝酌拟的《紫禁城火班章程》，此章程是针对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太和门西侧的贞度门失火案而制定的。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整顿火班、

妥议章程》，记载了光绪皇帝的一段谕旨：

> 禁城向来设立火班官兵，备豫不虞。近年以来，日就废弛，器具等项亦不全备，亟应认真整顿。著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妥议章程具奏。钦此。

当时，礼亲王、军机大臣世铎，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等，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九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内政职官类·光绪十五年二号卷·礼亲王世铎等酌拟火班章程折》奏称：

> 臣等遵即检查例案，查现办之章程，因日久弛懈，多系有名无实；现存之器具，亦因年久失修，诸多不堪适用，亟应认真整顿，以备不虞。臣等公同商酌仍依旧章办法，稍事酌量变通，拟酌添兵数以求核实，请派专员以归统属，筹给口分以资津贴，另购器具以期适用。谨拟章程八条，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批示火班章程谕旨》酌拟《紫禁城火班章程》共计八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火班官兵宜统归一项以责成也。查现行章程，禁城内每日步军统领衙门官之员，步军一百名、内务府护军八名、披甲苏拉各二十名、銮仪卫官一员、校尉三十名，共一百八十二名。东、西华门外大连房设官两员、领催二名、披甲苏拉各四十名，查此防兵丁集凑局成，漫无统属，分历各处，稽查难周，遂致奉行日久，尽成具文，旦一切激桶器具，年久失修，有不多堪适用，遇有紧急难期得力。今拟稍微变通办法，将火班兵丁除步军营兵丁一百名，仍照旧值班外，其余护军营、銮仪卫各处凑集之兵，令其均归原处当差，专由内务府苏拉处，挑选年力精壮代役苏拉二百名，充当激桶兵之差，不派别项差使，分为两班，五日一换。另选苏拉头目二十名，充当激桶咀子之差，随班更替。每日晚间演义一次，演毕将激桶全行添水，以备次日激打。如此逐日演练，自能日久熟习。

二、激桶器具均宜添置也。查以设激桶制样稍小，原不甚使用，又加以年久失修，间有损坏，一切

器具，诸多不齐。今拟仿造水会规模，采买头号激桶四架、二号四架；号衣三百二十件，长杆号灯三十枝、提杆小灯一百六十个、催水旗八十杆、随上油水管八十副、长短木梯各四架、长杆笸萝八十副、抬水笸萝八分铁矛八副、拱钩二十杆、柳罐八十个、铁锯八副、镢头二十把，以备应用。并于附近值班处所，由内务府择选房间数处作为储之所，如有残，随时呈报，由内务府派员修理。

三、值班处拟稍微更换也。查步军统领衙门，原设官之员步甲一百名，在武英殿前值房住宿；内务府披甲苏拉军在东、西华门外大连房内分设。现内务府之兵，既改为专用苏拉一项，自应宜在禁城内值宿；步甲由外统辖自应在禁城以外值宿。今拟将武英殿前值房，改为新设之内务府激桶兵住班之所，其步军营步甲一百名，移于东、西华门外大连房各分五十名东、西住宿。城内之兵逐日晚间在内演习，城外之兵逐日晚间在外演习，均派出之稽查火班大臣统辖调遣，以专责成。

四、新设激桶官兵宜酌量筹络口分。新设民役苏拉本无钱，今既派充激桶兵丁，责以逐日演习，分班住宿，应伏（付）口粮以资津贴。今拟将激桶官，每日给口分银二钱；激桶兵头目，每名每日给口分银一钱五分；激桶兵，每日给口分银一钱，均照本日该班官兵之人数开放。

五、内外兵丁宜各派委员管辖也。查内务府激桶兵，既专用苏拉充当，自应仍派苏拉处之内管领辖。今拟拣派关防衙门差务熟悉之内管领二员、副内管领四员，补筹给口分，轮流值班，新设激桶兵丁责其管辖教练。其步军统领衙门，步军一百名亦由步军统领衙门，拣派妥实地面官四员，筹给口分，轮流值班步甲激桶兵丁责其管辖教练。

六、新设激桶兵宜请简派大臣统率也。查向章火班官兵并无大臣专管，一切勤惰，漫无考核。今既专立处所，拟请钦派大臣数员，作为专管各该处官员兵丁，均归其统辖。每日督饬该官兵演习器具，并稽查值班人数，如有疏懈，由该大臣奏参兵丁；如有旷误，由该大臣

责革。

七、各处吉祥缸宜时添水也。禁城内原设吉祥缸，向分冬夏，随时添水。查宫内吉祥缸关防衙门内管领，尚遵循旧制，率领苏拉进内添水。惟三殿以前外围吉祥缸，因年久废弛多不上水。拟自定章以后，除内围仍遵旧制，归关防衙门督饬添水外，其外围各缸，即责成新设之激桶处苏拉，于每日轮流按处将水添足，并派司员四员五日一查。

八、各门值班官兵应遇事听调。除午门等十四处值班官兵遇事不准派拨外，其左翼门等二十三处护军、内务府朱车三十二处披甲，遇事均派拨一定数量的人员，听候火班统率大臣调遣。

光绪皇帝当日批准了上述的《紫禁城火班章程》，并谕旨：

详阅所拟酌添兵数、筹给口分、另购器具各条，尚属周妥，即著照所议办理。……惟立法伊始，要在专责，勤演练，并随时认真整顿，庶不致日久仍成具文。

应当说，光绪朝所制定的《紫禁城火班章程》，是在嘉庆朝制定的《紫禁城

内及圆明园火班章程》和《紫禁城火班章程》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练与简化，故而更加务实而实用。

譬如，乾隆朝每年春秋两季，皇宫内都要举行大型操练演习。而光绪朝所规定的“每日晚间演义一次，演毕将激桶全行添水，以备次日激打。如此逐日演练，自能日久熟习。”而且，紫禁城内、城外激桶官兵都要“逐日演习”，这样才能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以确保紫禁城内的防火安全！

宫廷乾清宫失火案综述

北京紫禁城皇宫内廷的乾清宫，曾是明代十四个皇帝和清代顺治、康熙两个皇帝的寝宫。此外，乾清宫也是历朝皇帝临轩听政、召对臣工、引见庶僚、内廷典礼、接见外国使臣以及读书学习、披阅奏章的场所。

历史上，乾清宫在明代三次（永乐二十年即1422年、正德九年即1514年、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不幸毁于火。清代乾清宫火灾虽仅有一次，但损失惨重，牵扯三十二名太监被分别治罪。对此案，史料和档案文献有较详细的记载。

同时，通过这次火灾的教训，使嘉庆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对内廷的进一步防范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及各衙门，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反省，总结制定出宫中救火措施及防范章程，特别强化制度，破除了宫规中原有的不尽合理的救防约束。

总之，这些宫规对紫禁城火班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防范措施，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堵塞了皇宫安全方面的漏洞。

乾清宫失火案原因的历史回顾

清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黄昏，乾清宫突然火光冲天，并迅速延烧左右两侧的宏德、昭仁两殿及北后的交泰殿。当时恰值初冬季节，风高物燥，古建筑本身是砖木结构，遇火更是烈焰熊熊。

据《清宫史续编》训谕五和《史料旬刊》第七期记载：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怡亲王永琅带领守护紫禁城垣的官兵"竭力汲水"，奋力扑救，但无奈"火起时势甚猛烈"，连交泰殿后的坤宁宫前檐已为熏灼所及，幸赖西北风起而无虞。作为太上皇帝的乾隆面对"救护得保"的坤宁宫，不无感叹曰："足征神佛垂佑，实乃不幸中之幸。"

翌晨，太上皇帝乾隆亲自"虔诚礼谢，以答灵贶"，但他面对已成为废墟的乾清宫、交泰殿、宏德殿、昭仁殿，不禁痛心疾首，在十月二十二日训谕中谈到自己的一番心境：

> 兹于本月二十一日，乾清宫、交泰殿灾，朕心悚惕，寝食靡宁。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内载康熙十

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圣祖谕曰："殿廷告灾，所关只属临御之所，但得海宇清晏，置斯民于衽席之上，则今所居较诸前代茅茨土阶尚或过矣。"大哉训言，垂教至为深切。朕自当凛遵圣训，期四海之乂安，即一人之有庆，惟是上天示警，自有所由因。念圣祖仁皇帝八龄，御极在位六十一年，享寿六十有九。朕二十有五践阼，纪元六十年传位皇帝。春秋八十有七，精神纯固，康健如常，见五代元孙，武功十全，诸福备具，并未倦勤，日亲训政，此实仰邀昊贶笃祜之隆。逾于皇祖自揣受恩，过厚益凛持盈。今上天于默祐之中，示以儆戒。正是天心仁爱，启迪朕躬及嗣皇帝，我父子祗惧之余尤深钦感。且朕仍居养心殿，皇帝（指嘉庆皇帝——笔者注）则居毓庆宫，而乾清宫系接见臣工听政之所，相距俱远，祗因承值太监等不戒于火，致有此事。现在朕虽已传位为太上皇帝，而一切政务仍亲理训示，或政事有缺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即太监人等不能加意小心，大臣等将伊等按例治罪，引

以己过，尚从宽典，而救火出力之官员、步军及太监人等，均分别恩赉。此即朕不肯诿过于下，深自刻责于衷之意，或此一念修省，冀蒙上苍默鉴……。

由于，太上皇帝乾隆“自责”的同时，又降旨总管内务府大臣对失职太监“将伊等按例治罪”，和对救火出力的官员、步军、太监等人，均“分别恩赉”。这样，总管内务府大臣怡亲王永琅等人秉承圣旨，对乾清宫失火案进行调查。

原来失火情由，是掌火太监郝世通不慎引起。我们知道：一般皇宫内取暖方式有二：一是在宫殿的地面下边砌有火道或在炕床下砌有火道，由设在殿外廊子下的灶口处添炭，谓之“暖阁”；二是在宫殿内设有铜质火盆或精工细做的掐丝珐琅熏笼，谓之“熏殿”。

正如总管内务府十月二十二日呈皇帝奏折称：

向来熏殿火盆内，未尽灼炭即行埋灭、贮坛、贮在炕洞内，预备次日再用。此次系太监郝士通将炭埋闷熄灭，贪图近便，放在东穿堂楠木格旁，不料其复行回性，熏灼木格……

待到稽查宫禁内围重地的值班首领太监闻有烟味，急忙开门探视，已成燎原之势，赶紧慌忙泼水……但乾清宫终因抢救不力，化为灰烬。

乾隆对“失火延烧宫阙者”的惩罚

显然，乾清宫火灾是值班太监严重失职所造成，按照清廷律例必须严惩不贷。

清袭明制，据《大清律例·御制大清律例序》指出：

> 大清律，自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书成奏进，刊布中外。

依据《大清律例》载：

> 失火之人若延烧宗庙及宫阙者，绞监候。

所谓“绞”，即“全具肢体。斩身首异处，刑之极者”。

另据史料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初三日夜间，紫禁城内太和殿失火，火灾肇事者是御膳房给皇帝做饭的六个太监。康熙皇帝旨意放火之罪不赦。此等人在禁地不小心谨慎致此火变

……不容宽免，依议治罪。这样，六个太监按《大清律例》被处绞决。

在此基础上，乾隆七年（1742 年）十月初五日定《宫中现行则例》之各处首领太监处分则例十六条，其中一条明文规定：

> 各处太监等有不谨慎火烛、失误看守者，系首领，罚月银四个月；系太监，重责四十板。

根据以上案例和明文规定，清宫总管内务府大臣永琅及臣和珅、福长安、丰绅殷德、廚布、盛住等，于嘉庆二年（1797 年）十月二十二日经“严审定，拟具奏”，他们认为：

> 查宫禁内围重地，理宜小心看守，随时查点。今竟疏于防范，以致失火延烧，实干重罪，自应将失火延烧之太监及失于稽查之总管首领及该处散众太监等，分别治罪……。

故按《大清律例》之刑罚，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治罪方案：

（1）对失火太监郝士通应按例拟绞，又因在宫禁内围重地情罪较重，应请旨即行绞决；

（2）对乾清宫首领太监张士太、刘

顺、王进禄等三人，均请革去首领，照延烧宫阙，本例拟绞监侯，秋后处决；

(3) 对乾清宫该处散众太监李从祥、孙天成、张宽、萧进朝、李进保、吴学相、王成、李福、沈进保、张进玉、樊普、刘德胜、许进忠、于湄、舒进喜、冯得、陈福、吴进保、林国志、李太平、王进禄、王福林等二十二人，应请发往吉林乌拉给打猎捕户为奴；

(4) 对负有管辖巡查责任的总管太监分别治罪，将专管之总管太监顾进朝革去总管并罚钱粮六年；

(5) 萧得禄、张进喜、刘芳、佟安、佟玉明等，均请革去顶戴仍留总管，亦各罚钱粮四年，以示严惩。

无疑，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惩罚。

太上皇乾隆看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对失职太监及失于稽查总管首领太监等分别治罪奏折后，谕旨：

> 宫禁重地，该太监等不能小心看守，以致失火延烧获罪甚重，本应照拟严办。但乾清宫被灾，业经明降谕旨，朕方引以为过，其应行治罪之太监等，自应仰体上天好生之德，量予从宽。

太上皇乾隆的金口玉言，以言代法，

又做了比上述较为“从宽”的如下判决：

（1）原拟即行绞决太监郝士通，改为绞监侯，秋后处决；

（2）原拟绞监侯之首领太监张士太、刘顺、王进禄等三人免死，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

（3）原拟发遣之散众太监二十二名均免其发遣，此内李从祥、孙天成两名太监，系是专管乾清宫东暖阁之人，即重责四十板，发往吴甸铡草三年。张宽等二十人也重责四十板，交总管太监重新分拨当差效力；

（4）专管之总管太监顾进朝革去总管，仍回瀛台（紫禁城西苑今之中南海）在太监上当差，并罚钱粮六年；

（5）总管太监萧得禄、张进喜、刘芳、佟安、佟玉明等五人，均系总管究非专司，俱免其革去顶戴，仍各罚钱粮四年。

显然，太上皇乾隆朱笔一挥，比起总管内务府大臣所拟对失职太监的处罚要轻些，按太上皇乾隆的话说是“以示薄惩”而已。

既然有严厉的惩罚，也必然有奖励的恩赉。

十月二十四日，总管内务府查得从

宏德、昭仁、交泰三殿，抢出玉宝陈设首领之太监等，虽未能全数搬运，但均尚出力，除了已赏各处救火首领太监等人外，对管辖乾清宫“竭力汲水救护”出力的五名首领太监，每人赏小卷五丝缎各一件，二十一名太监每人赏银各二两。

后来，太上皇乾隆听说，被处罚的总管太监五人中的佟玉明，因救火面部受重伤，即刻降旨总管内务府对佟玉明“议罚钱粮四年，着加恩宽免”的处理。真可谓“奖惩分明”。

在这短短的仅三天的时间里，紫禁城内廷乾清宫失火案处理的快速干脆，不能不说与宫廷皇家重视宫中“禁饬火烛”的训谕有关。

总结宫中防范救火措施和拟定规章

据《清宫史续编》训谕六记载，在这次抢救皇宫内廷即乾清宫的火灾中，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漏洞。当时，“乾清宫失火时，各门洞开，人众嘈杂，即有一汉军披甲在内廷潜藏两日，始经查出，实属不成事体。嗣后，自万无此意外之灾……”。虽幸被值班太监发现，但其后

果令皇家不安。因为平常王公大臣要入内廷都极不易，更何况那些普通官兵杂役了，这实为牵涉朝廷祖制和不可逾越的宫廷规章。

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宫中防火，旨意制定了各种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如康熙皇帝针对太和殿火灾的教训，上谕：

> 宫内各处灯火最为紧要，凡有火之处，必著人看守，不许一时少人，总管等不时巡察。
>
> 奉太皇太后懿旨，今隆冬有风之际，各宫灯火著用心谨慎，不许任意吃烟。著不时严察。
>
> 宫内地方，火烛务要小心。著总管严传。

雍正皇帝更加注重宫中防火，谕旨更加精辟明确，细致入微。在御位的短短的十三年中，他非常重视“紫禁城内每年冬令禁蚀火烛”，重视在宫殿建筑方面增加防火措施。

雍正五年（1727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

> 宫中火烛最要小心。如日精门、月华门向南一带围房后，俱有做饭值房，虽尔等素知小心，凡事不可

不为之预防。可将围房后檐改为风火檐。即十二宫中大房，有相近做饭小房之处，看其应改风火檐者，亦行更改。

所谓“风火檐”也称“风护檐”。雍正皇帝细致到不但防火要改围房“风火檐”，而且旨意特别将“宫内太监编集成队，每队派头领一名，每十队立总头领一名”，以适应“抬水救火”之需，便于进一步加强指挥管理的需要，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更为惊叹的是，雍正五年（1727年）“添设防范火烛班房人员”，正式建立了紫禁城火班，配置人员一百名。

虽如此，但雍正皇帝并没有对皇宫外朝与内廷防火、救火中的脱节问题进行解决，沿至乾隆朝，乾隆皇帝才从实际出发，敢于打破了宫中这一禁忌。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初四日三更后，皇宫内廷寿安宫内遮阳席片失火，外朝护军巡更发现，急唤开门，始将首领太监等惊醒，但太监们竟不给开门，仍是自行扑救，幸是席片烧毁易于扑灭，否则迟误后果难料。

对此，乾隆皇帝诏示：

……伊等竟不开门自行扑救，

幸是席片烧毁，易于扑灭。倘火势稍大不能救时，始行开门岂不迟误。伊等不但失火有罪，其不开门之罪更大，在伊等或以宫禁严密，不敢擅行开门为辞。殊不思，寿安宫系朕新葺，为皇太后七旬万寿庆祝之所，此内并无关防，亦无多贮物件，既有失火之事，即应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救灭方是。此时进内救火人等，断无敢行偷窃，愍不畏死之理。嗣后，凡宫内园庭倘遇此等意外之事，该总管等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救。如不即行开门，必将该总管等从重治罪，将此旨传谕内务府总管一并记载。

根据乾隆皇帝的这一旨意，“随经总管内务府大臣议，将首领九十三、太监李世福锁拿，交都虞司发遣打牲乌拉；首领郝本德、太监张明德、曹国用、张国安交上驷院，发吴甸铡草一年”的“从重治罪”惩罚。

乾隆皇帝对宫中防火及救火事宜，特别是紫禁城皇宫内、外朝廷人员如何配合救火？如何既要保证宫廷内的绝对安全，又要不失时机的将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更是忧心忡忡；所以，他在乾

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一月初八日，更进一步强调：

> 军机大臣阿桂等奉谕旨传谕总管等，嗣后宫内等处，倘遇有火烛之事，总管等即行开门，放外边王公大臣进内扑救。并着总管等量其相近之门开放，不可着外边人等绕远，如开较远之门，未免迟滞，以后谨记。

这就将其紫禁城皇宫外朝和内廷人员，如何应急配合问题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了。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六月，清宫总管内务府奉嘉庆皇帝谕旨：

> 本日朕阅馆臣所进宫史续编，内载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钦奉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谕，传谕总管等，嗣后宫内等处倘遇有火烛之事，总管等即行开门放外边王公大臣进内扑救，并著总管等量其相近之门开放，不可著外边人等绕远，如开较远之门，未免迟滞，以后谨记。钦此。仰见皇考慎重宫禁，圣虑周详，训谕昭垂，实为明切。

嘉庆皇帝对这一火灾事件的重申，要求开放皇宫内廷大门放王公大臣等人

“相近之门开放”的进入，无疑是在乾隆皇帝对紫禁城防火制度的重视的基础上，尔后更进一步要对宫廷门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所以，嘉庆皇帝在吸取历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嘉庆十六年（1811 年）制定了《稽察门禁章程》十一条，其中为堵塞漏洞加之重要一条，即以“花名木牌”、“腰牌”作为入宫门的重要凭证和依据（参见《宫廷环卫整理措施初探》一文）。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十一月，步军统领衙门内务府会议奏准，拟改《紫禁城火班章程》十三条：

> 一、宫内遇有传用之时，总管太监遵旨启放何门，传知值班之奏事处官，不分昼夜，或由乾清门或由内右门转传侍卫班领，传知该班官兵齐集，候各该管激桶之大臣官员、管带方许进内。是日，值班之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在启放之门专司稽查，进门之时报明管门大臣，某人带领官几员、兵几名，管门大臣核对相符方准放入；出门之时，仍照原报数目按名放出。
>
> 二、来满汉文武大臣官员，俱

应即时齐集，惟入内人数过多，转致嘈杂，未必得力。应请旗员一品大臣到门报明管门大臣，不必奏明，俱准放入。其旗员三品以下汉员一品以下，俱不必前往。傥有私行混入者，官员据实参究兵丁，严拿治罪。内廷行走之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及大门侍卫值班者不得擅动；不值班者，准其进内，一同弹压，仍酌留四人在启放之门，帮同管门大臣一体稽查。其余官员惟步军统领衙门官员、内务府官员、左右翼翼尉、协副尉、步军校谙练扑救者，投递职名即带所属兵丁进门，其余各衙门官员一概不准放入。

三、步军营八旗激桶，仍照向例预备于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外，俟信传开何门即趋何门，责成该管大臣认识章京、认识兵丁，不必发给腰牌，报明管门大臣放入。

四、火班寻常该班兵丁，向例由内务府发给腰牌，应再预设木牌，一面载明官几员、兵几名，以便出入核对。

五、紫禁城内向有朱旗房三十二处，每日值宿内务府骁骑副参领

二员，章京领催十员名，披甲人一百六十九名，火班披甲人二十名。此项披甲人向于三旗新陈枪营内，择其技艺娴熟者派拨总管内务府大臣等。现已饬令该营参领于下班之日，择其年力尤为强壮者一百名，于操演技艺后演习激桶，再于内务府三旗额设激桶一百三十架，内择其妥固整齐者八架，添设于东华门内，东北角闲房三间内四架；添设于西华门内筒子河，旧有朱旗房三间内四架，派拨章京披甲人看守，仍责成东西值宿之副参领分界管辖。倘有传用之时，按进班披甲人分拨一半，在原该班处所看守。其余会使激桶之披甲人等，令该管副参领、该班章京带往应用，并令嘉庆十八年添设进班之内务府护军四十名一体襄事。

六、内务府额设激桶，除各处占用外，余具分存新陈枪营，以备在营之披甲人等演习。倘有传用之时，各旗披甲人均赴本营，每人二十人激桶一架；每激桶一架，或副参领一员或佐领或内管领一员，顶戴领催一名管带到门，报明管门大

臣放入，并请于东华门、西华门外空间大连房内，各安设内务府三旗激桶四架。每日派副内管领一员、骁骑校一员、顶戴领催二名，每旗各选择会使激桶披甲人四十名、苏拉四十名，共八十名东西分班值宿，按各旗进班之日更换。每日，在内务府衙门及值宿之内务府护军统领处呈递报单。倘有传用之时，内务府值宿之大臣，告知管门大臣，即传此项官员兵丁，带领激桶到门先行放入。至此项添设官员，每员每日应得菜蔬折价银二分；披甲人苏拉，每名每日应得菜蔬折价银一分。无庸动支正项，即由□□斤加价银两内发给。

七、紫禁城内内务府各司各库所管处所较多，均有责守，必须令该管司员等进内方无贻误，若一概准其放进，未免人数众多。除内务府堂郎中堂主事、堂笔帖式、都虞司官员、骁骑营管员、内管领、副内管领、番役道上苏拉等，各有应行传唤督催董率防范之责，准其在启放之门，投递职名，放进其余各处官员。笔帖式等一概不准放入。

八、紫禁城内，倘有传用激桶之事，距各库切进者，应令各库官员司库，报明管门大臣，投递职名，进内在本处看守防范。

九、圆明园步军营向设激桶八架，巡捕营向设激桶四架。今拟巡捕营再添激桶八架，应即将此激桶二十架，分于各门、附近堆拨存收设。遇奉旨启放何门，仍由总管太监传知值班奏事处官，不分昼夜，由左门转传侍卫班领传知步军统领衙门、朝房步军营，每激桶一架；用步军校一员、步甲三十五名，责成该班之副翼尉、办事协尉、协副尉管带巡捕营，每激桶一架；用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兵三十五，责成中营副将参将、都虞司守备管带齐集启放之门。住班之总兵，报明管门之大臣，章京投递职名带领入内，并责令是日值班之散秩大臣专司稽查。

十、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均有翊卫之责。自应一体敬谨预备查圆明园八旗，每旗原各设激桶二架，各派护军校一员，管理会使激桶护军各六名，挑水披甲各十名，跟随

护军校各二员、护军各十八名。包衣三旗原各设激桶一架，派护军校一员管理，会使激桶护军四名，挑水披甲四名，跟随护军校一员、护军四名。如遇应行传用，再派下班参领各一员管带，如参领不敷用，委参领一员管带，此项官兵各在本旗预备设。遇奉旨传用，仍由奏事处传知侍卫班领转传该班大臣，令各旗印房各堆拨，迅速递传齐集候信。俟奉旨启放何门，即将人数报明管门大臣，投递职名放入。

十一、如遇皇上进宫、圆明园有传用之处，总管太监知会在园值宿之大臣，并住班管理园庭大臣转传。如遇皇上驻跸圆明园、宫内有应行传用之处，总管太监知会值宿之留京王大臣转传。宫内由是日值宿之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在启放之门专司稽查，六班王大臣管带官兵随时扑救。城内居住之满洲一、二品大臣仍许放入。圆明园由是日值宿之散秩大臣，在启放之门专司稽查，值班之管理圆明园，八旗王大臣管带官兵随时扑救。一切稽查出入，俱照现议章程办理。

十二、备用兵丁，责成各该管官平时勤加演习，务令熟练并严加查察，不得有假冒顶替等，弊其应用激桶器械。除内火班向由内务府修理外，其圆明园应用器械，各该处自行修理。

十三、圆明园内务府三旗新建营，每营拟各添激桶二架，各派前锋参领一员、前锋校一员、蓝翎长一名、前锋二十名、披甲人三十名，在本旗预备皇上驻跸圆明园。设遇传用，仍由奏事处传知内务府堂住班处转传。如遇皇上进宫或巡幸，内廷主位仍在圆明园，由总管太监传知内务府堂住班处转传。如遇皇上内廷主位俱进宫，由总管太监知会住班之管理园庭大臣转传。该营护军参领传齐官员兵丁，启放何门即由何门报明管门大臣，投递职名放入等。因奉旨英和等会议火班章程依议。设遇中一路有传用之时，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俱著开放。馀则与何门，相近开放何门，朕在圆明园责成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如巡幸在外责成留京办事王大臣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所有应行入

内之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无论何衙门，随到随放。大臣等自酌数人分往稽查闲人，该班之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并酌派侍卫数员一同稽察，有不应进内混入欲行偷窃者立时拿获；问明随何衙门混入，将其人交刑部治罪，并将误行带入之员议处，钦此。

我们通过嘉庆朝《紫禁城火班章程》十三条，看到圆明园与紫禁城皇宫的地位是同等的重要，有关圆明园的规定就达到了五条。

总之，这些宫规对紫禁城火班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救火防范措施，也进一步堵塞了皇宫安全方面的漏洞；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紫禁城皇宫内廷的防火防盗的安全。

乾清宫的重建与竣工

关于抓紧重建乾清宫等宫殿修复工程，是据太上皇乾隆御旨，务必于“春融集料兴工，即行修葺完善，诸复旧观”的旨意行事的。

据清代《军机处札》档案记载：

奉旨于明年春融兴工，所有需用料值应行购办。天津、通州为商

贩辏集之区，南来木植必多，为此札仰该盐政厅，即照单开楠木、柏木、桅木尺寸购办送京，如有此照尺寸更加粗长者，更属甚善。即有不足尺寸，小些材料可做别项，应用者也不妨一并送京，以多得为贵，不必拘定单开尺寸，所有应需价值照例报销，并将各木植约可办有若干根之处，先行禀复本处，以便垂讯时登答。现在，长芦盐政前赴山东，即着运司先行赶办，特札。

根据军机处札所需应用楠木、柏木等项尺寸，分别为：长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径二尺四寸；长二丈七八尺至三丈、径二尺八寸；长四丈至四丈四五尺、径三尺五寸等。

也巧，河北省“献县知县知悉，照得乾清宫工程，现需购办木植，闻得该县交界处所，有魏公张家庄大庙一座，木料似乎合用”。于是乎，清宫总管内务府特派郎中德庆带领匠作人等前往查看，是否合适所需工程应用之处。

总之，采木集材棘手，又是太上皇乾隆谕催紧要工程，更是要“毋得刻延”。

嘉庆三年（1780年）十月初十日，

嘉庆皇帝陪着太上皇乾隆进宫阅视乾清宫、交泰殿工程，只见乾清宫巍峨壮观，规模宏整，乾隆不禁夸赞：

悉复旧观，朕心深为嘉悦。

联系到康熙十八年（1679 年）太和殿焚毁后，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的十八年间，金碧辉煌的太和殿才在废墟上完成。从这一点来说，重建修复乾清宫工程快速无比。

为此，太上皇乾隆又是一番对总理工程事务、监修监督官员及修建宫殿匠头、坐更巡查总管首领太监等人，给予“分别酌量赏赉”的奖赏，特别给予都领侍太监萧得禄缎二匹；总管太监刘芳、阎进喜每人大缎各一匹；首领太监十八名，每人小卷缎各一件；太监七十八名，每人银各三两等。

纵观紫禁城皇宫内廷乾清宫的重建，应该说与太上皇帝乾隆余威犹存、国力鼎盛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现今看到的紫禁城乾清宫，即是嘉庆三年（1780 年）重建的。

宫廷驯养鹰鹞特点散谭

宫廷驯养鹰鹞遗风简述

我国古代宫廷以鹰为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流行，楚文王便喜欢养鹰鹞和玩狗为乐。

隋朝开皇年间，设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

所谓“鹰扬”一词，来自于《诗经·大雅·大明》中有“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实则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和象征。所以，据《隋书·炀帝纪》中记载，大业四年（608年）“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帝王对鹰类猛禽极其嗜好，所以驯养分工较细。唐朝宫廷内专门设有五坊，曰：“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五坊中竟有四坊是猛禽的饲养，它是服务于帝王狩猎之用。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

民独爱驯养鹰鹞。常将“佳鹞，自臂之”，以寻欢乐。一次，太宗正玩在兴头上，有人秉报魏徵到来，他一时所急，只好将鹞“匿怀中”；但魏徵不理会，奏事时间很长，结果这只皇帝得意的佳鹞，竟被窒息闷死于怀中。唐太宗对魏徵犯颜直谏有所顾忌，又爱鹞心切，慌乱中出差错，使他最宠爱之物憋死怀中。

自玄宗李隆基之后，五坊太监对皇家的一再受宠，趋之若鹜，得意忘形，所以对民间也有所倚势霸道。对此，顺帝李诵看之不下，曾大刀阔斧地裁之，但时间不长又加以恢复了。

以鹰为戏，应该说各个朝代都有驯养鹰鹞之记载，而尤以清皇朝宫廷内最为考究，史料记载颇为详尽，豢养鹰鹞及猛禽机构建制也最全。

早在顺治初年，即设立了鹰房、鸦鹘房。

乾隆十一年（1746 年）改养鹰处、养鸦鹘处。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十二月，《国朝宫史》一书修成，在其“官制”一章中，对各处太监名额、职官和职掌都作了新的补充修正，其中规定：

鹰房：八品侍监首领二名，太监八

名。专司饲养鹰、鹞等事。

狗房：八品侍监首领二名，太监十名。专司猎犬及御前坐更等事。

养牲处：八品侍监首领一名，太监三名。专司饲养禽兽等事。

鸽子房：不设首领，属苍震门首领管辖，太监察院三名。专司饲养鸽子等事。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裁鸦鹘处，后总名为养鹰鹞处，其地点在紫禁城皇宫内东华门北之三座门路东房院内。养鹰鹞处设管理事务王大臣三人、协办事务兼鹰上统领二人，头领、副头领五人。

清代《内务府册》档案记载，鹰房十二，狗房十九。

据《啸亭续录》记载：

鹰狗处向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总统二人，以侍卫兼之。豢养鹰狗备搜□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许其蟒袍、纬帽。壬戌迁于东安门内长房（壬戌，嘉庆壬戌年也）。

据《养吉斋丛录》载：

鹰狗处，调犬以八旗人为之，调鹰及雕之属以西八城回子为之，

道光间裁。

清代帝王允许这些猛禽饲养于皇宫（皇城）内，可见其宠爱备至了。鹰鹞能被清代帝王所喜爱，是因为它是捕捉狩猎的天然助手；另外用鹰鹞捕捉雉禽兔兽等，也可供皇帝祭祀或御膳之用。

乾隆皇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一书中，已援引《大金国志》关于鹰鹞的记述。在女真的土产中，鹰鹞是禽类贡宫廷的重要一项。

据《清稗类钞》记载："辽东皆产鹰，宁古塔尤多"。其所列的吉林进贡方物中，更有"七月进窝雏鹰鹞九只……，十一月海青芦花鹰、白色鹰俱无额数"的记载。

另据《簪去楼杂说》云：

顺治乙未，朝鲜献白鹰。

在贡纳宫廷的名鹰中，首推"海东青"，即"首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此鹰喜山巅云海，飞翔如旋风直冲云际，以小制大，善捕天鹅。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鹰户每年向朝廷交鹰，可将鹰折银，抵消正赋。此例规定极详。如顺治十八年（1661 年）议准：凡鹰户投充新丁，有交海青者，每架可折银三十两、另赏

银十两、毛青布二十匹；而交普通鹰者，一等鹰每架折银十五两、二等鹰十两、三等鹰五两，四等鹰和体长尺余、只捕小鸟的鹞子，仅折银一两。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三五《海东青行》诗云：

鸷鸟种不一，海青称后绝。
摩空健翮上，层霄千里下。
击才一瞥当，其脱韝始纵。
时风力未会，迟飞掣群燕。
缘扑或坠落，何异淮阴胯。
下气且折鹰，鹑之雏可罹。
罿海青之雏，得未逢闻之。
育卵大海东，追逐天鹅入。
回顾忽失故，国踪海东青。
尔不远为利，尔不高腾空。
安得受制于，人垂头仰饲。
居樊笼王孙，莫恨未央宫。

可见，清代帝王喜爱鹰鹞到了何等程度，对"海东青"的习性、能力都十分的了如指掌，更是帝王捕猎禽兽不可多得的帮手。所以，"海东青"被猎户贡进宫中，自然赏赐银两十分优厚，"海东青"之珍贵，可见一斑。

据清宫总管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嘉庆朝，内务府曾对雕笼大加整饰、修

理。这是因为进贡的鹰鹞的急速增加，而雕笼不足所致。

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笼养鹰鹞雕等猛禽，占有正房和厢房达十四间之多。雕笼每座各面阔、进深十二尺、柱高一丈、五檩挑山。笼内放置直径三尺、高一尺的四十斤木盆一个，以投放饲料和清水供饮食之用。

据清宫档案记载，修造雕笼由总管内务府营造司承担，制作材料上要求精致十分讲究。嘉庆六年（1801年）三月，有六只雕要入笼饲养，营造司除修理旧有的三座雕笼和三个杉木鹰盆外，还又添做三座雕笼，并造作了铁箍杉木鹰盆三个。与此同时，铺三座新雕笼的席箔，计达一百四十四两。

清宫在喂养鹰鹞方面，主要以肉食为主，以符合猛禽之天性。清宫档案藏有乾隆年《养牲底簿》记载：雕鹰每只每日食用羊肠十两；而鹞子每只每日则食用六只家雀……等。可见，清宫鹰鹞处喂养猛禽食物之精之奢侈了。

虽然，从史书记载清代宫廷鹰鹞事例较详，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明代宫廷的实际作用。因为，顺治初年即设立了鹰坊，它必是接管了明宫留下来的遗产，

而且从宫廷典章制度上来看，许多规定都是清沿袭明制的一些作法，这是不容置疑的。

宫廷驯养鹰鹞的方法特点

据明·谢肇淛《五杂俎》一书中，即说明在明代宫廷“禁苑中，四方鸟兽毕备，其不可驯也，盛以樊笼。有鸷鸟高六七尺，诸禽兽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看来，明代皇帝也是颇喜驯养鹰鹞的。

明代鹰鹞主要产于辽东一带，其驯养鹰鹞有一套操作方法，在《五杂俎》中有一段颇为精彩的描述：

> 教鹰者，先缝其两目，仍布囊头，闭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颠扑不肯立，久而困惫，始集臂上。度其馁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饱。又数十日，眼睁开，始联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扑如初。又惫而驯，乃以人臂之。如是者约四十九日乃开户，纵之高飞。半晌，群鸟皆伏，无所得食，方以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没草间，鹰见即奋攫之，遂徐收其绦焉。习之既久，然后出猎，擒纵无不如意矣。

清沿袭明驯养鹰鹞方法，乃至清朝晚期是“驯鹰”、“玩鹰”的最盛时期。

对鹰鹞的训练与掌握鹰的生活习性，在清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也有一定的反映。

如《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七《鹰》诗云：

鸷鸟鸟中杰，羽翰利且便。
其在山林中，食肉而饮泉。
飞止任厥性，击搏无留难。
一朝落羁韝，人乃司柄权。
养翎须以时，食饮毋或愆。
精锐乃奋厉，矫翼云霄竖。
如鹏飞北溟，万里扶摇宽。
鹰师苟非良，饲养失其天。
饥乏片肉餐，困惫臂右肩。
掺纵复失术，弱翅凌风旋。
小雀不能获，何况雉兔焉。
谓之无良鹰，是语岂其然。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十六《鹰》诗云：

白露为霜秋气冷，苍鹰祭鸟双眸炯。
锦韝玉络忽在臂，回思故处失林岭。
饥饱由人不由己，目穷碧落常怀骋。
鹰师养鹰识鹰性，惟以饮食司其柄。
不使过饱力有馀，翁云一去无回影。

过饥复难任击搏，追逐雉兔弗鸷猛。
发纵指使固如是，为丛驱爵尤堪省。

据《沧州近诗》云：康熙朝李牟山入值，见午门（紫禁城皇宫南门——笔者注）内调鹰。由于清代皇家对鹰鹞的喜爱和重视，所以王公贵族、八旗子弟也都效仿，以鹰鹞为戏。

“鹰师”们驯鹰除了采用明朝沿袭下来的训练方法外，还努力创新了一些其它方法。诸如驯鹰的第一步是“熬鹰”、行话叫“上宿”，要熬它的野性子就不准它睡觉。因为，鹰白天从不睡，但到晚上才能安睡；晚上熬鹰也不会乱飞。当然，这样人也不能睡眠，昼夜看守。

所以，驯一只鹰最好有三人，一人承担前夜，一人负责后夜，一人为白班。在宫廷里，驯鹰任务自然由清宫总管内务府养鹰鹞处来具体负责饲养和训练了。

此外，驯者对鹰要禁食，仅喂其白菜水。而且，还要带鹰到人比较多的热闹的地方去，使它连闭眼睛的时间都没有。

乾隆皇帝对宫廷驯鹰者即“鹰师”十分了解，特意吟有《饲鹰》诗一首，收录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三集》卷五二中，其诗云：

饲鹰良有法，饥饱贵得宜。
饱则远扬去，饥则力难支。
今之饲养人，弗令饱令饥。
固无愁逸飏，在臂翼已垂。
纵之使撮雉，神惢艰迅飞。
猛气徒怀嗟，雄技安能施。
以是为得计，孰弗可鹰师。
如皋非所论，但幸隼在羁。
食不尽其材，所以昌黎悲。

当宫廷鹰鹞经过“鹰师”严格的驯化后，就要随着清帝巡幸塞北木兰围场等地，以及其它御苑行围射猎了。届时，皇帝亲自放鹰即成了行围射猎的一个主要的项目了。

宫廷“以鹰为戏”的表演特点

在一些题咏诗词歌赋、绘画书法中，以鹰为题材，更是历代文人墨客不可或缺、挥笔着墨描述的专门对象，如李白、高适、司马光、苏轼、沈括等荟萃名家都有所涉及。

如杜甫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其诗云：

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柳宗元则描绘了鹰的敏捷：

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耿炜则高歌了鹰的凌空搏风和壮志云霄的雄姿：

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

王摩诘《观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章考标有诗赞鹰曰：

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

金人赵秉文曾作《海青赋》云：

俊气横鹜，英姿杰力。顶摩穹苍，翼迅东极。铁勾利嘴，霜排劲翮。

明代僧梵琦也有赞誉海东青“玉爪金眸铁作翎，……奔云突雾入紫霄”之佳句。

清周士彪等辑《类珠·飞禽部·鹰》卷二七，云：

鹰乃钟山鸷鸟，为摇光星之所散（天文志曰：摇光散为鹰），为鹞之兄。故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名（少年李亭以此名鹰）。申王锡以决云（高丽赤鹰名），尔齐后名为凌霄（后鹰之名）。君猛气横飞，雄姿逸发，毋论仲春之鹰化为鸠，仲秋

之鸠化为鹰，相互变幻，惟即其祭鸟林中（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其智足取击鹏（楚王好猎，有人献鹰，上击鹏，鸿羽如雪，血如雨），天际其勇，足美不大异群鸟者乎。且鹰鹯之逐鸟雀也（臧文仲教行父曰：见无礼者诛之，见不仁者逐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言其威则尚父之鹰扬也（尚父时为鹰扬）。言其劲则至都之苍鹰也（都为中尉，不避权势，故云）。言其厉则崔洪之北为鹰也（洪为尚书清厉之语之）。然则爽鸠（爽鸠鹰也）司寇古之纪官，良有以夫饥则为用（操曰：待吕布如养饥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猜防既则于曹，瞒饱则高飏引喻（翼谓苻坚曰：慕容垂饥则附人，饱则高飏，维急羁绊，坚不从）。又闻于权翼是鹰可爱也，未可养也。乃刘表上呼：鹰之台歌鹰来之，曲何如太宗断联而放（唐太宗即位，苑中鹰悉断联放之），和熹降诏不用也（东汉和熹皇后临朝，鹰犬悉诏卖之）。耶其必如安重诲却白鹰之进（重诲为枢密夏州李仁福进白鹰，却之），李大亮之不献名鹰（亮为源州

都□台使讽献亮审奏之)，庶几人臣之标的欤？噫！鹰眼未化（虽化为鸠，识者犹憎恨其眼)，司令者不能不为之虑焉，安能致得霜之鹰而为用也（苏味道如九月得霜鹰)。

清人周士彪将鹰的生长、习性、性格等，描绘的惟妙惟肖，读之令人深省，感叹不已。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二集》卷六六《咏白鹰》诗云：

科尔沁达尔汉亲王荣旺诺尔布所进命郎世宁图之并成是诗。

苍固其恒耳，素诚罕遇之。
底须悲易染，真可用为仪。
祥拟葛家语，灵方班民诗。
亦当想凌厉，其余绊环羁。

除了古人以诗文赞美雄鹰外，历代宫廷画家的绘鹰图，更是至为珍贵了。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着明代画家林良绘《双鹰图》；清代画家郎世宁（意大利人）绘《松鹰图》、《嵩献英芝图》，气势磅礴，令人不禁想起晋人傅玄曾之赞美雄鹰的佳句：

嘴利吴戟，目颖星明，雄资邈世，逸气横生。

郎世宁，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

生，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卒。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年轻时习画。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来华传教。雍正时供奉内廷。乾隆年间绘制大量绘画作品，以西法为主，画风细腻，注重立体感的表现，其所绘的人物、花鸟、走兽、山水都极为精致，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郎世宁死后，乾隆皇帝赐侍卫郎衔，葬在北京阜城门外外国传教士墓地。

另外，在史籍图书中，更是留下了鹰的雄姿，从《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到《毛诗》、《左传》、《禽经》、《汉书》；从《酉阳杂俎》、《续博物志》，到《三才图会》、《本草纲目》等，也都为后人留下了鹰的矫健身影。

清代皇朝在宫廷内驯养鹰鹞，则完全是为供奉皇帝围猎之用。清帝历来十分重视射猎习武，这也是老祖宗企望一代一代盛传下去的无往不胜的传家宝。特别是康乾时代，这种“骑射习武”之风最盛，“木兰秋狝”则是一例。

每年秋季，清代皇帝都要带领王公大臣、侍卫随从等射猎队伍，浩浩荡荡地到南苑、西苑和北苑巡幸和行围射猎。此时，清宫总管内务府所管理驯养的鹰鹞处的统领、头领带着驯鹰能手，披弓

架鹰，牵狗相随，其壮势威风凛凛又盛气凌人。

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乐善堂全集》卷二七《鹰博兔》中云：

风吹衰草寒飕飗，苍鹰在臂凝霜眸。
瞥然狡兔走平畴，三窟已失空含愁。
高盘云翮孤星流，厉爪下击势更遒。
怒气一奋谁能收，嗟彼韩卢有枝徒。
呜呼汝鹰性匪柔，却邀富室千金求。
古来英鸷半埋没，凡雀嘈沓何其稠。

乾隆皇帝咏《鹰博兔》，可见是有其亲身感受的，那种壮烈的情景，在诗中尽情地抒发，令人感叹不已。

在塞北“木兰秋狝”或上述行围射猎完毕后，乾隆皇帝要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收拢人心的怀柔庆功筵宴，席间除歌功颂德、歌舞升平外，在宴会上还要经常演奏一曲《飞燕捉天鹅》，令参加筵宴的满、汉、蒙、藏等王公贵族们大开眼界，心悦诚服，从而更增添了宴会的欢乐气氛。

所谓“飞燕捉天鹅”，就是用驯养的“海东青”等鹰鹞去捕捉天上的飞鸽。

当清宫鸽子房的太监，将饲养的鸽子放飞起来后，鹰房的太监再将训练的鹰鹞也跟着飞起，它比鸽子飞得较低，

并在鸽子底下打旋，鸽子怕它，于是往高处飞，而鹰鹞一旋一旋地往上飞，鸽子被逼的也只好更往上飞旋，待飞到高空时，鸽子已经毫无搏击力量了。

此时，鹰鹞却振翅高飞，凝翔云霄，以它锐利的尖爪，直冲向飘摇的鸽子。只见鸽子已逃无路，飞无劲，被鹰鹞旋逗后，那一点点白团的鸽子，顿时化作羽落如雪，血落如雨。鸽子已成了鹰鹞的美中餐了。

“飞燕捉天鹅”即“以鹰为戏”的宫廷表演，将乾隆皇帝举行的筵宴推入高潮，只见霎时高空“天女散花”之时，地上王公贵族等众臣更是欢呼成一片。

宫廷御茶特点与茶宴吟诗赏析

乾隆皇帝潜邸重华宫

在紫禁城皇宫内廷西二长街北过百子门，其斜对门处即为重华门，门内是崇敬殿，殿内匾曰："乐善堂"。居中的宫殿名为重华宫，中设宝座。宫东庑为葆中殿，殿内匾曰"古香斋"，西庑为浴德殿，殿内匾曰"抑斋"，宫后为翠云馆，宫东临漱芳斋及其戏台。

重华宫明代乾西五所之二所。清乾隆皇帝登极后升为宫。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重华门嘉庆七年修。

清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一四《重华宫记》中，记述其宫殿之制云：

> 乾清、坤宁为紫微正中，左右各二永巷，每一巷依次列三宫，斯为十二宫。其后，东西以次各列五所，重华宫则昔之西二所也。

雍正年间，予蒙赐居于此。即位后，应升为宫。彼时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拟以重华宫为额，虽颂之意耶，而规即在此，是以俞而称之……。

“重华”是虞舜名。虞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帝王。正如《舜典》孔颖达疏：

此舜能继尧，重其文德之光华，用此德合于帝尧，与尧俱圣明也。

当时，清代翰林院的大学士们拟重华宫名的苦心，将乾隆皇帝喻为虞舜，颂扬其有舜之德，是当之无愧的皇帝，同时又赞美了当年的太平盛世。

乾隆丁巳新正《重华宫》诗注：

重华宫旧为西二所。雍正五年(1727年)，予十七岁成婚，赐居于此。至今已七十一年矣。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时谕旨：

重华宫为朕藩邸时旧居，朕颇加修葺，增设观剧之所，以为新年宴赉廷臣、赋诗联句、蒙古回部番众赐宴之地。来年归政后，朕为太上皇帝，率同嗣皇帝于此胪欢展庆，太上皇帝于正殿设座，嗣皇帝于配殿设座。

这样，每岁新正，皇太后都临重华宫家宴，乾隆皇帝屡有诗纪重华宫侍皇太后宴膳，如《侍宴》御制诗中有“六十开三子皇帝，八旬有二母东朝”之句。

除此之外，乾隆甲辰立春日，重华宫曲宴宗亲近臣，并命观灯火。

清嘉庆皇帝在御制《毓庆宫联句》诗注中云：

> 重华宫为皇考跃龙潜邸，每岁新韶庆节，赐宴拈吟，数十年悉于此宫举行盛轨，予每事遵循前典，故撰吉于岁首十有二日，命题布席，踵举上仪。

在乾隆朝时，皇极殿千叟宴后，在重华宫设茶宴，乾隆皇帝赋诗，嘉庆皇帝和云：

> 东壁扶筇列皇极，西清布席侍重华。

重华宫茶宴吟诗欣赏

清代紫禁城皇宫内廷，皇帝召集诸王公大臣作诗联句形式始于康熙朝。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正月十四日以海宇荡平，兵革偃息，大宴百官于乾清宫。康熙皇帝兴奋之余，仿汉武帝在柏梁台与诸臣作诗联句，共赋七言诗，

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世称之为柏梁体诗。当时赋诗共九十三人。

后，雍正皇帝也曾命王公大臣及内廷词臣集乾清宫赋柏梁体诗。

乾隆皇帝将宫中联句视为后世必遵之法。他在《高宗御制诗余集》卷一《嘉庆元年新正千叟宴毕仍茶宴廷臣于重华宫得诗二首》诗注道：

> 是以新正仍于此庆岁，命子皇帝及廷臣等依例茶宴联句，预顾而乐之，亦文筵所罕觏，将来世世子孙，即当遵为家法。新正撰吉于此，授简赓吟，万年长如今日，岂非西清佳话，我国家吉祥盛事也。

清代乾隆皇帝每年正月初二至十六日，要到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吟诗酬唱一番。

清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一四《重华宫记》中云：

> ……四十八年以来，元旦、除夕，无不于此少坐，新政与诸臣茶宴联句，率为例典。异日归政或时一来临，更成佳话……

乾隆年中，元旦后三日，召集王大臣中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戏赐茶，仿柏梁体联句，以纪其盛。

是日，乾隆皇帝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并且每岁正月吉日，乾隆皇帝在重华宫钦点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文臣学士能诗者入宴，与宴十八人，寓唐太宗“十八学士登瀛洲”之意；后，又增至地二十八人，喻合二十八星宿之数。

清人沈初《西清笔记》云：

> 新正重华宫联句，先期南书房进绿头签，上列诸臣衔名，军机大臣为一束，南书房为一束，外廷大学士、尚书、左督御史、侍郎为一束，上命纂四库全书时在馆总纂总校诸臣为一束，俟上择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奉特派在名签外者。

茶宴联句的内容，乾隆皇帝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曾命题谕旨：

> 取政治典章之大者为题。

当然，茶宴联句中除政治典章内容外，还有以岁朝图、爆竹、书福、元宵、西山积雪、咏雪、雪象、雪狮、冰灯、冰床、冰嬉、春胜、燕九、玉盘、玉盂、咏玉瓮、祈谷礼成即事、题程棨耕织图、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五经萃室、快雪堂帖、天禄琳琅、用淳化阁法帖颁赐群臣事、开国方略集成、职官表、七

十二候、五福五代堂、洪范九五福之一曰寿、洪范九五福之二曰富、洪范九五福之三曰康宁、洪范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八徵耄念之宝、三清茶、三清茶联句、重华宫茶宴、赐宴、千叟宴等联句内容命题，以此也深刻地反映出清代宫廷习俗和欢度佳节之情景。

据《养吉斋丛录》载，清乾隆皇帝在皇宫内廷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的活动达四十余次之多。届时召集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在重华宫一是赋诗，二是饮茶。一般茶宴者仅十八（有多有少），分排而坐，每人作诗四句。

为了增加悬念，烘托氛围，以此达到情趣盎然，事先并不告示赴宴者咏诗内容，这无疑地增加了这些王公大臣，特别是一些御用词臣抒发情感的难度，从而也能使皇帝考察这些人的真才实学。当然，这样即兴创作的茶宴诗句，不会产生很高的文学造诣，自然也都是些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

一般"御定元韵"是由皇帝起头点诗题，后再由皇亲国戚、王公大臣附庸风雅，达到绵绵韵味无穷无尽之目的。

笔者仅将其中一首乾隆御制诗与臣

工茶宴联句内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同时使读者对其清宫茶宴联句吟诗的形式与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中也可感受到新年正月时节，宫廷所独特具有的茗品飘香的喜气佳节氛围。

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二九《丙寅正月十日召诸王臣工集重华宫联句》诗云：

御制：

韶年和乐会周亲，丽藻同赓翰墨臣，

宴借传柑先令节。

臣允禄：

俗沿桃菜协良辰，矞云已报三阶泰。

洲序初呈九陌春，爆竹声多催腊尽。

臣允陶：

梅花香发竟时新，普天共仰升平庆。

率土咸霑化育仁，击壤尧街民气豫。

御制：

纽芽禹甸情闾，匪今稔岁祥为大。

自古天伦乐是真，回忆文筵歌撇荔①。

①重华宫予旧居也，尝与吾弟和亲王岁时宴会于此。

臣弘书：

久铭帝德杰雕珉，九重瑞霭舒佳景。

六出琼葩应大钧，丝管清音天上至。

臣弘瞻：

琅玕古色座中陈，曈昽旭日临青琐。

缭绕祥云护紫宸，一德景行先圣业。

御制：

同堂嘉叙古风淳，欣开锦席酬三叔①。

尚记仙诗和四宾②，铺首宜春书吉字。

①是日与宴者庄亲王、履亲王、慎郡王，皆朕叔辈。

②旧尝与慎郡王倡和用宾字韵四首。

臣允禧：

地衣送暖袭华裀，屏开骞影辉丹宇。

砌转鳌峰映碧岣，列坐承恩齐搦管。

臣福彭：

分行肃侍俨垂绅，光生几研分题偏。

乡遏韶钧得句频，银汉分支涵雨露。

御制：

猊烟结篆引璘彬，礼陶乐淋私须克。

孔思周情道在纯，何必联吟夸有过。

臣永璜：

也知群擢愿希荀，九华枝外依山岛。

五色云中仰圣人，骀荡风微腾紫盖。

臣张廷玉：

慈宁福厚锡苍旻，喜瞻陇大麦千畴。

润恰数阶蓂叶匀，鱼藻载歌恩似海。

臣高斌：

龙纹健举笔如神，拜扬顿觉诗怀畅。

衎乐过于洒味醇，乳波广沾仙掌露。

臣梁诗正：

雕盘屡给大官珍，宝幡巧剪悬双胜。

脆缕纷堆荐五辛，渐转晴晖迟蔼蔼。

御制：

微生阳气始殢殢，已教彩燕翔珠箔。

未许青牛迓绮闉，歌继柏梁宗异并。

臣汪士敦：

人来楞诣燕游申，爻占云陆鸿仪渐。

风咏周南麟趾振，湑露早叨陪上日。

臣蒋溥：

需云又庆值初旬，铿訇仙籁闻锵佩。

伏渥宫壶捧锡银，祥启重华光纨缦。

臣张若霭：

班随群列礼遵循，瑞云乐奏声盈耳。

坚齿香浮醴入脣，十八数符瀛苑侣。

臣雷鋐：

大千界乐化台民，辑圭剑履通重译。

献尽梯航到八闽，遍覆宸区唯岂弟。

御制：

迪知宅俊在忱恂，芬馨馔玉颁缃核。

嫩绎扨金叶磬均，豔羡唐花哑羯鼓。

臣嵇璜：

风回文治戚鱼鳞，丁冬莲漏来西极。

错落珠灯缀大秦，近傍御床邀异数。

臣裘日休：

重扬天藻续前因，探源远溯龙门浪。

觅韵难披鸟道榛，殿是集贤传雅事。

臣介福：

职司替笔步芳尘，诏宽礼数天拘束。

喜溢天颜展笑频，喜会恰逢几暇顷。

臣张泰开：

宠光兼被岁寒身，暖随东陆符星指。

霁豁西山带雪皴，敢拟欢娱同宴镐。

御制：

为酬勤动想吹幽，庭罗宝树霞千叠。

诗擘瑶牋韵几巡，计日夜珠刚就满，

笑看瑞叶尚余津。

乾隆皇帝有时在召集文臣学士茶宴联句后，待阁僚散尽，还余兴未尽时，又作诗数首，以宣泄心中兴奋之欢娱。

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二九《春正与诸王及内廷大学士翰林等小宴重华宫联句是日复得诗三首》诗云：

其一首：

兰殿辛盘迓早春，展亲更复洽臣邻。

从来盛事成佳话①，况是宗藩与吉人。

金荔色酣朱乍点，玉梅香度粉初皴。

说之灯夕诗如绘，花萼楼前雨露新。

①数年以来，新正几暇辄与内廷诸臣联句宴会，与此率成故事。

其二首：

报道东来风是条，鸿龙运斗已旋杓。
柍栿焕彩春方丽，鸩鹊堆银雪未消。
五色书云光灿烂，双葩结焰影招摇。
庆霄半壁悬西宇，景物迎人正复饶。

其三首：

初韶应律正光昌，亶矣春和聚一堂。
般鼎调梅惟传相，汉台赓句有梁王。
乐调太簇鸣虞磬，节煮浮圆胜楚馆。
同任股肱民社寄，勖哉无或负明良。

这类乾隆皇帝与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举行的茶宴联句诗，及他余兴未尽又极力地抒发内心感受的诗，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集中刊载不少。这种边饮啜馨茶茗品，边吟诗吟唱，附庸风雅，颇有些古韵意味，绵绵深长之意。

御茶库膳房与宫廷贡茶特点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清袭明制，宫中膳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总管内务府，其属下的“御茶膳房”、“御茶房”、“茶房”、“外茶房”和“茶库”，即是专门管理宫廷膳食的机构。

据清代《内务府册》档案记载：御茶膳房在中和殿东围房内。乾隆十三年(1748 年)，以箭亭东外库改为御茶膳房，门东向，门内迤北，东西黄琉璃瓦

房八楹，西南黄琉璃瓦房十二楹，又南北瓦房九楹。

清宫御茶房在内廷乾清宫东庑，内臣直庐三楹，康熙皇帝御笔匾曰："御茶房"。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御茶膳房》记载：除了供皇帝的御茶房外，还有皇后茶房、寿康宫皇太后茶房。皇子、皇孙娶福晋后，亦有茶房，所用分例、银器、铜锡器皿，封王出府，例得带往。至茶房管理总大臣无定额，特旨简派。乾隆四十七年奉旨：著将内右门内所有外茶房即行挪出。当日，外茶房归并于景运门外外茶房（即箭亭东之御茶膳房——笔者注）办造。

另外，乾隆朝规定，每届十年，钦派王大臣等，将清茶房、茶房等处，以及皇帝、皇后等用过金银器皿，进行查验数目，将不堪应用者，奏明交广储司银库，依原式打造。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初"御茶膳房"编制：设有茶房、清茶房和膳房等。茶房设总领三名、承应长四名、承应人三十六名、茶房人十七名；清茶房另设承应长四名、承应人十六名和茶役八名；膳房亦设总领三名，下设饭房人三十五名、承应长二名、承应人

十五名、庖长三名和庖人二十名。后世各朝，茶房、清茶房、膳房人数均为有增减，并陆续增设章京、笔帖式和主事等官职，均无定额规定。

雍正元年（1723 年），雍正皇帝特简管理事务大臣（无定额）总管御茶膳房事务。茶膳房总领奉旨授为二等侍卫（武职正品），在茶房人内另授三名三等侍卫（武职正五品）、四名蓝翎侍卫（武职正六品）。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谕旨：膳房总领改为尚膳正和尚膳副，茶房总领改为尚茶正和尚茶副。后又规定，其中尚茶正额定二名，以二等侍卫充任、尚茶副一名，以三等侍卫充任，下设尚茶六名，其中两名授三等侍卫、四名授蓝翎侍卫，再下设领班顶戴拜唐阿四名、拜唐阿二十三名、承应长四名、承应人七十一名。清茶房另设承应长四名、承应人十六名。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十二月，《国朝宫史》一书修成，在“宫制”“御茶房”职掌规定：七品执守侍首领三名，八品侍监首领四名，太监四十五名。专司上用茗饮果品；随侍承应各处供奉及节令宴席等事。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御茶膳房增设档案房，设主事、委署主事各一名，每人各领披甲苏拉五名，管理各项档案事宜，后又增设笔帖式十一名，掌给使令。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寿康宫又添设茶膳房。茶房设三等侍卫总领一名、蓝翎侍卫副总领一名，下设笔帖式一名、拜唐阿十一名、承应长二名、承应人十四名。清茶房另设承应长二名、承应人十二名、茶役四名。

总管内务府所属机构广储司，专门设置有御茶库房，其库房在"太和门内迤西偏南向配房"，内库之一，专司收贮各省各地的贡茶。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乾隆朝至嘉庆朝清宫《茶叶贡单》、《宫中进单》、《宫中杂件》、《茶叶库存清单》和《各省进贡茶叶账》记载，中国的茶叶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以及黄河沿岸等省，共计有十四个省贡茶，累计达至近八十个品茗。

清朝进贡宫廷茶叶的各省：

广东省、广西省、浙江省、江苏省、云南省、贵州省、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山东

省、陕西省等。

笔者曾在故宫博物院专门保管过宫廷帝后的生活文物即“御用茶”库房，所以十分了解皇宫所遗存下来的各种名茶品茗。

这些由各地贡进宫廷的御茶分别为：

乌龙茶、金兰茶、通山茶、三味茶、蕊茶、鹤茶、八仙茶、茶膏、吉利茶、莲心茶、莲心花茶、莲心尖茶、名山茶、青城芽茶、午时茶、梅片贡茶、茗种芽茶、岩顶花香茶、小种花香茶、龙井茶、龙井芽茶、芽茶、阳羡茶、安远茶、银针茶、菱角湾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内素茶、贵定芽茶、茶砖、方茶砖、长方砖茶、永字茶砖、邛州茶砖、小阴纹茶、珠兰茶、小凸花茶、功夫花茶、灵山茗茶、灌县细茶、陈蒙茶、最大型普洱茶团、次大型普洱茶团、中型普洱茶团、次中型普洱茶团、小型普洱茶团、树型普洱茶、普洱方茶饼、普洱茶圆饼、碎普洱茶膏等。

除此之外，还有属于起身体保健作用的配之药材类御用茶：珠兰茶、儿茶、苦丁茶、山药茶、仙药茶等。

以上所涉及的茶叶，均是由清宫遗存下来的现仍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库房

内。当然，清代宫廷茶叶若在乾隆朝鼎盛时期，绝不会仅仅止于此。而且，这些保存下来的茶叶，基本上又可以和那时的清代宫廷档案记载相互印证。

这无疑对于研究清代封建社会茶叶经济发展、生长演变过程，以及清代宫廷帝王后妃使用茶叶，皇朝宫廷与地方官衙之间相互关系等等，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物保证和研究基础，若再努力结合历史时代的文献史料，就自然能得出一个十分中肯的研究答案和成果来。

乾隆朝时，地方各省纷纷照例贡进方物，仅茶叶一类，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档案记载：

两江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银针茶、梅片茶各十瓶，珠兰茶九桶。

闽浙总督进莲心茶四箱，花香茶五箱，郑宅芽茶、片茶各一箱。

云贵总督进普洱大茶、中茶各一百圆，普洱小茶四百圆，普洱女茶、蕊茶各一千圆，普洱芽茶、蕊茶各一百瓶，普洱茶膏一百匣。

四川总督进仙茶、陪茶、菱角湾茶各二银瓶，观音茶二次二十七银瓶，春茗茶二次十八银瓶，名山茶十八瓶，青

城芽茶一百瓶，砖茶五百块，锅焙茶十八包。

陕甘总督进吉利茶二次十八瓶。

湖广总督进砖茶五箱。

漕运总督进龙井芽茶一百瓶。

河东河道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

江苏巡抚进阳羡芽茶、碧螺春茶各一百瓶。

安徽巡抚进银针茶、雀舌茶、梅片茶、珠兰茶、松萝茶各二次八箱，涂尖茶四箱。

江西巡抚进永新砖茶二箱，庐山茶四箱，安远茶三箱，岕茶四箱，储茶三箱。

浙江巡抚进龙井茶芽茶一百瓶，各种芽茶一百瓶，城头菊五箱。

福建巡抚进莲心茶址大瓶，花香茶十二大瓶，郑宅芽茶、片茶各六十小瓶。

湖南巡抚进安花芽茶一百瓶，界亭芽茶九十瓶，君山芽茶五十瓶，安花砖茶五匣。

湖北巡抚进通山茶五箱。

陕西巡抚吉利茶九瓶，安康芽茶一百瓶。

云南巡抚进普洱大茶、中茶各一百圆，普洱小茶二百圆，普洱女茶、蕊茶

各一千圆，普洱嫩蕊茶、芽茶各一百瓶，普洱茶膏一百匣。

贵州巡抚进五斤重普洱茶一百圆，四两重普洱茶一千圆，一两五钱重普洱茶二千圆，普洱芽茶、蕊茶各五十瓶，普洱茶膏一百匣，龙里、贵定芽茶各五十瓶，湄潭芽茶一百瓶。

根据清代档案和文献史料记载，乾隆朝总管内务府广储司茶库管理的茶叶，其中仅江南六安州霍山县，每年额定交宫廷的六安茶叶就有四百袋（每袋一斤十二两，均按十六两一斤计算，下同），由光禄寺转送茶库；浙江省额定交宫廷的黄茶十八篓（每篓八百袋），由户部转送茶库。

乾隆朝时，云贵巡抚和总督，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普洱茶。据清代档案记载，每年进贡普洱大茶三百个、普洱中茶二百个、普洱小茶六百个、女儿茶三千个、心珠茶四千个、普洱茶膏三百匣，共计八千四百个。

然而，清光绪朝时云贵巡抚和总督进贡宫廷茶叶骤减，即使如此，仍然每年进贡普洱大茶二百二十个、普洱中茶二百二十个、普洱小茶二百个、女儿茶四百四十个、心珠茶八百四十个、普洱

心茶一百瓶、普洱芽茶一百瓶、普洱茶膏一百匣。共计二千二百四十个瓶(匣)。

据《续云南通志稿》记载：

二月间开采，芯极细而白，谓之毛尖，采而蒸之揉为茶饼。其叶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普洱茶包装的都十分完好，有的用竹叶、芭蕉叶来包装，扎结成直径十余公分，四五十公分长之筒状；比较大型的则是扎结成圆饼形状，然后专门放入彩绘金龙凤、如意朵云、回纹等纹饰的红漆大盒内。

从这些精美的包装，不难看出地方官衙，其忠孝之心，十分良苦。有意思的是，普洱茶膏的包装上，还附有保健功能的“说明书”，其云：

肚胀受寒时，用姜汤与茶膏同煮，饮使身体出汗，即愈。当口破舌，喉受热痛疼时，用五分茶膏，噙口过夜，即愈。当受暑擦破皮肤出血时，将茶膏研面敷患处，即愈。

另据清代《宫中杂件》档案记载，

光绪皇帝用普洱茶，每日用一两五钱，一年共用三十三斤十二两。一年用于漱口的专用普洱茶十一两。

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保存一些完好的清代宫廷茗茶，它们均由银桶、锡桶和玻璃瓶盛装。为显得进贡者的一片忠孝之心，外面还包裹上等丝黄绸缎，以示尊崇。

乾隆御制茗茶和“三清茶”特点

据《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记载，清代皇帝所饮用的水是北京西山的玉泉水，同时也用玉泉水泡茶。因为，玉泉山之水最轻清，向来尚膳、尚茶日取水于此，内管领司其事。不仅如此，“凡遇皇上巡幸所用玉泉水，奏请赍送分为四班，每班派官一员，咨取兵部马四匹驮水赍送”。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十月奉旨：

> 朕明春巡幸江浙，沿途所用清茶水，著将静明园泉水带往备用。至山东省，著该省巡抚，将珍珠泉水预备应用。至浙江省，著该省总督，仍将上次巡幸江浙之泉水预备

应用。钦此。

凡遇皇上、皇后行幸驮清茶水用马八匹，由堂咨行兵部领取，所用山东并浙江等省泉水，交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呈明移咨兵部，转咨各该省督抚预备。

看来，清代皇帝无论在京城皇宫，还是在巡幸江浙等地，都是使用当地的有名的泉水来泡“清茶水”。乾隆皇帝为了检验泉水的纯净和质量，还对各地的泉水进行量化的比较，他在《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中云：

尝制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沙、虎邱、碧云寺各重玉泉一分。

乾隆皇帝通过对天下之泉的比较，认为京城的玉泉山水更好，为“天下第一泉”，所以“为宫中取用，民间不敢汲也”。

乾隆皇帝嗜茶如命，他曾毫不掩饰自己极爱好饮茶的习惯，承认“君不可一日无茶”。除了自己品茗贡茶外，他还

亲自御制茗茶、煎茶和烹茶。

据唐代以后，有两种煎茶、烹茶的方法：一种以陆羽《茶经》为代表，他是将茶末下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另一种以苏廙《十六汤品》为代表，他是将茶末撮入茶盏，然后用装着开水有嘴（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水；一面注水，一面用茶筅或茶匙在盏中环回击拂；其操作过程叫“点茶”。

这两种煎茶与烹茶方法，使古诗人留下了许多“气味清和”、“清香至味”的吟诗韵味：

李德裕《忆茗芽》：

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

元慎《一至七言诗》：

铫煎黄蕊色，椀转曲尘花。

苏轼《试院煎茶》：

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

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之七》：

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

清人周士彪《类珠·饮食部·茶》卷十五，云：

首请以茶论上世抔水饮汤，不知有茶也（古者汙樽而抔饮冬日饮汤）。茶类栀子（其叶类之），冬华

春叶（花生于冬），自陆羽著《茶经》制法始（陆鸿渐著《茶经》，粥茶者陶成羽形祀为茶神），善后人爰崇祀焉。迨社前火前（焚火之前）严其候而一旗一枪（茶一叶二枪也），相其生捋造之，所谓尽善也。爰稽其品，碧玉之乳（婺州出茶极甘芳，煎之如碧玉乳），瑞草之花魁（杜牧诗中实东南地茶称瑞草魁），雀舌芬芳（蜀州晋源洞口有黄芽雀舌鸟嘴麦颗皆茶上品），北苑含三月之雨龙茶，细滑上林占一叶之春，顾渚之紫笋也（北苑顾渚等皆产茶，地紫笋等皆茶上品）。蒙顶而有石花湖之含膏也。阳坡而有横纹团黄之仙掌也。雅川而有麦颗，且龙安之岭生骑火之芽（骑火谓清明前后骑禁火也），上清之峰衍雷鸣之摘（惊蛰雷鸣而摘），美不可数欤。故学士取雪水以烹（陶穀命党家姬雪水烹茶），山谷择甘露而煮，李约以缓火炙活水煎重之也。霜华露液（陆羽《茶经》云：烹之滚碧霜之华，啜之味甘露之液），陆子三篇，破闷通灵，庐仝七碗（仝茶歌七碗），绿尘素涛，希文八咏（范希文茶诗云：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数涛起），所以共著也。哉僧志崇以紫茸香供佛（觉林院僧收茶供佛，诗客自奉各异），以惊雷荚待客，而以萱草带自奉，固各有取意也。云：王蒙以茶饮人来水厄之讥（蒙嗜茶喜以饮人，人过之者今日有水厄），宣公受茶一串，辞五万之饷。张咏拔茶而树（咏令崇阳劝民，拔茶植桑，民初若之，及后榷茶，他县失业而桑已成），桑卒受其利，赵赞因茶而兴税，始开其源（德宗时，赞兴茶税，何易于曰：民非茶不可活，阁诏不行）。凤团贵品八饼（翰林每赐此茶颇有诗），可退夫睡魔（茶可不睡）。紫琳云腴九难（茶有九难），消夫脂泽（茶令人去脂），换仙子身骨疠窅（苦茶轻自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将茗瘕酪奴云乎哉（王尔公云：饮茗不堪与酪作奴）。

关于乾隆皇帝煎茶与烹茶，显然是袭古人饮茶之经验，如“故学士取雪水以烹”，特别是下文要谈及他所御制的“煎茶”、“烹茶”、“三清茶”等，再融入了自己饮茶的习惯与兴趣，达到一种自我陶醉欣赏的境地。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注

释“上每于荷花开时，取叶上露烹茶，有御制诗纪其事”。

在《清高宗（乾隆）乐善堂全集》卷二十《冬夜煎茶》中诗云：

清夜迢迢星耿耿，银檠明灭兰膏冷。
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建城杂进土贡茶，一一有味须自领。
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
葵花玉銙旧标名，接笋峰头发新颖。
灯前手擘小龙团，磊落更觉光炯炯。
水递无劳待六一，汲取堦前清渫井。
阿僮火候不深谙，自焚竹枝烹石鼎。
蟹眼鱼眼次第过，松风欲作还有顷。
定州花瓷浸芳绿，细啜漫饮心自省。
清香至味本天然，咀嚼口甘趣逾永。
坡翁品题七字工，汲黯少戆宽饶猛。
饮罢长歌逸兴豪，举首窗前月移影。

看来，乾隆皇帝亲自御制煎茶，也许这样才能喝出味道来。这种文人墨客高雅情趣的闲情逸致，以及抒发诗与灵感的雅士之风，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物珍品中也得到了许多印证。

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紫檀木雕花竹茶赢，即是一种用于盛装成套茶具的匣盒式器物。此茶赢以紫檀木制成，细竹皮镶边，上安铜提手；内分四层，有的挖

有圆孔，可放茶叶罐、茶盘、茶碗等。主要适于旅途中小憩之用，既小巧玲珑又便于携带。

另外，乾隆朝制作的茶壶、茶碗、茶盘等茶具，更是精美绝伦，并在瓷面上镌刻皇帝御制诗，这些御制诗可在乾隆御制诗集中见到，读来颇有韵味。人们既鉴赏了文物，又可通过诗集证实诗是何时何年制作的。

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款粉彩描金开光人物烹茶御制诗茶壶，此壶一面绘有雨中烹茶图，描绘溪水、小桥、书童、渔翁、蕉石等；壶另一面饰御制诗《雨中烹茶泛卧游书室有作》，而这首诗又刊载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九中，诗云：

溪烟山雨相空濛，生衣独坐杨柳风。
竹炉茗椀泛清濑，米家书画将无同。
松风泻处生鱼眼，中冷三峡何需辨。
清香仙露沁诗脾，座间不觉芳隄转。

通过茶壶与诗作的相互印证，由此论定，这把茶壶是乾隆七年（1742 年）制作的。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款油红荷花御制长方盘、盖碗，其两件珍品即长方盘盘面和盖碗的碗盖上，分别饰油红彩乾隆御

制诗《荷露烹茶一律》；而在盖碗腹部油红彩书乾隆御制诗《荷露烹茶一律》。

虽然，御制诗题目均同，但乾隆皇帝写御制诗的年代却不同；而且，印制在御制诗集上的题为《荷露烹茶》，没有长方盘和盖碗上印制的“一律”二字。

在乾隆款油红荷花御制长方盘、盖碗上的御制诗，来自于《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二集》卷八十八《荷露烹茶》诗云：

秋荷叶上露珠流，柄柄倾来盎珠收。
白帝精灵青女气，惠山竹鼎越窑瓯。
学仙笑彼金盘妄，宜咏欣兹玉乳浮。
李相若曾经识此，底须置驿远驰求。

在乾隆款油红荷花御制盖碗腹部上的御制诗，来自《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三集》卷四十《荷露烹茶》诗云：

荷叶擎将沆瀣稠，天然清韵称茶瓯。
胜泉且待持符调，似雪无劳拥帚收。
气辨浮沉原有自，火详文武恰相投。
灶边若供陆鸿渐，欲问曾经一品了。

乾隆皇帝这两首同名不同年所作的御制诗，分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和二十九年（1764 年）的作品。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乾隆款青花御制诗碗，其底部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在碗的外壁腹部饰乾隆御制诗一首。这首诗同

样被收入《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三《烹雨前茶有作》，其诗云：

新茗浙西贡，筠垆烹试尝。
那因论火候，足以识春光。
芽趱雨前度，梅依雪后香。
可怜聂诗外，增一视民伤。

乾隆皇帝将烹茶或茶茗的御制诗，烧制在瓷器、紫砂、雕漆、珐琅等茶具上，并非偶然。一是附庸风雅，品茗作诗，尽情抒发文人墨客的古之幽情；二是专门侍用在为每年都要召集文臣学士的茶宴联句席上。

乾隆皇帝将茶宴联句地址选在了重华宫，而且，他也不同于康熙、雍正皇帝设酒宴诸臣于乾清宫，而是别出心裁，不设酒馔，以自己配制的“三清茶”款待，并布果饤盒为席。

据清代《御茶膳房行文底档》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正月八日，总管桂元传旨：

叫汉大人进重华宫作诗，茶膳房伺候果盒；汉大人等用鼓盒果盒每付用白面一斤八两，青豆面、芝麻、高粱米面各四两，白糖八两，香油五两。

御茶膳房用以上原料制成糖饽饽点

心，放入精美的果盒内。待宴毕后，皇帝将果盒赏赐赴宴文臣。

届时，入宴文臣学士与皇帝边品茗边赋诗，吟咏联句，馨香满庭，造成胜有“重华文宴集群仙”之飘渺雅境。

乾隆皇帝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三集》卷七十《重华宫集臣及内廷翰林等三清茶联句复得诗二首》中诗云：

其一首：

外藩华宴紫光回，堂陛重宣翰席开。
讵是言欢太频数，适因馀暇共追陪。
略存禁体倡生面，弗许雕文聘颂才。
雪护麦田茶泛露，揆戕得句自蠲埃。

其二首：

活水还胜活火烹，三清瓯满啜三清①。
爰聊翰苑更新作，所喜朝廷多老成②。
雪象欲融金戺泽，曦乌向暖玉楼晴。
应怡情处偏萦念，渴望滇南报捷旗。

①向以三清名茶，因制瓷瓯书咏其上，每于雪后烹茶用之。

②时预备之大学士尹继善、刘统勲、陈宏谋，尚书董邦达，左都御史张泰开，闽浙总督苏昌，皆年逾七十而未预之。尚书陆宗楷、杨廷璋，讬庸亦皆年逾七十或至八十。

乾隆皇帝御制诗中的“活水还胜活

火烹，三清瓯满啜三清”，实际上在宴请外藩茶宴中，还寓有其中的政治含意。

对于乾隆皇帝标榜过的“三清茶”，他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三六《三清茶》诗中注释：“以雪水沃梅、松实、佛手啜之名曰‘三清’”，其吟诗赞美云：

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
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
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
火候辨鱼蟹，鼎烟迭生灭。
越瓯泼仙乳，毡卢适禅悦。
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
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
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
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
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
软饱趁几馀，敲吟兴无竭。

松实，即松果中的籽肉，可以命太监从御苑中之百年古老松树上采集；梅花即是腊梅，据北京气候恰在新年正月里含苞欲放，可由奉宸苑职掌花圃供奉；佛手，果实鲜黄色，香气浓郁，有理气和胃之功效，为广东南方一带及藩国进贡宫廷礼品。

因此，乾隆皇帝对自己亲手御制的

"三清茶"颇为满意，曾在和文臣学士的《三清茶联句》御制诗中云：

高节为邻德表贞，喉齿香生嚼松实，
心神春满泛梅英，拈花总在兜罗手①。

①以松实、梅英、佛手三种烹茶，故谓之"三清"。

乾隆皇帝不但在御制诗中多次吟有以"三清茶"为内容的御制诗，而且为使御制的"三清茶"，达到色、香、味、形俱佳的效果，特旨命清宫总管内务府要选择御苑内纯净晶莹的白雪，然后融于茶瓷瓯内，放在竹茶炉上烹茶。

如今，故宫博物院仍珍藏一只方不过盈尺，高仅四寸，圆上方下，陶泥为膛，周实以土，编篾作围，工精料贵又古朴素雅的竹茶炉。

这只竹茶炉，据说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在无锡惠山听松庵见到明代僧人性海所制竹茶炉，又听性海拾松实堕枝和取惠山"天下第二泉"水，烹茶啜茗的逸闻逸事后，即旨命宫中内务府造办处工匠仿制了两只竹茶炉，然后分别置放于皇宫内廷和河北蓟县盘山行宫内，并仿前人为其御题"竹茶炉"咏。

《清仁宗（嘉庆）味馀书室全集定本》卷十九，《古今体诗一百二十二首·

恭和御制竹炉山房元韵》诗云：

灵源福地孕名泉，试品三清活火煎。
雪蕊满林香满院，风光不数惠山前。
…………

也许，乾隆、嘉庆皇帝与文臣学士聚集重华宫御制各种清茶，以及“三清茶”等茶宴联句吟诗时，即是用这只清宫内廷制作所用的竹茶炉烹茶吧。

为了纪念“三清茶”的御制成功，乾隆皇帝还特旨意制作了乾隆款红彩御制诗三清碗，此碗为乾隆御用茶具，胎体轻薄，釉面莹润，色泽纯正。碗内绘有松、梅、佛手图案；碗外腹壁印制乾隆御制诗“三清茶”。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剔红乾隆御制“三清茶”诗盖碗，此碗盖面和腹部都雕饰有“三清茶”这首五言诗。落款为“乾隆丙寅小春御题”，说明是乾隆十一年（1746 年）制作的。

另外，据《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七八《咏嘉靖雕漆茶盘》诗注：

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至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

以上可看到乾隆朝的清代陶工，在制作附御制诗的各种茶具上，是非常讲究质量和材料的，如乾隆皇帝赞赏的更胜“宣德、成化旧瓷也”。

据《西清笔记》和《骨董琐记》记载，乾隆皇帝为使重华宫茶宴联句更加雅趣盎然，旨意清宫总管内务府将“三清茶”等其它茶宴联句诗，书咏摹印在茶瓷瓯等其它茶具上面，凡宴毕后，可赏赐文臣学士怀揣高兴而归。

清代宫廷重华宫茶宴联句何时停止的呢?

据《养吉斋丛录》卷十三记载:

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新正二月，重华宫茶宴，有咏盆梅八韵。八年戊子新正二日，重华宫茶宴，有对雪七律一首。是其时尚有茶宴之名，而与旧制稍异，其后则此宴停止矣。

宫廷演戏与帝后迷戏

清宫南府始建于康熙年间，盛行于乾隆时代，道光七年（1827 年）遂改为升平署，迄止宣统皇帝出宫。南府是承应清宫凑乐和演戏的机构，设有“内学、外学、中和乐、十番学、跳索学、钱粮处、档案房、大差处”等。其址在今故宫西华门外南长街南口迤西第六中学校址内。

帝后戏班的清宫南府

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 1628 年），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向封建制过渡。军事上取得胜利，女真各部已统一，蒙古各部纷纷归降。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满汉杂居，使中原文化和封建礼仪对后金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皇太极为了推进封建化，采纳诸多汉官建议，这对其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据《清太宗实录》卷二六记载，天聪九年（1635 年），汉官梅勒章京张存仁上书皇太极，其云：

元旦朝贺，大体所关，杂剧戏谑，不宜陈于殿陛。

于岁前二、三月，设宴迎春，而佐以各项杂剧，以示燕享慈惠之意，至元旦之辰，百官庆贺即毕，仍照旧例，八旗设宴，止用雅奏，使君臣共乐太平。

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五记载：

国初，沿明制，有教坊司耕耤筵宴。有黄童白叟、鼓腹讴歌、香斗老人、进宝回回、五方夜义、五海龙王等承应，后裁。

由于，当时汉官梅勒章京张存仁指出，杂剧戏谑即当时雅俗杂陈的“陈百戏”（称之杂耍）和选力士作“角牴之戏”，均不应用于元旦朝贺大典，也就是不符合封建礼制的规范。皇太极吸收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凡元旦朝贺大礼“止用雅乐，各项杂剧俱行停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〇）。

清代顺治元年（1644 年）定鼎燕京，沿袭明制，接管了明宫的教坊司机构。

《癸巳存稿》云：

初制教坊司有奉銮。

《十朝诗乘》云：

> 明季置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顺治八年停止。雍正元年除乐户籍，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由内府承直。
>
> 《郎潜纪闻》云：
>
> 本朝乐部（乾隆朝复设乐部——笔者注）向以王大臣兼领。卢明楷官侍读时兼乐部行走。
>
> 国初沿明制，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宗，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
>
> 清宫南府的建立始于康熙朝。

据《国朝宫史》在"官制"一节中对职掌南府规定：七品执守侍总管一名，八品侍监首领四名，无品级委署首领无定额，太监无定额。专司南府内一应杂项事务。

南府的兴盛，是与康熙、乾隆两帝喜好戏剧有关。

在故宫博物院乾清宫西庑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档案中，有关康熙皇帝曾命南府太监在宫中排演戏剧的记载，以及康熙叫四阿哥（即雍正皇帝）问南府教习朱四美有关戏剧问题。

乾隆皇帝六巡江浙时，看了江南一

带昆曲班的戏，认为比宫内太监演得好。因此，他谕令织造所辖的老郎诸梨园总局，即刻选取伶人供奉清宫南府。各地优秀伶人入京隶属于南府，一方面用以充实宫内太监组成的御用戏班；二方面也以教授技艺、教习学艺太监。

但为对宫内太监学生与民间伶人、旗籍、民籍学生便于管理和严格区别，将宫内太监学生分为“内学”（内头学、内二学、内三学）。主要由总管内务府择其俊秀者令其习艺，谓之“赏下太监”。根据皇帝谕旨，应拣选年幼之人承充，挑选必须在二十岁以下的太监；这样，皇后妃嫔及各亲王府、郡王府将府内符合太监送进颇多。这些“赏下太监”被送进南府后，档案房立即注册年岁、籍贯，并视其才质所需人各学科。

各地伶人及旗籍、民籍学生分为“外学”（外头学、外二学）。旗籍学生来源于内务府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子弟。每旗于百名内，挑取年龄在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入学，若一二年内学业无成者，甄退拨回本旗当差。总管内务府将外学伶人、民籍学生安置在紫禁城神武门外北之景山。外学伶人生活上受到清宫皇室特别恩赐，专由内

务府拨赏他们食用白米。

南府内学、外学学生，学戏、演戏都聘有专师教授；这些专师均来自苏州、扬州、安徽、湖北等各地伶人教习教演。

《清升平署志略》详细叙述了南府内学、外学学生与伶师含辛茹苦地练功场面。学生每日分早晚两学，学戏程序上，先初念戏本，待念熟后再教白口、唱法、身段；纯熟之后，根据戏中角色，在其师傅指导下，相互对白、对唱；然后，由师傅口念“锣鼓”带说过门，教导学生在何种锣鼓点时出场，唱到什么时候应做何身段，直至将此戏演毕为止。内学、外学学生须经总管首领检查认可后，再加锣鼓带髯口、穿靴子，手执刀枪马鞭等以实地排演，俟得满意方罢。

这样，总管首领才敢书此戏名呈上单，尔后内学、外学即随时听从皇家驱使，侍奉内廷各项承应戏。

演戏主要在被誉为清代“崇台三层”的四大戏楼，即紫禁城的畅音阁，颐和园的德和园，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清音阁；此外，紫禁城内的漱芳斋（其斋内外有两处小戏台）、倦勤斋、怡情书史、丽景轩宫殿内还建有小戏台等。

乾隆朝时南府戏班人数达一千五百

名，他十分关心南府伶人的生活待遇，甚至破除有关规定给予解决。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谕旨：

> 南府学艺人等，乃国家岁时宴会备用音乐所必需，内务府包衣等，皆朕之旗下臣仆，其俸饷皆有定额，若将京师汉人、苏州优伶及太监之弟侄子孙，入于内府三旗，势必分占包衣人等挑钱粮地步，但此项入内，如果实心黾勉，效力有年者，或将其一二人酌入包衣尚可，第不得任意多人。

实际上，乾隆皇帝的谕旨已为南府学艺人开绿灯，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而这一切又都因学艺之人“实心黾勉”学戏、唱戏的结果。

清宫南府的四项承应

清宫南府主要执掌四项承应：月令、庆典、临时、丧礼承应等。他们为此常年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处，为帝后皇室家族成员演出连台大戏。

（一）“月令承应”：

是清代宫廷每年正月元旦始至除夕各个重大节令，都要“凑演其时典故”，

承应演出不同特点的戏，其二十余个重大节令有：元旦、立春、上元、燕九、花朝、浴佛（四月八日释迦牟尼生日）、端阳、关帝诞辰（五月十三日）、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宗喀巴诞辰（十月二十五日）、颁朔、冬至、腊月、祀灶、除夕及朔望承应等。

届时，宫内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以示庆贺。其演出的戏目不计其数，其中有：《喜朝五位》、《岁发四时》、《早春朝贺》、《敛民锡福》、《圣母巡行》、《群仙赴会》、《百花献寿》、《六祖讲经》、《奉敕除妖》、《正则成仙》、《灵符济世》、《仕女乞巧》、《魔王答佛》、《丹桂飘香》、《众美飞霞》、《东篱啸歌》、《花甲天下》、《太仆阵仪》、《金仙奏乐》、《仙翁放鹤》、《司命锡福》、《蒙正祭灶》、《金庭奏事》、《瑞应三星》、《升平除岁》、《彩炬祈年》、《如愿迎新》等等。

（二）"庆典承应"：

凡内廷诸喜庆事，如皇帝订婚（亦作纳彩）、大婚、皇子皇孙婚、皇子诞辰、洗三、弥月、恭上徽号、册封妃嫔、筵宴、大驾还宫（圜丘、祈谷、常雩"三大祭"回宫）、迎銮、行幸翰苑、行围等，都要承应演戏；"凑演祥征瑞应

者，谓之‘法宫雅凑’”，南府届时安排奏演“乐人”之戏。

其中如“开场承应戏”即每次演戏开场的第一出戏，有《万民感仰》、《万载同春》、《五代登荣》、《五福五代》、《天源福辏》、《恭祝无疆》、《太平祥瑞》、《山灵瑞应》、《永庆遐龄》、《南极增辉》、《群星拱护》、《庆贺移銮》、《神芝异卉斗芳妍》等等。

再如“承应宴戏”有：《膺受多福》、《万福攸同》、《太平王会》、《青牛独驾》、《柳营会饮》、《列宿遥临》等等，不胜枚举。

在万寿令节庆典前后，南府要承应“寿戏”，“奏演群仙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

清宫南府“承应寿戏”的开场戏有：《群仙庆贺》、《佛国祝寿》、《西来祝寿》、《蟠桃上寿》、《灵仙祝寿》、《朝天进宝》、《日月迎祥》、《人天普庆》等等。

另外，在万寿节期间，为增加喜庆气氛，还演出“承应灯戏”、“承应大戏”等，如《万福万寿灯》、《万年如意灯》、《上元承应灯》，以及《九如雅颂》、《八方向化》、《古佛朝天》、《万国嵩呼》、《罗汉渡海》、《河清海晏》等等祥瑞戏，

其戏规模大，角色多，排场大，热闹非凡。

在清朝典制中，皇帝万寿圣节是与元旦、冬至并列三大节日，是非常重要的宫廷礼仪。

因此，届时则大朝，备其陈设，正其班位，为其节次，内外官员皆上表庆贺，而此时的南府也最为紧张，承应寿戏是它们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乾隆朝时万寿节庆典最盛，演戏规模也十分宏大、壮观。

每当清宫遇万寿节时，各省疆吏除献奇巧贡物外，仍选本地优伶进京；在乾隆四五十年之际，滇、蜀、皖、鄂等处伶人，俱萃都下。

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也进京演出。当时为万寿庆典演戏，梨园中戏班数目竟达至三十五个之多。同时，清宫南府内学、外学与宫廷雇用戏班混合组成，共同承应“寿戏”。

（三）“临时承应”：

为皇家宫中娱乐，临时助兴加演小戏，不穿戏装以“清唱”为主。

（四）“丧礼承应”：

清宫南府内学、外学学生除演戏外，若遇帝后丧事，“有助哭之宦寺等辈”执丧当差之责。

清代皇帝死后，要把他的灵柩（梓宫）运到乾清宫停放三日，按照丧礼仪式祭奠之后，再将灵柩奉安至景山观德殿为停灵之处。

这期间，南府内学学生身穿孝服跪在几筵前，分四班轮流按早、午、晚三次在几筵前举哀；要求班次齐集，举哀声音要合韵，达到“一人出于哀声，众人出于扬声”，不准有懈怠之处。这些“助哭”哀切者，是宫廷“赏下太监”的南府内学学生，加之平日训练有素，在此哀切场合定会“合韵”。

清宫内廷戏台管窥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清代封建皇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清宫内廷兴建了大大小小十余座戏台，其规模富丽，气势恢宏，现简略介绍于读者。

最为著名的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为自己养老而修建在宁寿宫区域内的宫中最大的畅音阁戏台。整座戏台坐南朝北，为“崇台三层”歇山顶式建筑，最上层叫“福台”、中层

叫“禄台”、下层叫“寿台”。

除戏台上有木楼梯可供上下外，每层还都有机械装置，演神鬼戏时，演员可以从上层降至下层，或从地上升至下层。因为寿台台面下的中央和四角，有五口地井，平时不演戏，盖上地板，使用时打开，靠安装在地下室的绞盘，将布景托出台面。如清宫演《地涌金莲》时，坐着五尊菩萨的五朵大莲花座，就是从五口地井徐徐升上台面的。

曾在清宫内廷演过戏的杨小楼先生证实道：清宫演承应戏，一般神仙菩萨出场，还是从上场门出来的居多，但他也还是见过从戏台五个井口出来的菩萨。这是清宫南府演出的群戏，昆腔戏挺热闹，末了从五个井口慢慢升上五朵大莲花座，上坐五尊菩萨。每一个莲花瓣里都有灯。莲花座是井下有人推磨给托上来的。

另外，曾是光绪末年升平署外学、后任中国戏校校长的王瑶卿先生补充说：曾见过《罗汉渡海》的演出，有很多水族的“形”，还从天井系下来“海市蜃楼”，是一出灯彩切末的昆腔戏。开头，福台、禄台都有人，后来都归到寿台上。有个一丈来长的大鳌鱼切末，鱼肚子下

有小轮，里面藏了人推着走，到台口由鱼嘴里往外喷水（里面有水箱和机桶）。唱完这场戏，院子里已经汪起水来，好在听戏的都在屋里。

畅音阁下层戏台（即寿台）台面，台四周有柱子十二根，是一个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方形台面，很宽敞，面积相当于普通戏台的九倍。除设有五口地井外，其中央的一口井，底下有水，那是为了引起共鸣，促使增加音响效果。另在寿台天花板上有三个天井，相通禄台、福台；虽说福台和禄台的台面范围很小，这是根据坐在对面阅事楼宝座上看戏的皇帝和皇太后的视线所及而设计的。

当演出承应大戏时，数百名神佛角色出现在三台上，呈现出“海市蜃楼”之妙境，构成一幅“群仙祝寿”和“极乐世界”图。

畅音阁戏台对面是阅事楼，它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坐北南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两层楼。楼内设宝座，皇帝及后妃在此观戏。阅事楼东西有围房与畅音阁相接，是王公大臣们看戏的地方。

宫中演戏时间，多安排在早上六至七时开戏，下午二至四时左右散戏，偶尔也有延至下午五至八时的。

在宁寿宫花园（即俗称“乾隆花园”）北倦勤斋内西室建有一座小戏台，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方亭式戏台，台柱对联书有“寿添南极应无算，喜在嘉生兆有年”之句。周围墙壁、顶棚皆为木构件雕成竹节状，上挂藤萝和萝花，与顶棚满画竹篱藤萝的海墁天花连成一片；加之窗格雕成蝶形寿字，内悬粉红丝帘，戏台对面的室后为竹棚，绕以栏杆，凭栏置宝座，上悬红纱灯，更显得环境优雅、典致。

实际上，倦勤斋是仿建福宫中敬胜斋（1923年6月逊清皇室时被烧毁）模式修建的。乾隆皇帝曾命南府太监以八角鼓、三弦演唱太平岔曲于此。

建福宫敬胜斋内德日新殿，设有一座小戏台，四壁及屋顶彩画一架葡萄，垂珠丽丽，翠叶青绿，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座美丽的花园。

相传，嘉庆皇帝曾命太监、宫娥等排小戏彩唱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隆裕皇太后派人到上海购来一部电影拷贝，即用德日新小戏台演戏。

景祺阁为宁寿宫中一路，其前院改墁冰纹石地面，环境十分幽雅。景祺阁北小屋，为珍妃幽禁之处；其西间建有

一座小戏台，四周围以雕栏，晚清时期的慈禧皇太后六十诞辰后，曾长时间地居住在宁寿宫区域内的乐寿堂西暖阁，因而每夜都传戏于此。

在西六宫的重华宫东翼庭院内有一座漱芳斋戏台，是乾隆年间改建西二所时增设的，是宫内的中型戏台，其坐南朝北，每面四柱，当心间稍宽，作为台口。台的上方设有天井，覆以重檐歇山式屋顶，构造殊精巧，天花饰华丽。

凡宫中喜庆宴会、年节月令，特别每年的元旦、万寿等节日，优伶与南府太监在此供奉承应戏。有时甚至是在畅音阁大戏台唱过后，再到此处接唱。

在漱芳斋后“金昭玉粹”室内，坐西面东，有一座四角攒尖方亭戏台，台面仅数平方米，故称“风雅存”小戏台。因戏台横批“风雅存”三字传为乾隆皇帝御笔所书，对联曰：“自喜轩窗无俗韵，聊将山水寄清音”。

乾隆皇帝晚年常召集词臣于戏台风雅酬唱，也是皇家临时助兴，戏多为十几分钟一出的折子戏，内容多以歌颂帝王功德，歌颂升平盛世为主的“清唱”小戏之用。

晚清时期有长春宫戏台，位于体元

殿后，因殿后北向出抱厦三间，可作演戏之用；戏台较为宽敞，挂间置有低平的木质坐凳栏杆和简洁的倒挂楣子，甚为素雅。此戏台坐南面北，正对长春宫，在光绪朝每至冬季还搭盖玻璃棚演戏。

怡情书室戏台，在长春宫后面设于室内，同治朝时慈禧太后居住长春宫，夜间随传戏之所。

丽景轩戏台，是慈禧太后居住储秀宫时，为供奉她夜间传戏所建，后因逊帝溥仪大婚时，筹建西餐房将此戏台拆除。

寿安宫戏台，是乾隆皇帝为祝贺孝圣宪皇后万寿所建。其规模可与畅音阁戏台媲美，两座戏台均为“崇台三层”建筑，东西之间遥遥相望，不分上下。其戏台上层匾曰：“庆霄韶㙞”，联曰：“风耄辉呈阿阁瑞，珠联景绘泰阶符。”中层匾曰：“曾城广乐”，联曰：“图畴递衍京垓积，律吕环生长下和。”下层匾曰：“昆阆恒春”，联曰：“鸣预叶云韶，颂集九如开寿域；祝厘陈彩舞，欢联万家谱春台。”皆恭祝孝圣宪皇后六旬、七旬万寿之年，乾隆皇帝御笔也。

乾隆朝曾多次为庆典祝寿工程修缮过寿安宫戏台，并在戏台西边添建一座

寿山亭台。

据清代《内务府奏销档》档案记载：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八月，寿安宫三层檐戏台修理，估需银四百四十六两七钱八分七厘，向广储司领用。

只可惜，嘉庆朝将寿安宫戏台拆除改建，亭台今亦无存。

嘉庆四年（1802年）七月永琅等折：

遵旨："寿安宫戏台宜于折去。"又拟将春禧殿后扮戏楼分位，改盖后卷殿一座，计五间。内明间，面阔一丈七尺。次间，各面阔一丈四尺。东西进间，各面阔一丈二尺三寸，进深一丈八尺。前后廊各深四尺。檐柱高一丈五尺五寸，径一尺五寸八。连同木植、砖瓦、铺墁装饰，共估需工料银三千五百七十两四钱五厘。共折下三重戏台物件，请交屆乐园工程处自行取用。

奉旨："知道了"。

搭盖临时性戏台，主要是乾隆时期的年节及万寿盛典时，不但在养心殿搭盖天地香亭，安设大灯地座，灯屏一座，而且还盖有洋漆戏台一座，奏演承应戏。

清宫内廷共建有十余座戏台，现今保存完好的戏台有五座：即畅音阁戏台、倦勤斋戏台、漱芳斋戏台、漱芳斋内“风雅存”戏台和长春宫戏台。

康熙力倡戏腔圆正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 1622 年）元旦，在努尔哈赤汗王宫内大摆酒席庆贺新年的“宫廷筵”上，饮酒助兴者还上演汉人的杂戏。

所谓杂戏，似民间的傀儡戏（即今之木偶戏），内容多为天地之间的神话故事；另外，还上演蒙古族的杂技，如拳术、走绳、刀剑、马术等等百戏。

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二记载：

> 壬戌年正月朔，汗率八旗贝勒大臣出城，诣堂子……还殿，八旗诸贝勒向汗叩拜新年……拜毕，治百桌，杀牛羊，集诸贝勒大臣、汉人、朝鲜官员及蒙古诸贝勒，演汉人的各种玩艺（陈百戏），设宴。

天聪年皇太极继汗位。天聪七年（明崇祯五年 1633 年），蒙古诺木齐乌巴什贝勒等归降，皇太极十分高兴，遂命“八门击鼓，召众于崇政殿宣捷。异日，于演武亭拜天行礼毕升座，诺木齐乌巴

什等率部众朝见行礼毕，设乐舞大宴，选力士为‘角牴之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〇）。

自清顺治朝定鼎燕京，袭明制，吸收融合汉文化，皇家均爱看杂戏并盛行宫中。顺治皇帝年轻爱读《离骚》、《汉乐府》，并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配宫中雅乐，谕之“清平调”。

康熙皇帝改教坊司为“南府”，命南府太监在宫内排演《目连戏》、《长生殿》等多种戏剧，旨意演戏太监做到“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要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字腔得理，才算称“梨园之美”。

康熙皇帝对宫廷旧戏本十分不满意，曾下谕旨：

> 《西游记》原有两三本甚是俗气，近是海清，觅人收拾，已有八本，皆系各旧本内套的曲子，也不甚好，尔都改去，共十本，赶九月内全进呈。

康熙皇帝还认真地探讨江苏昆曲、江西弋腔与丝竹、曲律间的相合关系，曾叫四阿哥（即雍正皇帝）问南府教习朱四美有关如何“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

的戏剧问题；另外，再旨意详细询问南府教习朱四美的有关音调的问题：

> 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之乡的回语，叫个明白些的，着一一写来。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不要问紧了，细细的多问两日，倘你们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乐书有用处。再问屠居仁，琴中调亦叫他写来。

据陈垣先生辑《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中，谈及供奉清宫内廷的传教士德理格教授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乐理，其罗马传教部东方档案中记载着康熙皇帝的一段谕旨，读来颇有兴味，从中可以看到康熙皇帝对其音乐的苦心造诣，以及他对乐理的深刻理解。其清宫档案记载云：

> 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乌、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

与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

看来，康熙皇帝是对音律相当精通，也是一位颇为用功的皇帝，特别对乐器的演奏学得非常用功、刻苦；对戏剧和乐理非常精通、戏曲艺术造诣颇高。

所以，当弋腔在外被俗曲乱套时，惟宫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为保持弋腔的风格音调，康熙皇帝特旨意派专人前去江南教习，这可以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二月，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弋腔教习叶国桢已到苏州折》可以看出端倪来：

切臣庸愚陋贱，叠荷恩纶，揣分难安，益深惶悚。昨蒙佛保传谕温旨，倍加歉仄。念臣叨蒙豢养，并无报效出力之处，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切想昆腔颇多，正要寻个弋腔好教习，学成送去。无奈遍处求访，总再没有好的。今蒙皇恩，特著叶国桢前来教导，此等事都是力量做不来的，如此高厚洪恩，真竭顶踵未足尽犬马报答之心。今叶国桢已于本月十六日到苏，理合奏闻，并叩谢皇上大恩。容俟稍有成绪，

自当不时奏达。谨奏。

朱批：知道了。

在当时清宫中戏曲的纯真音韵，无疑因归功于康熙皇帝对戏曲的研究成果。

康熙万寿寿戏连台

据《莼乡赘笔》和史料文献记载：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正月，上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先是江宁、苏、浙三处织造各制献蟒袍、玉带，珠凤冠、鱼鳞甲，具以黄金、白金为之，上登台抛钱，施五城穷民，彩灯花爆，昼夜不绝，古所称大酺，想即此也。

这是康熙朝以梨园演戏贺盛大活动的真实记录，其戏剧所用的“行头”、“切末”工料十分精致；如清宫早期戏衣，多由明代织绣品改制而成，其演戏场面又极其热烈，不同凡响。

至康熙朝晚期，皇帝六十寿诞庆典则更加热闹非凡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三月十八日是皇帝玄烨六旬生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典，这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万寿庆典。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原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正月，即庆寿四年后。当全部稿本完成以后，呈于康熙皇帝阅览，皇帝看完后欣然谕旨曰：

万寿图画得甚好。

说明这幅画不但艺术价值高，而且极其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盛况情景。可惜原画已轶失。

现珍藏乾隆朝冷枚等十四名宫廷画家所绘《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两卷，生动地描绘了康熙皇帝六旬万寿节的热闹场面，自畿辅各省以至避陬僻徼，莫不衔歌巷舞，击壤呼嵩。据《万寿图记》记文前识曰：

皇上御极五十二年，六旬万寿，京师九门内外，张乐燃灯，建立锦坊、彩亭、层楼、宝榭，云霞瑰丽，金碧琨煌，万状千名，莫能殚述。百官黎庶，各省耆民，捧觞候驾，填街溢巷，琳宇珠宫，钟鼓迭宣，火树银花，笙歌互起，祝嘏之盛，旷古未有。于是依辇路经行之处，绘为图画。自神武门至西直门为上卷，自西直门外至畅春园为下卷，依图之次为记。

当时，从北京西郊畅春园经西直门

到达皇宫紫禁城神武门，沿途街巷分别设置的五十段龙棚、经棚等壮锦纷华的场面，特别在这条回銮大道旁设置戏台四十余座，御辇所经沿途张灯结彩，所演戏剧大都属于昆山腔和弋腔，戏目内容繁多，令人耳目一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宫廷摹本《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真实地反映了康熙皇帝六十寿诞的祝贺和寿戏连台的盛况。当时，在京祝寿的戏班，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是各地乐工的精华，而所献技艺特色各异，精彩纷纭，丝竹盈耳。

在康熙皇帝六旬万寿庆典的盛大日子里，每天，戏台前万头攒动，锣鼓喧天，争奇斗艳，到处是明黄色彩和五颜六色映照下的喜庆欢乐景象。王公大臣们和朝廷官员们如此大张旗鼓，竭尽全力地策划操办庆典活动，自然也是为迎合康熙皇帝爱看戏曲之所好，以此博得皇帝的欢喜。

雍正、乾隆是“戏迷”

雍正皇帝是一位为戏曲迷恋的爱好者，否则，在他当皇子（四阿哥）时，康熙皇帝不会叫他去专问南府教习有关

戏剧问题的，起码说明雍正皇帝在戏曲方面是较为精通的。据文献记载，雍正皇帝曾看戏剧《郑儋打子》时，因“曲仗俱佳”，一时高兴，竟赏赐伶人食品。

但据《啸亭杂录》又记载了雍正皇帝“杖杀优伶”的一则故事：一次，雍正皇帝兴致勃勃地看杂剧，演的是有关常州刺史郑儋打子的故事。扮演常州刺史的伶人技艺高超，“曲仗俱佳”，因而颇受雍正皇帝的青睐，并赏赐银两奖赉一番，然而，这位优伶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竟斗胆地向皇帝询问，现时任常州刺史的是谁？雍正皇帝听罢勃然大怒，当即喝道：“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时不可长。”接着降旨，将这位伶人即刻杖死。

乾隆皇帝堪称是一个“戏迷”，这可以从他登极后修建宫中畅音阁戏台，看出端倪；除此之外，他还在其它御苑处大兴建造戏台，如西苑的纯一斋戏台、圆明园的同乐园戏台、清漪园的听鹂馆戏台、避暑山庄的清音阁戏台等。

乾隆皇帝非常喜欢昆曲，能击节鼓板、自制曲拍、自演自唱戏中角色，曾和皇后同唱“访贤曲”；据说，他还亲自演过《李三郎羯鼓催花》戏。

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也不废歌声，并挑选民间戏班演员，带回京都，成立“新小班”。他曾谕令巡盐御史伊龄阿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并命戴全德饬查剧本及演出。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能教习太监唱戏，所以宫内将其称谓“御制腔”或“御制清曲”。他十分精通音律，并且自制北曲《花子拾金》，其《枝巢清宫词》释之此曲：

大雪茫茫柳絮飘，芒鞋毡帽善摹描。
古稀天子逢几暇，自谱新声和玉箫。

据清代《升平署总档·日记档》记载，乾隆皇帝一生巡幸避暑山庄五十一次，在此看戏多达一千四百八十二出，其数目之大、戏瘾之足，着实令人吃惊。其清代档案对他看戏有所统计：

开场戏（如《万花献瑞》、《平安如意》等）六十四出；

宴戏（为承应戏，如《千春燕喜》、《捧爵娱亲》等）二十一出；

节令戏（为承应戏类，如《早春朝贺》、《东篱啸傲》等）四十七出；

单出戏（根据皇帝的兴趣、爱好、雅兴，如《群英会》、《玉堂春》等）一百九十六出；

春戏（为承应戏类，如《对雪题诗》、《万载恒春》等）二十五出；

灯火戏（为承应戏类，如《河清海宴》、《地涌金莲》等）七处；

大戏（场面宏大，大人物众多的戏，如《蟠桃会》、《劝善金科》等）四十八出；

连台本戏（亦属大戏，十本演十天，如《升平宝筏》、《鼎峙春秋》等）一千零六十三出。

乾隆皇帝为了看戏享乐，在每次南巡和去塞北“木兰秋狝”时都有数百名南府内学太监和外学伶人相随，有时甚至达至千余人。据清《热河园庭现行则例》卷四记载，这些唱戏之人还受到乾隆皇帝格外的赏赐，旨意他们可以攀登避暑山庄内的“四面云山”亭。

乾隆皇帝将清宫南府带到避暑山庄演戏，有两个目的：一是政治原因，主要为发展满、汉、蒙、藏等各民族文化融会和交流等诸关系，以巩固清朝封建统治。二是为万寿圣节的铺张，以显示国力强盛及太平盛世的一番欣欣向荣景象，从而也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

据清·赵翼《簷曝杂记》记述了乾隆皇帝万寿圣节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的喜闻乐见的演戏盛况，其云：

> “上秋狝至热河，蒙古诸王皆觐，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幼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鬼神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道童不计其数，至玄奘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倬有馀地。”

从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宫廷演戏场面活灵活现，也展示了避暑山庄清音阁戏台设施之全，演戏场面之大，“切末”、“行头”使用之巧妙，演员阵容

的确十分庞大，令人震撼耳目一新。当时受皇恩赐戏的除文武三品以上的大臣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及前来朝贺的外国使臣，令他们大开眼界，韵味无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辰。当时，从各国、各地赴避暑山庄热河祝寿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各番国贵族以及英吉利国使臣等云集在澹泊敬殿行庆贺礼之后，乾隆皇帝在清音阁前赐宴并安排演戏，连续演宫廷大戏三天。

据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所著《乾隆皇帝觐见记》，将其亲身感受所见所闻，生动活泼地描述下来，使我们从中可窥视当时宫廷演神鬼怪戏的盛况情景，以及演戏“切末”、“行头”的华丽装饰和清音阁戏台的壮观雄姿等，其书云：

> 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变更，有喜戏、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联串。其中所演事实，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理想的。技术则有歌有舞，配以音乐。也有歌舞音乐均屏诸勿用，而单用表情科白以取胜者。论其情节，则无非男女之情爱，两国之争战，以及谋财

害命等，均普通戏剧中常见之故事。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表之誉。盖所演者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开场时，乾宅、坤宅（婚礼，称男家为乾宅，女家为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宝物示众，其中有龙、有象、有虎、有鹰、有驼鸟，均属动物；有橡树、有松树，以及奇花异草，均属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氏已尽出其宝藏，除船只、岩石、蚧蛤、珊瑚等常见之物外，有鲸鱼、有海豚、有海狗、有鳄鱼，以及无数奇形之海怪，均系优伶所扮，举动神情，颇能酷肖。两氏所藏宝物，尽暴于戏场之中，乃就左右两面，各自绕场三匝。俄而，金鼓大作，两方宝物混而为一，同致戏场之前方，盘旋有时，后分为左右二部，而以鲸鱼为其统带官员，立于中央，向皇帝行礼。行礼时，口中喷水有数顿之多，以戏场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地隙流去，不至涌积。此时观者大加赞叹。

显然，马戛尔尼描述的要比赵翼写得深刻，这也许与他作为大清乾隆皇帝的座上宾，可以从最好的位置、最佳角度来全方位观赏戏剧有关；这种近距离地观看，细腻入微的描述，的确弥补了史料文献中记录之不足的缺憾。

乾隆年间，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满汉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同时，社会各阶层对戏曲的普遍爱好，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文人学士的府邸演出各种戏曲活动之频繁，为宫廷戏剧的发展和统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都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条件。

当然，清代帝王重视提倡戏剧，除满足娱乐之需要外，还有寓教于乐，宣扬封建礼教，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目的。

乾隆重视戏腔剧本

乾隆皇帝不但命庄亲王允禄和大臣张照（文敏）编写剧本，而且本人也亲自动手编写，词藻雅丽。现今故宫博物院仍藏有南府时期抄写的不少昆腔和弋腔剧本，如《鼎峙春秋》、《劝善金科》、《昭代萧韶》、《升平宝筏》、《西异传总本》等千余种戏本、戏单。

《鼎峙春秋》为清代内廷四大本戏剧之一。此戏以"三分归一统"作结束，寓意满族入主中原，系出"天命"（努尔哈赤建后金，年号天命）也暗含康熙平定"三番之乱"，天下一统之意。

另外清宫演戏中特别有名的《劝善金科》、《升平宝筏》，是清宫经常演出和有影响的昆腔连本大戏，其中少部分单出为弋腔，均由刑部尚书张照亲制，曲文皆由张照一人所撰。

张照，字得天，江苏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五十四年（1715年）入南书房。雍正七年（1729年）内阁学士，十一年（1733年）授刑部尚书。雍正十三年（1735年），因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不和，挟私怨延误苗疆军事，受湖广总督张广泗弹劾，被革职下狱，廷议当斩。时逢新皇帝乾隆即位，他非常欣赏张照的文学素养高，特别是戏剧方面的成就以及"通法律、懂音乐、精道佛典，尤工书法"等才能，张照得以特赦出狱，并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在此期间，张照根据乾隆皇帝"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的旨意，开始编剧《劝善金科》、《升平宝筏》，是将元、明、清流传下来的杂剧、传奇、

折子戏连缀在一起，编出二百四十出连本大戏，成为两部完整的戏曲剧本。

如《升平宝筏》是根据《西游记》的故事改编而成，并参照了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和明初杨讷《西游记》杂剧，以及明人传奇《江流记》等剧改编而成的。

张照改编的清宫连本大戏《劝善金科》、《升平宝筏》，由于故事生动，表演精彩，结构精练，人物形象鲜明，服装道具考究，演出排场浩大，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并成为清宫廷演出剧目中风行一时、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正如看过清宫戏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所描述的当时情景：

> 从八月初六日即开始演大戏，到十五日才停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的神仙鬼怪故事。

为了便于唱戏者掌握《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剧，其戏本中利用红、蓝、绿、黄、黑五色，区别剧本的宫腔、曲牌、曲文、文句、声腔等。

可以想见，康熙朝时宫廷内《西游记》等之旧戏本十分“俗气”，改编后也仅为“十本”，而乾隆朝时旧戏本已面目

一新，经张照等文人学士润色后，每场戏从舞台设计、人物扮演、上下场方式、动作、旋律、曲调、曲牌、曲文、服装、科文、读韵等在戏本中描述得都非常细腻。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宫廷档案中藏有汉文、纸质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十一至二十日侍奉皇帝在同乐园看戏之折件——演十日连台戏折。这类宫廷戏表现为规模气势宏大，场面繁杂，情节生动，情趣盎然，演员服饰豪华，脚色、行头、行当、切末繁复而新奇。

帝王在避暑山庄看戏

清代皇帝除在清宫内廷及京城御园戏台看戏外，即远离京城来到塞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观赏演戏活动，当然从史料来看，主要只涉及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以及咸丰皇帝避难热河期间。

一般演戏地点，次数最多的是如意洲“一片云”戏楼；其次是东宫福寿园清音阁和正宫云山胜地楼下“文明福地”。

所谓“一片云”系乾隆皇帝御题三十六景第十八景，是避暑山庄较早的看

戏楼。因其地处洲岛湖水之间，又兼绿树环抱，云阴乍起，竟有“白云一片才生岫，瞥眼岫云一片成”的盛景出现，得乾隆题名。

“一片云”在延薰山馆、水芳岩秀之东，界以廊墙。两面为看戏楼，一侧是看戏彩廊，北楼后出抱厦，木式楼梯可登楼上。四围紧括，呈方形天井，有戏台于南，乾隆为其题匾，名“浮片玉”，说它犹如浮于倏然变幻的云海中往来歘忽的一只小槎。

整个建筑规整，环境清净幽雅。据《钦定热河志》记载，在这里听戏，远隔尘嚣，得听得看，当稍有倦意的时候，仰首望天，只见蔚蓝色天空飘浮着片片白云，其“郁郁纷纷，萧索轮囷”，只觉得“岱岳云峰，天都云海，未能独擅其胜”。

嘉庆皇帝为此特写诗赞曰：

至静原无象，何来一片云？
随风方荡漾，出岫倏氤氲。
为雨万民福，丽天五色文。
九霄悬皎日，奚必幻纷云。

避暑山庄每逢庆典或皇帝“木兰秋狝”归来，都要在“一片云”戏楼看戏。乾隆二十年（1755 年），东宫福寿

园清音阁落成后，小规模的看戏或游湖听清唱仍在这里。

避暑山庄清音阁戏台，坐南朝北，分上、中、下三层，其形制与紫禁城皇宫内廷畅音阁戏台、圆明园清音阁戏台、颐和园德和楼戏台相媲美。戏台均设置有天井，一层台为木质活动地板，地板下为地下室，高度两米，内有五眼水井，井口外沿直径为二点六六米。井盖上有四个等大的圆孔，圆孔直径为零点三四米；井口至水面距离为一点五米，水深三米。戏台这种带有天井、地井的建筑设施，不仅有良好的音响效果，而且可以很好地调度演员，不忙不乱，从容演出，又能更好地使用演出道具（即“切末”、“行头”等）。

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朝鲜进贺兼谢恩正使朴明顺、副使郑元始、书状官赵鼎镇于八月初九日到热河为乾隆皇帝祝寿七十诞辰，其朝鲜书状官赵鼎镇记录了当时被赐赏看戏的情景：

> 热河戏台，在行在内，层阁宏敞，左右木刻假山，高与阁齐。仙果珠树，剪彩为之。戏本有五，一本共有十六枝（即折），卯（上午八

时）而始，未（下午四时）而罢，凡五日而止。大抵多祝寿之辞，而率皆杂乱。如“虞庭八佾”，只有武舞。武士六十四人，皆着金盔锦甲，右手持剑。左手执戈，为坐作击刺之状。甚至以尧、舜为戏，乘之黄屋，着以冕服，为华封、苍梧巡幸之状。乐无土革之器，其声噍杀，无宽缓和平之意。

看来，朝鲜使臣所看戏之情景，是描写歌颂古代帝王的歌舞戏，仅武士即达六十四人，可见其戏场面恢宏、壮观，再加之布景华丽考究，可窥避暑山庄清音阁戏台演戏之热闹景象。

另外，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观灯、观火戏也是清帝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乾隆朝时，除每年轮流班随皇帝到木兰围场秋狝的蒙古王公外，还有一些在平定叛乱过程中，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他们更加心向朝廷，络绎不绝地来到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据清代档案和史料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各部落的台吉、首领及各国使臣来此，乾隆皇帝御万树园赐宴、赐观火戏、观立马技、百戏杂技等。

关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观赏火戏的

情景，英吉利副使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

> ……是一队几百人的大歌舞表演。表演者身上一律穿着橄榄色制服，载歌载舞，随时更换队形，并借助不同颜色的灯笼做出中国字来歌颂皇帝圣德。……歌舞表演之后，继之是焰火。即使焰火在白天，效果也非常好。许多设计都是英国人从来未见过的。一个大盒子悬挂在空中，从他的下面突然掉下来许多纸灯笼。在盒子里面这些纸灯笼是折着的，掉出来之后就自动张开，而里面突然燃起色泽非常漂亮的火焰。我们简直看不出灯笼是怎样突然出现的，以及没有通过外面的点燃，它们又是怎样亮起来的。在盒子里面一层一层地掉出各种不同的景象，发出各种不同的亮光，似乎中国人有随意把火包裹起来的本领。大盒子的每边有几个小盒子，里面也各自放出不同的景象和不同的火焰。这些火彩像发光的铜色，像电光一样随风动荡。焰火的最末一场是伟大壮观的火山爆发。

据清代档案和史料记载，几乎每年

都有各部落的台吉、首领及各国使臣来此，乾隆皇帝御万树园赐宴、赐观火戏、观立马技、百戏杂技等；再加蒙古各部也争相献技，如相扑、赛马、什榜（音乐舞蹈）、杂耍等活动，使宫廷宴筵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据《热河志》卷十六记载，乾隆朝时期的大臣嵩寿特写诗吟咏：

吐火吞刀争献技，寻橦履索列成行。
折腰引手盘旋架，急拍高歌上下吭。
捷逞都卢纷杂沓，乐陈僸昧震礌硍。

清晚期演戏情景不佳

嘉庆朝南府“内学”、“外学”有八百人。然而至道光时期，时局恶劣，国库匮乏，将清宫南府改升平署，取消外学，演戏太监逐年减少至二百余人。

即便如此，道光皇帝仍旨意各项承应戏照演不误。他在其母后生日之时，必须依据宫中惯例为之庆贺一番，只是因消减南府内学、外学人员后，再没有乾隆、嘉庆时代的那种热闹排场了。但道光帝为了表示忠孝之心，曾“挂白髯衣班连衣，手持䪼鼓（拨浪鼓），作孺子驮舞状，面太后而唱……”，以博母后一乐。

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道光时期清人画《戏剧图册》，纸本，设色。长64厘米，宽64厘米。《戏剧图册》内容为京剧取材于小说《三国演义》的《空城计》；取材于《楚汉春秋》的《取荥阳》，此故事即描述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今河南郑州附近）城内，刘邦手下纪倍乔装刘邦，出见项羽，刘邦乘隙假扮小兵脱围而走，从而解荥阳之围。

另外，清人画《戏剧图册》内还画有京剧《芦花河》、《斩子》、《柴桑口》、《定军山》、《赶三关》、《黄鹤楼》等数十张。这些京剧画册，画面优美，色彩艳丽，人物惟妙惟肖。当我们欣赏百年前的剧目时，其画面人物的真实，的确有呼之欲出的奇妙感受，真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享受。

道光皇帝对戏曲的爱好，显然是不如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咸丰十分醉心于戏曲杂剧。

清中叶以后，除昆曲、弋腔两种为主流外，亦偶有皮簧，咸丰时期增加了“乱弹”。

咸丰皇帝御位时，即旨意清升平署戏班分批召来避暑山庄承差。一般十月

起，即在避暑山庄行宫的“烟波致爽”开戏。

此后，几乎每两三天就要唱一次。有时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每次的剧目、角色均由咸丰皇帝钦定。热河行宫此时还有嘉庆皇帝时召来的老伶人，咸丰皇帝时常召来抚慰，并亲往观看他们向太监传授戏评戏文。

咸丰皇帝不但爱看戏、学戏、改戏、编戏，还亲自当导演和参加戏剧的演出。一次，一位老伶人将唱句的“凭”字念作上声，咸丰皇帝立即指出应为去声。老伶人回答说是按旧曲谱之声念的，咸丰皇帝告之旧谱就已经错了。此事可见他对戏剧的痴迷和听戏的用心。

咸丰十一年（1861 年），咸丰皇帝病倒避暑山庄后，在病情稍转安后，仍以看戏取乐消磨时间。

五月十四日，他传旨升平署总管带领人员去如意洲“一片云”戏台试演。如意洲是行宫中的一处建筑，“一片云”为水上戏台，供夏季使用。因已停用数十年，咸丰皇帝故派人试演。此后他看戏均改在如意洲，傍水取凉，抱病支撑。

六月初九日，是咸丰皇帝三十岁生日，按惯例升座受贺，摆宴游乐，病情

随即转剧。

七月初，咸丰皇帝病情稍安，又传旨升平署“如意洲花唱照旧”。

在临终前二日，咸丰皇帝还强打精神，在如意洲点看《白水滩》、《连环套》等戏。

同治、光绪朝时期，宫中演戏十分频繁。同治皇帝还曾粉墨登场，并常在剧中饰演无关紧要之角色。一次演《打灶》时，某妃演李三嫂，同治皇帝则扮灶君，他身穿黑袍，手拿木板，被李三嫂骂一声，揍一下，“一詈一击以为乐”，虽有损帝尊，他却以此津津乐道。

据清宫太监耿进喜回忆，同治皇帝能唱武生戏，但没嗓子，唱过《白水滩》。一次，他唱《黄鹤楼》，同治皇帝饰赵云，太监高四饰刘备。赵云在打躬参见主公时，高四赶紧站起来说：“奴才不敢”。同治皇帝不高兴地埋怨道：“你这是怎么唱戏呢?”

耿进喜谈到光绪皇帝时，说他会走戏的场面，善打小鼓，爱打《金山寺》等戏。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皇帝喜爱击鼓，其击鼓之技就是由沈宝钧（鼓师）所授。另据《清代伶官传》记载：

……十五德宗大婚后始亲政，

万机之暇，最嗜击鼓，即召立成入内，就从受业，十余年如一日……。

晚清宫廷中的戏曲演出情景，《翁文恭日记》做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从中可窥一斑：

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月初九日

晴暖无风，第一日好天气也。卯正（清晨六点）闻今日传听戏，急起，洗汰毕，遂入至西苑门，群公皆入矣。趋入丰泽园门，坐厢房，尚未入坐，已卯一刻，开戏，先跪安，即谢恩三叩首起。西边列条凳两行，诸臣杂坐，不甚按秩序。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酉（下午五时至七时）两次赏饭，未刻（下午一时至三时）一次酒果，皆极丰腴鲜美。初入赐奶皮、奶饼一次。惟危坐终日，腰膂不支。戌初二刻五分（晚七时三十五分）始散。……

同年十月初十日

皇太后圣寿节，寅正二刻（清晨四点半）起，卯初二刻（五点半）入坐西朝房。黎明讹传有信，遂至长信门外，西北风甚厉，寒甚。辰初二刻（七点半）太后升慈宁宫，

> 上率王公百官行庆贺礼毕，余等先赴六项公所更衣，至戈什爱班处小坐。巳初（九点）入坐听戏，先跪安，一叩、二叩、视、三跪九叩，又在上前请安叩贺，如前仪，又一跪三叩谢，入座，遂坐。午初（十一点）饭，未巳（下午两点）酒果，申巳二刻（下午中点半）饭，皆丰。酉初二刻（下午五点半）灯上，殿前一电气球。戌初二刻（下午七点半）戏毕。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清宫中十分讲究戏曲采用清唱的形式，当时宫中演戏盛况空前，经久不衰。

慈禧嗜戏如命

同治、光绪两朝，宫廷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是个嗜戏如命的“戏迷”。在她统治清朝达四十八年的时间里，除咸丰皇帝丧期、同治皇帝丧期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因逃往西安而没听戏外，其余时间，都经常在宫内、中南海、颐和园不断以听戏、看戏为主。

晚清慈禧太后当政时，供帝后游乐的北京西山圆明园不幸毁于英、法等国侵略军的焚掠之中。但慈禧太后为满足

自己游乐私欲，不顾国家命运，民生凋敝，动用海军军费大兴土木，以“颐养冲和”之意，修建了颐和园，还在园东部建德和园大戏台。

这座大戏台完全可与紫禁城内乾隆皇帝修建的畅音阁戏台媲美，不仅有与紫禁城畅音阁大戏台具有同样功能的为演神鬼戏设置的天井和地井，而且在戏台底部还设有水池，演戏时台上可以喷出壮观的水景。

紫禁城内畅音阁大戏台，虽说是为乾隆皇帝而亲自兴建，但他并没有在宁寿宫居住过，所以实际上他在畅音阁看戏并不多，只是遇到元旦、万寿等盛大节日时，才来到畅音阁看戏。

而当政的慈禧太后，虽长年居住颐和园，但至冬日或平日返回紫禁城后，无论居住储秀宫，还是居住宁寿宫区域的乐寿堂时，凡遇宫中盛大节日，总是懿旨到畅音阁看大戏，并由皇帝、后妃、命妇以及王公大臣陪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汉文、纸质的《月戏档》档册，都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清宫每月演戏地点、时间、剧目等内容。

光绪十年（1884 年），慈禧太后五

十寿诞，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在畅音阁演大戏。

十月初八日至十六日，又在畅音阁和长春宫戏台同时演戏九天，每天达至六七个小时。

十月十日生日这天，慈禧太后在畅音阁看戏，坐畅音阁大戏台对面阅是楼正中，两旁是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阅是楼东、西两厢是内廷王公大臣，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及总管内务府大臣等；看戏中还赏给他们面食、包子、寿桃、燕菜一碗，总之让他们耐心地吃饱喝足陪伴观看而已。

另外，为慈禧太后五旬庆典，由翁文恭代上写《心经》，白蜡笺飞金，高约八寸，宽约三寸余，每页十行，每行九字。

同时，阅是楼及内外两厢，挂福、禄、寿灯四百五六十盏，届时真是鼓乐声喧，灯火通明。为庆祝慈禧太后五十大寿，在畅音阁、长春宫演戏，所购置戏装、道具等，耗费白银十一万两。

当时，真是"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晚清宫廷所购置的戏衣，至今故宫博物院仍完好地珍藏保存着。

最为风光的是慈禧太后六旬庆典，其豪奢程度完全可与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媲美，只能说更是奢华靡费，令人咋舌不已。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旬诞辰，照例要举行极其隆重盛大的"万寿庆典"。为了筹办这次庆典活动，早在两年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十二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就发布上谕：

> 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四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匡、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和，礼部尚书松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桂、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仪，随时请旨遵行。

随后清宫成立了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

慈禧太后六旬庆典那天，自颐和园

还宫到紫禁城西华门的跸路两旁，共设置龙楼、经棚、戏台、牌楼等六十段点景，耗银多达二百四十万两。

在这全部六十段点景中，搭建戏台二十二座。戏台每座面宽、进深也视地势而定，或二丈二尺、或二丈；后台四间或五间，进深八尺或九尺。每座戏台应用的门帘、帐幔、椅垫、围桌均用红云缎做成，铺设栽绒台毯，设置红油桌凳，三面均挂彩绸、灯只等。

在万寿庆典期间，皇宫内廷和颐和园等处要唱戏多日，为了准备唱戏，需要制作大量的戏装、道具（时称“行头”、“切末”等），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名目之杂，清单之长，耗银之巨，令人惊诧不已。

据清代档案《皇太后六旬庆典》记载：

在颐和园要办福、禄、寿三台戏，置台衣三分：福台群仙上寿台衣，禄台五彩凤垂牡丹台衣，寿台祥云金寿字台衣；

置万寿无疆切末四分：罗汉渡海一分，地涌金莲一分，宝塔凌空一分，福禄天长云衣一分，仅此项就用银八万二千零九十两。

置办万寿长春、锡福延龄等切末七十三分，以及兽形切末和盔头等，需用银六万一千八百八十两。

此外，还要制作各色行头、彩衣、彩旗、盔箱等项共七千一百二十三分，共糜费银三十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九两之多。这还不够，后来升平署又续传办“行头”、“切末”等项，又耗银五万六千五百四十二两。以上共费银五十二万余两之多。

从上述大操大办万寿庆典活动中，用在戏剧方面的投资即占整个庆典资金的五分之一。可见，慈禧太后对戏剧的着迷程度，可窥一斑。

特别是以后，慈禧太后“六旬庆典”的高潮之日时，日军咄咄逼人地攻占了大连。而在此领土沦陷、重镇失守、人民遭难的危难时刻，慈禧太后却还稳坐在深宫戏台旁，歌舞升平，接受贺喜，大宴群臣，并连续赏戏三天。

慈禧爱看“外班”伶人演戏

慈禧太后爱看戏成了她宫中消闲生活的一大乐事。

她曾专令紫禁城宁寿宫太监另组“普天同庆科班”，称为本家班，并奉为

宫中一宝。但时间长了，不免觉得太监演的戏太乏味，没什么看头了，于是为了及时行乐，即传懿旨召外班伶人来宫中演戏。

所谓“外班”，就是京城内梨园的艺人戏班。

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至十二月二十九日，传外班就有“四喜班”、“承庆班”、“三庆班”、“双奎班”、“宝胜和班”、“同春班”、“义顺和班”、“小鸿奎班”、“小天仙班”、“玉成班”、“同庆班”、“庆春班”、“万年同庆班”等十余个戏班入宫内承应演戏。

据清宫档案记载：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七日，挑补民籍四名：杨月楼、王桂花、李玉亭、钱锦源交进当差，每人赏给月银二两、白米十石、公费制钱一串。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二十五日，西厅周达交进新挑民籍学生五名：谭鑫培、孙秀花、陈德霖、罗寿山、李奎林交进当差。

以后常被召进宫内演戏的外戏班伶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规模。当时的文武老生有：陈秀华、谭鑫培、杨隆寿、杨小楼、王凤卿、孙培亭、孙菊仙、汪

桂芬；

净角有：裘桂仙、刘永春、金秀山、钱金福；

小生有：鲍福山、朱素云、王楞仙；

丑角有：王长林、罗寿山、刘赶三；

旦角有：龚云甫、陈德霖、谢宝云、杨小朵、时小福和王瑶卿等。

除了唱戏表演的伶人外，还有各类乐师艺人。

据《清代升平署档案》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管奏准：挑得民籍随手梅雨田、沈福顺（琴师）入署承应；还有民籍随手梆子笛付震廷进宫承应等。

这些进入清宫内廷的文武名伶在进宫之前，先由总管内务府官员教导他们宫中的礼节，并规定外班每月初一和十五按时到颐和园等处演出。到了严冬时日，慈禧太后回皇宫后，也召这班伶人入宫演出。日久成了惯例，当时宫中赐给演员月俸仅十两银子，其中上述知名演员也不过二十两银子而已。当慈禧太后戏看到高兴处，还赏给这些外班演员银两、赏肉吃、赏“福”字、赏赐袍褂等，以示其恩典。

在清宫档案中，我们不但看到有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赏赐外教习等戏剧演员的"十月十五日共赏银一千五百一两"的赏单，而且还看到清晚期，摄影师在宫中所拍摄到的外班伶人演戏的旧藏照片。

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仍珍藏着外班伶人在清宫演戏的剧照：

（1）京剧《断桥》中陈德霖饰白蛇和余玉琴饰青蛇；

（2）京剧《阳平关》中的谭鑫培饰黄忠和杨小楼饰赵云的斗打场面；

（3）京剧《莲花湖》中的胜英、韩秀（王凤卿、杨小楼饰）；

（4）京剧《樊江关》中的樊梨花、薛金莲；

（5）京剧《桑园寄子》中的邓伯道、邓的弟妇和他们各自的孩子；

（6）京剧《落马湖》中的黄天霸、酒保；

（7）京剧《乌盆记》中的刘世昌、张别古；

（8）京剧《武家坡》中的薛平贵、王宝钏；

（9）京剧《虹霓关》中的东方氏、王伯党（余玉琴、朱素方饰）；

（10）京剧《艳阳楼》中的高登、花

逢春、徐世英、秦仁；

(11) 京剧《战濮阳》中的吕布、典韦；

(12) 京剧《请医》中的刘高手、苍头（罗寿山、王凤卿饰）；

(13) 京剧《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梅兰芳饰）；

(14) 京剧《穆柯寨》中的穆桂英、杨宗保；

(15) 京剧《拿谢虎》中的黄天霸、酒保；

(16) 昆剧《四杰村》中的胡理；

(17) 昆剧《铁笼山》中的姜维、司马饰；

(18) 昆剧《长生殿·密誓》中的唐明皇、杨贵妃及牛郎、织女；

(19) 昆剧《金山寺》中的法海、白蛇、青蛇等等数十张。

慈禧看戏之德行

慈禧太后不但爱看戏，而且有时还能哼上几句，甚至对戏班亲自指点，过问戏台设计布景等。她高兴时也不顾其身份，穿着戏装，游于西苑，虽经御史贾铎等人弹劾，慈禧太后却仍不介意，我行我素。

慈禧太后也最喜欢八角鼓、昆曲、乱弹、皮簧（即后来的京剧）等一类戏剧。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老佛爷（即慈禧太后）要去单皮鼓一面、手鼓一面。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六日，老佛爷又要把鼓一面、喇叭一支，拿到内宫去玩耍。

慈禧太后看戏，由于对许多戏文了如指掌，实在容不得那种看戏腼腆"假着"的人。

据《清稗类钞》载，光绪皇后隆裕只要观看淫秽戏剧时，即转首面壁，惹得慈禧太后很不自在，非常生气，"孝钦累谕之不从，旋以宫监宫眷之谮，遂深嫉之"。

然而，外班伶人在宫中唱戏也有最怕一点的，即慈禧太后看戏作风太坏，指手画脚，稍微词不达意，即大骂演员或唤人痛打一顿。所以演员在演戏时，个个提心吊胆，格外小心，不知啥时罪要落在自己的头上。

有一次，总管太监小德张为慈禧太后点戏时，指派唱黑头的穆麻子饰《双钉记》中的包拯。唱词中有一句"最毒

不过妇人心”，慈禧太后听了大怒，命戏立即停演，周围陪她看戏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只听慈禧太后传下懿旨：杖责穆麻子八十竹竿子，立即逐出宫外，连小德张也陪着挨了四十竹竿，罪名是选戏、选唱戏人不当。

另有一次，唱青衣的孙怡云进宫唱《玉堂春》，出场散板有一句“鱼儿落网有去无还”，他照旧词唱了“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慈禧太后怒火中烧，喝令孙怡云立刻停演。孙怡云见状，吓得浑身直哆嗦，还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原来慈禧太后属羊，羊入虎口，岂不是把羊吃了吗？孙怡云犯了这个“圣讳”。慈禧太后“对号入座”的结果，使得孙怡云被立刻逐出宫，并下旨永不准他再唱戏。

著名京剧演员陈德霖就要比孙怡云幸运多了，原因则是他十分注意了慈禧太后的忌讳。

一次，他在宫中演戏《玉堂春》中的苏三，当戏中的崇公道把苏三解到都察院时，苏三见到都察院威武森严、杀气腾腾，不寒而栗，有几句唱词是：

苏三：“来到都察院，举目往上视，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比做何来？”

苏三接唱的戏词本来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然而，陈德霖突然一想，慈禧太后是属羊的。为了避免犯违遭灾，灵机一动临时将“羊入虎口”一句改为“鱼儿落网”，文字更迭，词意不变。

当时，陈德霖的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慈禧太后的无比欢心，也深受同行的夸赞，戏剧界后来还尊称他为老夫子。这句被陈德霖改动了的唱词，后一直流传下来，沿用至今。

慈禧太后看戏，容易兴奋激动，甚至心血来潮地大肆修改不随意处，如她下旨要求唱戏上场人等，“以后上角不准大岔档，站住小八字，如有不遵旨者，拉下台杖责！”

另外，她在看戏中还为自己涂脂抹粉一番，以标榜自已“有道明君”。

一次名叫李溜子的演员饰演《下河东》剧中的欧阳方，唱做俱佳，“奸相”毕露，不料戏还未演完，慈禧太后已按捺不住满腔的“气愤”，旨命人上台把演“欧阳方”的演员痛打一顿。意思表明，我慈禧对前朝奸臣绝不能容忍，对今朝

的奸臣我还能容忍吗？可怜那唱相俱佳的演员，被打得吃了哑巴亏，还不敢说什么，只得认命罢了。

慈禧太后看戏还十分霸道，只要瞅演员动作不顺眼的就责令换掉。

一次，宫中演《长生殿》中一场，李隆基和杨贵妃登台唱到“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一段，但演员惧于慈禧太后威严，不敢抬头正视，更不敢伸手做些舒展动作。可按此戏剧片断，正应该演员抬头展望和做一些动作的场面，所以演员仅唱了一句“天淡云闲……”慈禧太后当时就很看不上眼，就叫人将两位扮演者拉下了台；再换两人上场，结果又与前者下场一样。第三次又换上来两个演员，他们冒着被杖打的危险，接着戏剧的发展，先抬头唱“天淡云闲”，然后再用手指向前方唱：“列长空数行新雁”，这才使慈禧太后长舒一口气，满意地笑了。

有些太监为了迎合慈禧太后的京剧喜好，更是以此为阶梯，为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下苦功学习京剧，太监小德张即是一个。

小德张原名张祥斋，字云亭，是清宫的御前太监。他从 1891 年（清光绪十

七年）入宫，到1913年离开紫禁城，在清宫整整生活了二十多年，1957年在天津辞世。

据其过继孙子张仲忱回忆《我的祖父小德张》文章，介绍了小德张唱戏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而飞黄腾达的经历：由于慈禧太后喜看京剧，除传外戏班入宫供奉唱戏，宫内也设有戏班即“南府戏班”。演员全由太监担任，邀请京剧名角入宫当教习（慈禧时代升平署外学恢复），能演唱成本大套的京剧、昆剧。

小德张为了迎合主子爱好，毅然加入了清宫的南府戏班。他既能演武生，又能演小生；他扮相俊美洒脱，功夫扎实，常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他和当时“十三绝”之一的杨小朵《破洪州》等武生戏，功夫精湛，开打严谨，深受慈禧太后赞赏。他和当时名演员王瑶卿、杨小朵、梅巧玲（梅兰芳的祖父）都配过戏。他后来升任御前近侍，代管南府戏班总提调。

小德张在宫中演《盗仙草》，只见饰白蛇的小太监踩着跷打出手的时候，踢枪踢过了劲，正要掉在台下时，饰鹿童的小德张一个跟斗翻过云，用两只脚把枪给挑回来了。慈禧太后看到后，大为

欢喜，并夸奖他今天差当得好，赏了全班五百两银子。

还有一次，慈禧太后传旨演《岳家庄》，小德张在这出戏上下得功夫最大，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夜间练私功，所以他饰岳云，演得非常好。慈禧太后对小德张的演技十分赏识，就问南府戏班首领小德张叫什么名字，并很快将他拨入太后西宫当差。

此后，小德张的戏是越演越好，他表演时也非常投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很快就被慈禧太后提升为御前首领。

自小德张到清宫内廷以来，以他的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随风转舵，并以南府戏班为阶梯，加入了“后党”，又因其戏艺精湛，成了当时慈禧太后十分青睐的“大红人”。

慈禧太后对戏剧“痴迷”和特别的爱好，虽主观上是为她愉悦享乐之目的，但客观上确实对当时京剧的发展，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升平署宫监艺人的苦心培植，“外学”伶人教习教演的恢复，特别是升平署演艺人扩展到近四百人左右，从京剧的发展繁荣上来看，的确还是不容忽视的。

小朝廷的回光返照

逊清皇室的溥仪在其“宫禁期间”，也不时地召进一些著名京剧演员和社会戏班入宫演戏，以此消磨寂寞无聊的时光。

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旧照中，除了存有梅兰芳的剧照，还有一张溥仪在宫中为唱戏者照相的照片，虽然画面不太清晰，但也能够反映出当时逊清皇室在宫中生活的一个侧面。

1922 年 12 月溥仪在大婚期间，连续演戏三天，花费也实在惊人。

据溥佳回忆：当时清室内务府，召集京、沪所有著名演员，如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王凤卿、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侯俊山、尚小云、俞振庭、龚云甫、裘桂仙、钱金福、王长林、马连良、李万春、盖同香、侯喜瑞等都入宫演戏。

演戏场地主要在御花园西侧重华宫内的漱芳斋戏台，太妃、“皇后”、“淑妃”、福晋、命妇等宫眷在漱芳斋屋内看戏，溥仪等皇亲国戚及满蒙王公、旧臣遗老等坐在院内的暖棚内或长廊内，演的是《跳灵官》，全由著名武生、花脸扮

演。接着又演《借赵云》、《神亭岭》、《彩楼配》、《钓金龟》、《文昭关》、《恶虎村》、《状元印》、《汾河湾》，最后大轴戏是杨小楼、钱金福、余叔岩、九阵风合演的《青石山》。整个这一天从上午开始演，一直到下午7时才散戏。

次日上午因有朝贺，是从下午一时开始。因溥仪爱看武戏，特意安排了侯俊山的《辛安驿》、周瑞安的《四杰村》，都演得十分精彩。特别是杨小楼、俞振庭演的《双金钱豹》十分精彩，博得场上一片叫好声，溥仪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最后一天的戏，有《五花洞》、《巧连环》、《珠帘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杨小楼演的《霸王别姬》。由于这场戏宫眷没看过，很多人都想看，但主管人考虑到戏剧内容，还是将意思告之溥仪，没想到溥仪却满不在乎决定上演。

此戏演得相当真切动人，特别演到虞姬自刎的场面时，太妃等女眷们都伤心地掉下泪来。更有那王公旧臣们有一种悲凄的心情离开紫禁城，认为是吉日演此戏是个“不祥之兆”。

据溥佳谈及“这三天的戏共花费了

三万多元”。如“一出《珠帘寨》就是一千元;《霸王别姬》是两千多元。”可见,逊清皇室演戏之奢侈,浪费之钜和场面之大了。

不过,我们注意到晚清宫廷的演戏剧目,内容已经不同于祖辈们的那种“歌舞升平”、“太平有象”的欣欣向荣的“神仙境遇”的戏剧了,而且,演戏的场面早已不如康熙、乾隆时代的规模了。

1922 年,瑾太妃(珍妃姐姐)寿辰,清室内务府决定在紫禁城皇宫漱芳斋演戏祝贺,瑾太妃为此特意点名要看梅兰芳先生的戏。

由此,逊清皇室内务府特派专人,邀请梅兰芳先生入宫漱芳斋演戏,表演了《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两出戏。

待戏演完后,一些老太妃和宫眷们无不感慨道:“随太后(即慈禧)看戏几十年,从未看过这样的好戏,以前看的戏都算是白看了。”

清宫演戏在时间上不同于社会,从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升平署档案中可以总结出,一般都是在卯正或辰初(早六点至七点)开戏,未正或申正(下午二点至四点)散戏,有时也延长到酉或戌(下午五点至八点)的时候结束。

所以，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多次在给逊清皇室演戏后，对宫中所规定的“辰正开台大吉”的有关宫规，不无惊讶道：“宫里的事真特别，娶媳妇是夜里娶，唱戏可早晨开锣，下午散戏！”

清宫南府衰落的缘由

道光皇帝登极后，即大裁减南府。

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十七日谕旨：

> 将南府景山的旗籍、民籍学生，有年老之人并学艺不成、不能当差者著革退。

直至六月，三次裁减、革退旗籍、民籍学生及伶人一百六十九名。

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又谕旨：“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仍回原籍”，遂即将南府改为升平署。道光皇帝强调：“改升平署如同膳房之类，不过是个小衙署就是了，原先总名南府之处，不必称府”，随之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将“南府图记”和“南府景山关防”两颗印章销毁。

那么，道光朝突如其来的裁减南府之风，究竟是为什么呢？

据清宫档案记载，道光皇帝承认“外边人艺业比太监本强”，但约束较太

监为难；特别民籍学生有扮旗装妇，在首领太监私寓侑酒事，为御前大臣痛斥。

另外，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教首林清在北京举行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密令太监接应引教徒二百余人，分别由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攻入内廷养心殿附近的隆宗门，后因寡不敌众失败。但此举成为一次震惊朝廷上下的突发事件，历史上称之为“癸酉之变”。

据史料记载，部分起义队伍的歇脚点是正阳门庆隆戏园；而“扰及宫禁，传之道路”的太监则是在清宫南府唱戏的太监。

对此，嘉庆皇帝宣布暂停南府内学、外学承应戏差，并对宫内太监严加鞫讯，革退南府内学太监甚多。致使道光皇帝未即位前就对清宫南府耿耿于怀，所以他登极即谕“严禁赌博，加紧门防，以杜闲杂人等混入宫内”。为避免重蹈覆辙，道光皇帝终于下决心裁减南府，并立即付诸实施。

再则，如果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这个大背景去观察问题的话，就不难看出道光朝正值鸦片战争前后，当时清廷内外交困，国库匮乏……。道光皇

帝再无心思“大雅”了，这不能不说是裁减清宫南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回顾清乾嘉时代，清宫南府内学、外学承应宫中演戏十分兴盛。乾隆朝时南府内学、外学人数达一千五百人；嘉庆朝时南府内学、外学也有八百人；而至道光朝时南府外学学生及伶人被裁减革退，清宫承应戏也因陋就简或干脆取消，南府人数也仅四百人了。

清升平署取代南府后，由于内学习艺太监人数逐次减少，清宫承应戏不敷支配，这样咸丰年间，不得不采用考试方法挑选重用民籍伶人十余名。

光绪年间，清宫演戏频繁，许多民间戏班有名伶人，如周春奎、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等经常召入宫中供差，并当场指导教习太监学艺，因此“外学”也第二次被恢复。

但应该承认，晚清时期的慈禧太后虽爱好戏曲，但终也赶不上乾隆盛世，南府内学、外学奏演“承应百戏”的盛况景象了。

后　　记

十年前，我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秘书岗位转到保管、宫廷部，专门从事宫廷文物的管理、整理、陈列与研究工作。

这期间，我在对故宫博物院宫廷文物的亲密接触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不容低估，几乎每一件宫廷文物，都能反映出哪个朝代的历史事件、时代变迁、紫禁城皇宫的沧桑历史，以及皇宫内廷帝后妃嫔、王公贵族、太监宫女的生活缩影等。

我在全身心地整理明清宫廷文物工作中，对这些珍藏精美的、蕴含历史文化沧桑的每一件文物时，都能使我产生一种触景生情的历史想象；因为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一种外人无法见到其真面目的零距离的接触。

当我触摸它们愈来愈久时，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股莫名的冲动，那种掀起盖头的惊喜，那种面向社会的自豪，都曾经使我激动不已；应该把它完整地记录、考证下来，将这些珍藏在库房中的宫廷文物面向大众，利于社会，则是

我们每一个文物工作者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文物专业和业务实践过程，无不深刻地感受到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工作的几年时间最为宝贵。研究室人文荟萃，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其学术气氛之浓厚，言行举止之得体，都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学业上的耐心指导和热心帮助，如研究员朱家溍先生特意为我开出了文史专业书目；研究员郑珉中先生，经常与我促膝谈心，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识见解，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和材料如何使用等，这对我以后学术研究方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更使我在学术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研究室的先生们平易近人，对疑难问题保证有问必答，他们的至诚，心胸豁达，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为人正直，特别是文思的严谨作风，更使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总之，我在研究室工作的几年，才真正使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业务实践的重要，以及领悟到了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

为此，我力求结合文献史料和宫廷

文物，认真研究宫史，特别是清宫史的研究，它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宫史虽然是从细微处着眼，往往是从个案研究开始，但重要一点是始终离不开与宫廷文物的有机结合。

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明清宫廷文物，大部分是康熙、乾隆时期的文物。所以在研究历史文化、参考文献史料中，融进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环节，就显得十分必要不可或缺。因为，研究历史文化离不开各类文物的研究，而文物研究又必须与文献史料结合，这样才能丰富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最终使个案、疑案等复杂事件的历史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从而也就突出了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本书的出版是根据此书体例要求，广泛涉猎文献史料，挖掘寻找历史档案，或结合宫廷文物，使文章论之有据，注解明白清晰，既力求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又不乏其可读性效果，努力认真地达到以物证史、以史证物、史物结合之目的。

另外，此书内容是我前一阶段在故宫博物院所管理的文物加以整理研究的课题，也是对过去工作的一个小结。由

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若有错误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热心读者不吝赐教指正。另外，本书在写作和出版中，得到文物出版社崔陟先生和蔡宏先生等编辑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从宫廷祈福寿艺术、宫廷皇帝卤簿仪象、宫廷环卫整理措施、宫廷除溷与便器具、宫廷防火措置、宫廷驯养鹰鹞特点、宫廷御茶特点与茶宴吟诗赏析、宫廷演戏与帝后迷戏等方面，介绍了古代宫廷（清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了解清代宫廷生活细节提供了丰富而又可贵的资料。

本书广泛涉猎文献史料，挖掘寻找历史档案，或结合宫廷文物，使文章言之有据、以物证史、以史证物、史物结合。注解明白清晰、既有知识性、纪实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

是整理故宫宫廷文物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

毛宪民

2003 年夏　于紫禁城